Far East
HC
426
T8

CAI-JING YANJIU

财经研究

2

1958

目　　录

駁翁格尔对苏联政治經济学教科書的批判……

……黃逸峯　王惟中　章恒忠　張宏方　朱懋庸　鄒今僕　鄒依仁　朱慕唐(1)

附录：翁格尔原作譯文……(8)

駁斥潘序倫在会計書本中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会計的右派謬論 … 婁尔行(13)

駁斥費孝通、李炳煥、吳承禧、楊蔭溥等右派分子

誣蔑上海財經学院积压人才的謊言謬論……李鴻寿(17)

論　　文

关于我国 1958 年度国民經济計划…… 李立中(21)

論我国 1958 年国家預算…… 胡鑑美(27)

商業資金节約額的計算……葛霖生(32)

討　　論

为什么生产与需要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經济矛盾? ……王惟中(39)

論农業社产品成本的計算……陈治鈞(45)

关于我国农業生产計划向征購計划过渡問題的商榷(下)……張开敏　陈声雅(53)

專　題　报　告

在十五年內，一定赶上英国!……顏次青(56)

調　查　研　究

一年来在調查研究工作中的几点体会……黃靜澄(59)

学　术　动　态

我院学术动态……实(64)

駁翁格尔对苏联政治經济学教科書的批判

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和共产主义建設的迈步前进、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建設的輝煌成就，在世界各国工人阶級和劳动人民中引起了日益深刻的同情，社会主义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不移目标。在这种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資本主义的情况下，帝国主义資产阶級和我們国内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就竭力企圖从思想的各个方面腐蝕群众，歪曲社会主义、污蔑馬克思列宁主义。提奧·苏蘭尼一翁格尔，和其他資产阶級的經济学者一样，为了要替日益衰退、沒落的資本主义进行辯护，就从所謂"經济学"的角度来对社会主义、对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歪曲和污蔑。他在"美国經济評論"上發表的那篇題为"苏联經济学教科書的变形"的所謂"書評"，可以說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比較突出的典型。在这篇"書評"中，除了对苏联科学院經济研究所編印的"政治經济学教科書"作了許多歪曲事实的"說明"外，全文充滿了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經济学，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陣营国家的恶毒攻击、污蔑中伤、武断否定和恶意揣測的粗野辞意。从这篇"書評"中，可以看到披着"学术"外衣的所謂"經济学家"翁格尔，在政治上是如何反动、在学术上是如何愚昧。上海經济学会、"財經研究"編輯部和上海財經学院政治經济学教研組为了对翁格尔的这篇"書評"进行批判討論，曾在2月27日召开了一次座談会。兹將这次座談会的發言稿和發言記录在本刊第二期和第三期分批刊登，并將翁格尔的"苏联經济学教科書的变形"的譯文附刊于后，以便讀者参閱，并希發表意見。

編　者

黃逸峰同志發言：

(一)翁格尔的这篇書評，总的来講是立場反动、态度恶劣、手法狡猾、措辞無賴。学术性很少，他对苏联所出版的政治經济学教科書，用了極恶毒的語言，竭尽謾罵、諷刺和挑撥之能事，但在理論方面，又沒有提出自己的观点，看得出：他是披着学者的外衣，以学术批評为幌子，作为帝国主义資产阶級的代理人，来对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行誹謗和进攻，这个人如果在中国，我想他無疑的將是个極右派分子；所以对于他的批判，与其說是学术批判，毋宁說是政治性的批判还恰当一些。政治經济学教科書，是一本很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經济学的著作，对于当前經济学界的貢献極大，由于它是第一本系統地总結社会主义經济建設經驗的書籍，不可能沒有缺点，因为理論是逐步提高和臻于成熟的，不可能一下子十全十美，但可以肯定优点是主要的，基本的。翁格尔这个資产阶級代理人，也是采取右派分子的手法，抓住个别缺点来否定全書。

(二)翁格尔对教科書的"批判的估价"，全文貫串了一种思想，就是認为教科書缺少經济科学理論，他根本否定党的方針路綫是合乎客观規律的，因而沒有理論价值。他說"因为坚持和依靠党的方針路綫，必然削弱了任何眞正的分析的論証的灵活性。"又說"大体上都能依照党的方針路綫完成了一种小心謹慎的学究式的經典注釋工作"。这个論調和我国右派分子陈振汉、沈志远等是一致的，如陈振汉認为我国經济建設的方針政策是"碰碰試試"，沈志远說有关我国資本主义工商業改造的經驗总結，沒有理論性等等。他們尽管远隔重洋，倒是唱的同一个調子。这般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經济理論？"以及"理論从何而来？"共产党的方針路綫的制訂，無論在苏联和我国，都是按照馬克思主义的原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群众中的問題集中起来，加以加工，加以分析概括，制成方針路綫，再放在群众中經过实踐考驗，因而它基本上是合于客观規律的，这些方針路綫的經驗总結，無疑地是具有很高的理論价值，否則这些方針路綫就根本行不通。像翁格尔这样淺薄無聊的人就压根兒不懂得什么叫做"理論"科学，因为他不过是一个資产

阶級的应声虫。

他十分恶毒地把"苏維埃的观点"分为"長期性方面"的，和"暫时性方面"的，他就是暗示教科書中所揭示的經济理論，是随着党的方針路綫而变的，因而不合于客观規律，也不是科学。但这也証明翁格尔对"理論"的無知，是一个徹头徹尾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者，須知馬克思主义的經济理論，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是在实踐斗爭中不断發展起来，人們的認識过程，也是經过实踐不断提高的。

(三)翁格尔不承認政治对經济学的作用，他說"在这一本政治經济学中，政治上的考虑确定地占优势"。他是故意装着"不問政治"的样子，他是一个道地的資产阶級代言人，但他硬要說"政治和經济無关"。馬克思主义的政治經济学(注意是"政治經济学"不是"經济学")，是一門党性、阶級性很强烈的科学，它必須为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級服务。由于它是符合于工人阶級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因而它可以充分反映客观眞理，因而它也是科学。它和資产阶級庸俗經济学不同，它是为少数資产阶級分子服务，因而它必然掩盖客观眞理，因而它也不是科学。就是翁格尔自己那样热心为少数帝国主义資产阶級分子服务，他才不敢公然承認政治經济学的阶級性和政治性。

(四)翁格尔硬說这本教科書所采用的統計資料陈旧，沒有采用他所吹嘘的"进步的定性和定量的論述方法"。这也是有意誣蔑，正是这本教科書才是眞正的在大量地占有資料的基础上，做出了恰如其分的概括，这正是这本書的优点，当然根据这些大量資料的概括，是不能使这一"右派分子"滿意的。

王惟中同志發言：

苏蘭尼-翁格尔对苏联政治經济学教科書的方法論的誣蔑証明了他在学术上的極端無知和政治上的極端反动。

他認为，苏联的教科書既不重視法国式或其它的理性的思考方法，亦不重視盎格魯、薩克遜式的經驗分析方法，而偏爱德国式的抽象分析及对分歧論点的純概念的解答。这是非常荒謬的。他錯誤地把人們的認識方法与民族特点生硬地联系起来，而不了解認識方法虽然有时为某一国家的某一学者首先發現，但与民族的特点沒有絲毫关联。理性的方法虽然为法国的笛卡尔所首創，但荷蘭的斯宾魯莎，德国的康德又加以神秘化；实际上演繹的方法早为希臘哲学家所运用，而現代的唯心主义那一个也离不了它。同样地，經驗的方法虽然为英国的培根所首創，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也运用它，并且到了貝克萊休謨之手已成为唯心主义的根据，到了馬赫更荒誕了。他不了解，理性方法也好，經驗方法也好都有它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孤立地运用时，不但找不出事物的本質，并且必然引导到荒謬的唯心主义与神秘主义。馬克思主义的認識方法是以实踐为基础，由感性上升到理性，实踐認識，再实踐再認識，循环往复，以至無穷，教科書所用的正是这样唯一正确的方法。德国的古典哲学，自康德，費希特，謝林，一直到黑格尔都是荒謬的唯心主义，他們的一切論証都基于莫須有的假設，主观的臆度，披着神秘的外衣，来为剝削阶級服务。在黑格尔的正、反、合三段式上，唯心主义的辯証法达到了頂峰。它把客观与主观的关系完全顛倒过来，在"合"里面，把矛盾調和起来。所有这些与苏联政治經济学教科書所运用的唯物主义辯証法在本質上沒有絲毫共同之处。翁格尔所以要这样誣蔑教科書，其实为的是誣蔑教科書所闡明的客观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不合邏輯的制度，是建筑在主观假設之上，因而不可能長存下去。足見其用心之非常恶毒！

他还把正确地反映人类历史發展的历史唯物主义說成是一个僵硬的公式，誣蔑教科書把整个历史硬套入这个公式中。試問，如果历史不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規律發展的，难道历史是按照"上帝"的意旨，什么"客观精神"的自我發展前进嗎？难道历史發展是决定于地理环境，人种的优劣，人口的多寡，为資产阶級学者所捏造的那样嗎？翁格尔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否定社会發展的客观規律，从而企圖把資本主义說成是万古長存，把社会主义說成是偶然現象这完全

是反科学，反社会主义的胡說。

他又說："在这一本政治經济学中，政治上的考虑确定地占优势，"好像政治不可能或者不应該对經济起这样的巨大作用。他不了解經济基础与上層建筑的相互关系，特别是政治与經济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他更不了解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經济規律不是自發地起作用，而是被国家自覚地运用着；只有依賴了国家的經济組織活动，經济規律才能發生作用，同时还發展它自己。翁格尔的用心是要我們放弃国家的經济組織功能，而使整个社会經济陷于無政府狀态，使資本主义复辟。

应当特别指出的，他認为，"坚持和依靠党的方針路綫就必然削弱任何眞正的分析的論証的灵活性"。他完全錯了，我們党的方針路綫不是从主观的臆測而来，而是以客观的社会經济發展規律及当时的具体条件为依据的。离开了党的政策，經济規律就不可能实現，从而社会主义的政治經济学也失去了內容。翁格尔把我們党的方針路綫与社会經济發展規律完全割裂开来，要讓社会主义經济盲目地自由發展，陷于混乱。

翁格尔究竟要我們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呢？他要我們采用所謂"最新的进步的定性和定量的論述方法"，那就是資产阶級經济学者們所常用的数学方法。这个方法从数学公式中演繹出資产阶級所需要的"理論"，把經济理論变成数学上的游戏；还从經济現象中抽去了阶級內容，从而掩蔽着資本主义社会的剝削的实質，这正是我們所不能允許的。

必須指出，翁格尔的論点与我国右派分子陈振汉的謬論如出一轍。翁格尔批評我們輕視理性分析及經驗分析方法，陈振汉亦批評我們不用所謂"边际观念"及不从实际出發；翁格尔責备我們偏爱抽象方法及純概念的解答，陈振汉亦責备我們"从完全抽象商品二重性的概念开始"；翁格尔否定历史唯物主义，陈振汉亦否認历史發展的一般規律；翁格尔把社会主义下的經济規律与党的方針路綫割裂开来，陈振汉亦誣蔑我們的經济工作者不懂得經济規律。这兩个家伙倒眞是难兄难弟了，所不同的只是翁格尔明目張胆，而陈振汉还遮遮盖盖罢了！很显然，为了粉碎右派分子的謬論，就有必要狠狠地打击他們的国外同伙者。这不是什么学术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是你死我活的阶級斗爭。

章恒忠同志發言：

翁格尔"苏联經济学教科書的变形"一文，从头到尾最突出的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經济学党性的攻击，这一点十分明显地反映了翁格尔这篇文章不是普通的書評，而是反动的挑战書，反映了他的反动的政治立場。因此批判翁格尔，首先要从这一点开始。

翁格尔为什么要集中攻击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經济学的党性呢？因为党性乃是馬列主义政經学的灵魂，沒有無产阶級的党性，也就不成其为馬列主义政治經济学。正是因为馬列主义政經学具有無产阶級的党性，才能与資产阶級政治經济学相对立，使后者無立足容身之地。因此，翁格尔为了否定苏联政治經济学教科書的价值，貶低它的作用，首先就对它的党性开火。与一切資产阶級反动学者一样，翁格尔否定馬列主义党性的手段，主要是否定它的党性与科学性的統一。可是，我們知道，馬列主义政治經济学是高度党性与高度科学性的結合和統一，我們所謂党性就是为無产阶級服务的馬列主义立場，它使政治經济学成为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作斗爭的武器。而科学性，是指这个理論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現实，是否具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对我們来說，这就是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党性和科学性的結合，也就是馬列主义立場与馬列主义观点和方法的結合，兩者是統一不可分的，去掉馬列主义的立場，就不可能有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所以，沒有馬列主义的党性，也就沒有了科学性。我們馬列主义者，从不隐瞞自己理論的党性，恰恰是公开承認这个党性，同时我們也决不忽視理論的科学性，而是使科学性和党性統一起来。

我們强調政治經济学的党性，与科学性并不矛盾，比如我們为了鼓舞無产阶級的革命意志，强調資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我們批判資本主义的丑惡本質，歌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不是降低了科学性呢？沒有。因为

客观規律是証明資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客观事实証明了，社会主义比資本主义优越。我們把資本主义的發展分为兩个阶段，把帝国主义說成是垂死的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也是客观事实。在这些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我們特别强調無产阶級的党性原則，是为了引导劳动人民起来与資本主义制度作斗爭，以加速資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到来，这就是科学性与党性的結合。所以，翁格尔要用馬列主义的党性来否定科学性，从而否定政治經济学教科書，是完全办不到的。

翁格尔說苏联教科書强調政治，是的，我們是强調政治，政治經济学之所以称之为政治經济学，决不是偶然的，因为我們不是脫离政治單純去研究經济，而是从政治与經济間的关系来研究經济、是从上層建筑与基础的关系中来研究基础的。翁格尔說我們的教科書只是宣傳、解釋党的方針政策，这完全是歪曲与誣蔑，因为教科書、所研究的是客观的經济規律，当然，我們在研究經济規律时，不可能不联系到党的方針政策的，这是为了說明党的方針政策的客观依据，以便更正确地制訂方針政策、为基础服务。这也是党性的一种表現，是党性与科学性相結合的一种表現。

翁格尔反对苏联政治經济学教科書有党性，似乎有党性就沒有科学性，这对翁格尔自己来說才是正确的。翁格尔这篇書評的資产阶級党性十分猛烈，他全文的目的不仅在攻击苏联政治經济学教科書，而且直接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社会主义陣营。而这篇文章除了任意誣蔑、無中生有、捏造事实之外，什么科学性也沒有。这是因为資产阶級党性只能与資产阶級的伪科学性相統一，而决不能与眞正的科学性相統一。所以，弄掉科学性的不是我們，而是資产阶級学者們自己。最后，必須指出，翁格尔所以选中苏联政治經济学教科書进行全力的攻击，这正說明这本教科書很好，党性和战斗性很强，已引起了資产阶級学者的惊慌和憤懣，因而，在翁格尔的文章中，流露出一种不可隐諱的激动的資产阶級反动性和冲动，这是当前国际間阶級斗爭在理論上的反映。因此，我們今后必須重視和加强理論著作和科学研究的党性，要做到这点，首先必須加强我們自己身上的党性，要加紧改造自己，要站稳無产阶級的、社会主义的立場。

張宏方同志發言：

正如大家所指出的，翁格尔文章的主要特点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表現了刻骨的仇恨。对"教科書"采取了武断的否定和惡意中伤，而对自己的論点却沒有什么闡述。因此，它并不是一篇什么学术性的东西，实質上是一支反苏反共的毒箭。

翁格尔施放毒箭的主要目的，在于維护豢养他的資本主义制度。这一点露骨的表現在他对"教科書"关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所作的所謂"評論"中。他在这段"評論"中有这么兩个主要論点：第一，他認为"教科書"把"壟断前資本主义和壟断資本主义区别开，从而把它們分别处理，这是很牽强的，并且是本書这一主要部分的严重弱点"。第二，他污蔑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內胜利的学說是"机会主义立場"。翁格尔所以提出这兩点决非出于偶然，而是为了忠实效劳于資本主义經过深思熟虑而提出的。

教科書把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成兩个阶段卽壟断前的資本主义与壟断資本主义来加以闡明，决沒有絲毫牽强之处。这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發展的兩个阶段。任何社会生产方式都有其从低級向高級的發展过程，資本主义也不例外。自十九世紀最后的卅年起，資本主义的發展已經在其旧的基础上表現了許多新的特征，卽列宁指出的五大基本特征，这一切說明資本主义已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壟断时期。这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發展不可避免的結果，而不是任何人为的臆造。"教科書"的分析乃是反映了客观实际，这是科学的分析，而不是什么牽强附会；这是优点，而不是什么弱点。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論不但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經济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时也是無产阶級革命論——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內取得胜利的出發点。列宁在論証帝国主义經济特征的基础上得出了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前夜的結論。并且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資本主义

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叛立了社会主义有可能在个别国家內取得胜利的革命理論。"教科書"这一部分的闡述不但保持了科学上的严整性，而且將大大地起着革命的鼓舞作用，用它去武裝世界無产阶級的思想，动員他們去冲击資本主义制度、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內胜利的学說，它的正确性及其巨大的动員力量已由苏联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胜利所証实，并由我国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胜利所証实。直到今天这一理論仍然昭示着我們：資本主义体系將一环一环地被社会主义革命所突破，以至最后归于完全灭亡。翁格尔之所以要污蔑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的学說是机会主义，就因为他惧怕这一学說的偉大革命力量，他要極力为搖搖欲墜的資本主义制度打气，企圖証明它是永世長存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势必从根本上否定資本主义有兩个阶段的区分。否定列宁的关于帝国主义理論。斯大林早在与資产阶級的代言人季諾維也夫作斗爭时就指出过"誰否認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內胜利的可能性誰就不得不对帝国主义时期發展不平衡規律的意义默不作声，而誰对不平衡發展規律的意义默不作声，誰就不能不抹杀存在于帝国主义以前和帝国主义时期資本主义之間的差别"。因此翁格尔这兩个論点是有机的貫穿着一个目的——忠实地为少数壟断資产阶級、帝国主义集团效劳。由此，他已經庸俗到無視任何客观事实的地步。

朱懋庸同志發言：

美国叙拉庫斯大学經济学教授翁格尔为"美国經济評論"所写的以"苏联經济学教科書的变形"为題的論文，决不是什么学术性論文，而是一篇極端仇恨社会主义制度、强烈緬怀資本主义剝削制度的政論文章。虽然作者并不忘記自己还具有学者教授的身份，因而总是尽可能运用一切学术上的概念和字眼，使整个文章装扮得具有客观的学究式的外表，但这却是多么困难！論文的每一部分的字里行間，几乎都流露出那种强烈的阶級感情和阶級仇恨。这使我們更深切地体会到一个眞理：一切社会科学包括經济科学在內是必須具有严格鮮明的阶級性和党性的。以純粹科学研究自命并以采用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为标榜的翁格尔教授的經济学亦决不能例外。

遺憾的是翁格尔教授自己的阶級性虽然那么鮮明，但在他的評击苏联政治經济学教科書的那篇論文內，还是孜孜不倦地集中其主要精力攻击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济学所体現的阶級性和党性。为了非难苏联政治經济学教科書的內容所反映的党性，像其它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所慣常采用的手法一样，翁格尔教授甚至無中生有地污蔑教科書"在絕大部分的章节中假設和結論間的联系也往往是牢固地前定了的，因为坚持和依靠党的方針路綫，必然削弱了任何眞正的分析的論証的灵活性。"不仅如此，翁格尔教授还大大發揮其"分析的論証的灵活性"，把苏共党的方針路綫擅自分成所謂"比較長期或相对稳定的方面"和"显然是暫时的或可变的方面"兩部分，而后运用相当篇幅，牽强附会地肯定党的这兩部分方針路綫在政治經济学的教科書中都得到了相应的反映，并且进一步毫無根据地断言：由于教科書反映了党的所謂"長期性的方針路綫"的要求的結果，教科書在"求得学术上客观性的任何努力，就显得無影無踪了"。如果借用中国資产阶級右派的話来表述，那就是說："教科書根本上就是一个教条主义的产物"。另一面，翁格尔教授又把其一手所制造的所謂"党的暫时性的方針路綫"解释为"斯大林晚年和馬林科夫領导下的新路綫"，而教科書既然反映了"党的暫时性的方針路綫"，按照翁格尔教授的推論，当然也就是反映了这个"新路綫"。"新路綫"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翁格尔教授笔下的"斯大林主义"，就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于是，按照翁格尔教授的邏輯，教科書也就必然是"斯大林主义"或"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产物了。翁格尔教授就这样轉弯抹角地把苏联政治經济学教科書污蔑为教条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結合体，武断地全面否定了苏联政治經济学教科書的价值，从而徹底暴露了这位資产阶級学者运用客观口吻發表論文的虛伪性。

翁格尔教授在其論文的第二部分，既然对政治經济学教科書作了全盤否定，于是在以"將来

可能的改变”为题的論文的第三部分，对教科書第三版的修改內容，作了某些显然是捏造出来的推测。翁格尔妄测：“关于資本主义下的經济情况，工人阶級絕对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長期性的失業和不断增長地严重而頻繁的經济衰落等等命題被抛弃了。同样地，生产的有系統的扩張不再是現代資本主义的特征之一，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之必然的联系，現代国家資本主义有計划的干預政策必然是疏忽無能——这一类的意見和看法也不再被保持了”等等云云。翁格尔教授又巧妙地运用他客观主义研究問題的手法，把这些“將来可能的改变”完全推給苏共第二十次党代大会以及所謂“非斯大林主义化运动”身上。但是，这实在太令人吃惊了！苏共第二十次党代大会赫魯曉夫的政治报告全文中明白地写着：“……只是由于某些对資本主义有利的情况的暫时湊合，才阻止了已經有的危机現象……其实，即使在今天，在行情活躍的时期，也存在着不显露的危机現象……新的經济危机和震蕩必然会在資本主义国家中成長起来。……国家干預經济活动，并不能消除資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缺陷……危机是包含在資本主义的本質中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在战后充分利用經济潜力的这种高峰已經过去了……进一步大量增加生产的前景是沒有的……”。难道翁格尔教授沒有讀过嗎！翁格尔教授不敢明目張胆提出自己的論点，而卑劣的把自己对教科書的主观篡改的意圖貼上“苏共第二十次党代大会”的标記出售給美国广大的讀者群众，这是典型的美国商人慣耍的欺騙手段！

除此而外，翁格尔教授在他的論文的許多地方还别有用心地把教科書說成是社会主义国家領导者个人权力的产物，这当然是这位壟断資本的代言人所固有的挑撥馬克思主义經济学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領导人之間亲密关系的惡毒伎倆。但这里倒也啓發我們需要强調一个問題：那就是正确理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的領导人对闡述和發展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济学理論的可能性和权威性。因为所謂革命理論本来就不是翁格尔教授之流主观發揮其“分析的論証的灵活性”所能制造出来的，而是整个革命运动和建設实踐經驗的高度总結。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还有許多無产阶級革命事業的优秀繼承者，正是这些偉大的革命家、实踐家，必然也就是無产阶級政治經济学理論最有权威的締造者。翁格尔教授对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济学的挑撥性的誹謗，显然是枉費心机的！

鄒今僕同志發言：

翁格尔对教科書的攻击，是將它分为兩个方面来进行的。首先，是他所謂以相对稳定的方面，他說这方面的东西已經形成了一个框框，所以沒有什么科学可言；其次，是他所謂的暫时性的方面，他認为这方面是經常随党的方針政策的改变而变化，方針政策一变，理論也就变了，所以也是不科学的。

我們認为，科学就是客观規律的正确反映，符合客观規律的理論就是科学。根据毛主席对于事物矛盾性質的科学分析，我們知道，矛盾具有着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兩个方面。在国际無产阶級專政的历史經驗中，就有普遍規律，这种規律帶有普遍性，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并不是什么框框，这也不是什么教条，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客观規律。同时，也有特殊的規律，这种規律是随时間、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我們抓住这种变化正是我們的正确性，我們根据矛盾的發展、客观条件的变化进行研究，而不是脫离实际的一成不变，这正是我們的科学性。然而，翁格尔以及我們的右派分子們却恰恰相反。在他們看来，我們只是盲目地跟着党的方針政策走，今天說这个正确，明天又說那个正确，根本沒有科学性。其实，他們的用意乃是妄圖使我們把帶有普遍性的規律、基本的馬列主义原理变成过时的，而使特殊性的必須随条件的变化而轉移的东西变成永久不变的、僵死的教条。如果这样，那当然就可达到其全面破坏和推翻馬列主义政治經济学的無耻陰謀了。

鄒依仁同志發言：

美国資产阶級經济学者翁格尔对苏联政治經济学教科書的批評可謂極尽污蔑的能事。他

对这本教科書所运用的統計資料也加以恶毒的攻击和諷刺。他在他的書評里說："……对多少已經过时的統計資料之經常而偏执的信賴，使人对这本書感到一种熏香衣服的陈腐气息"。事实是不是这样呢?答案是完全否定的。

大家知道，政治經济学和統計学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政治經济学是統計学的理論指导，而統計学，尤其是統計資料也对政治經济学起着巨大的积極作用，政治經济学的發展是不能离开統計資料的。統計以大量的、現实的統計資料充实、丰富和証实經济理論，并为經济理論奠定了坚固的基础。統計学还可以表現出在实际經济生活中剛剛發生的新事物的資料来丰富和發展政治經济学。

在苏联政治經济学教科書中所运用的統計資料，不但已經达到了上述要求，而且是当代运用統計資料的典型范例。在教科書中这样完善地运用統計資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早在 1952 年斯大林提出"苏联社会主义經济問題"时，他对当时的教科書修訂委員会就有这样的要求："最好，委員会中也包括一位有經驗的統計学家来檢查数字并給未定稿添加新的統計材料"。（苏联社会主义經济問題，人民版譯本第 42 頁）后来在具体修訂过程中，是由苏联最高統計学权威，苏联中央統計局局長斯塔罗夫斯基負責选擇和整理教科書中的統計資料的，足見当时运用統計資料的严密性和郑重性。不言而喻，这本教科書的初版期是 1954 年。在这本教科書的社会主义部分大都运用了 1950 年前后，甚至 1954 年当年的經过愼密审訂、完全符合于实际情况的苏联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統計資料，即使在教科書的壟断資本主义部分也运用了經严密批判分析过的資本主义国家的当时最新的統計資料。这样嶄新的謹愼的統計資料，怎样可以說是"多少已經过时"而有"陈腐气息"呢？当然不能。

我們可以正确地推測翁格尔所指的"多少已經过时"的資料就是指教科書中所运用的曾經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亲手审訂过的俄国以及当时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的統計資料。大家知道，資产阶級統計資料一般都具有辯解性的，它們都是为反动的資产阶級服务的，这些資料，不經过愼密的批判分析以及加工整理，对我們来說，是沒有运用价值的。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当时俄国以及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的統計資料的批判运用，正是我們对待資本主义国家統計資料的珍貴榜样。况且，壟断前資本主义部分必須配合以壟断前資本主义的統計資料，壟断資本主义部分必須配合以壟断資本主义的統計資料。我們决不能想像以社会主义的統計資料来說明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此，翁格尔的所謂"陈腐气息"完全是污蔑。

另外，我們再就翁格尔所說的"最新的进步的定性和定量的論述方法就不能被采用"的問題来談一談。翁格尔所說的"最新的进步的定性和定量的論述方法"当然就是指数学方法。大家知道，在苏联政治經济学教科書中，的确沒有运用任何数学方法，但馬克思主义的經济学者从不排斥在經济分析中运用最先进的数学方法。正如苏联科学院院士奥斯特洛維季揚諾夫在苏联 1954 年統計学科学会議中所說过的，"其实，只要是用得上和用得恰当，那末把最先进的数学方法运用到社会現象的研究上面去，并沒有什么可耻，也沒有什么違反馬克思主义的地方"。关鍵性的問題就是在数学方法只是經济研究的一种輔助方法，絕不能把抽象的数学公式来代替政治經济的分析。我們所反对的就是形式主义的数学方法，而这种方法，正是資产阶級經济学家們的拿手好戏。

我們可以用馬克思的不变資本与可变資本的增長对比的这个原理为例。这个原理是：当全部資本增加时，其可变資本部分或它所体現的劳动力虽然也增加，但增加的比率遞减了。如果我

美国麻州棉織品的生产（百万美元）

年 份	資 本	产品价值	工 資
1840	17.4	16.6	——
1850	28.5	19.7	——
1860	33.7	38.0	7.8
1870	44.7	59.5	13.6
1880	72.3	72.3	15.8
1890	128.8	100.2	25.1
1900	156.3	111.1	32.5
1905	174.6	130.1	32.6
1910	214.0	186.5	45.1

們运用美国麻薩諸塞州的統計資料(見上表),就可初步証实这个原理，也就是說，在1840年到1910年的70年間，投入的資本增加最快，产品价值則增長稍慢,工資增長最慢。

如果經济学家还熟悉数学方法,那就可以不局限于約略的分析。他还可以利用数学的方程式方法来細致地計算出每隔10年的資本、产品与工資的各个不同的平均增長速度如下:

資本……37.0百万美元

产品……26.4百万美元

工資……7.2百万美元

运用了数学方法,就得出了可变資本的增長在絕对水平上比較不变資本的增長落后4倍以上的結論。这种結論当然比較原来的粗略分析更有力量。

因此，我們絕对不反对有成效地运用数学方法,使其成为适用于經济分析的良好的技术輔助工具,而反对的就是資产阶級經济学家們所常用的形式主义数学方法。

对苏联政治經济学教科書作为一本具有国际意义的、基本的教科書来說，当然沒有这样的必要把复杂的数学方法勉强地加于各个論点中，在我們看来，这不但不是一个缺点，而且是这本教科書的許多优点之一。由此可見,翁格尔的这些惡意批評完全沒有什么根据的。

朱慕唐同志發言:

翁格尔造謠說,在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和繼續召开的專家会議的影响下,在政治經济学教科書第三版的修訂中，“关于資本主义下的經济情况,工人阶級絕对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等等的命題被抛弃了。”而其更惡毒的是，他不是自己出面来否定,而是假介紹苏联經济学界的动态,輸运自己的反动見解,惡意地造謠惑众。

我們知道,無产阶級相对地和絕对地貧困化是資本主义基本經济規律在資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發生作用的必然結果。資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必然导致資产阶級对無产阶級的压迫和剝削的不断加深,使無产阶級在国民收入中所得的份額日益减少,造成無产阶級的相对貧困化。随着資本有机構成的不断提高，相对过剩人口不断增加，把在業工人的工資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同时，失業工人的赤貧現象不断积累着。所有这一切,就必然使整个無产阶級生活条件具有日益惡化的总趋势。馬列主义关于無产阶級相对和絕对貧困化的原理，是工人阶級解放自己的重要思想武器,它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和革命意义,是永远不会“被抛弃”的。

無产阶級生活条件日益惡化是一个总的趋势,它在資本主义循环周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具体表現。在复苏和繁荣阶段,工人阶級就業人数增多,工作日或工作周延長,劳动强度提高,在工人阶級坚决为爭取提高工資而斗爭的条件下,工人阶級的工資收入总額可能有所提高。但是,在这时候，物价往往上升，工人阶級小时实际工資率往往下降，而劳动强度却迅速提高，也就是說,工人阶級所受劳动折磨的增長超过工資总額的增長,工資的增加愈来愈不足以补償劳动力的消耗,这实际上也是絕对貧困化的一种表現。而在危机爆發后，失業迅速增加，工資收入急剧减少,無产阶級絕对貧困化便采取最尖銳化的形式暴露出来。关于这方面,教科書第三版特别加以闡明。

教科書第三版还闡明了經济軍事化和战爭这一促使無产阶級絕对貧困化因素,并指出在經济危机和战爭中,無产阶級生活水平最猛烈地下降。这对于当前資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是具有重大的現实意义的。

事实証明,在教科書第三版中無产阶級絕对貧困化这一重要命題,不但沒有“被抛弃”，而是更加充分闡明、更加强調、更具有充沛的战斗力。翁格尔是在胡說八道。

附录： 提奧·苏蘭尼-翁格尔“苏联經济学教科書的变形”譯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苏維埃陣营(2)的惊人發展和与之俱来的政治責任上的負担，在苏維埃經济思想和教育上促成了一种严格的标准化的趋势。可是，关于出版一种社会主义經济学权威性的普通教科書的計划，早在大战前几年实际上就已第

一次提出来了。1941年，斯大林作了出版这种書的指示，主要是关于基本理論的几章。1951年11月，苏共中央委員会在莫斯科組織了一个討論会，討論了这書的綱要及其原理的大概輪廓。几百个經济学家参加了这个討論会。其中，康·維·奧斯特罗維季揚諾夫、勒·阿·列昂节夫、德·特·謝皮洛夫和勒·麦·加托夫斯基似乎是主要的角色。討論会的决定提交給中央政治局；1952年2月1日，斯大林把他自己所提出的"意見"送給所有討論会的参加者。1952年4月21日、5月22日和9月23日，他又对一些討論会的参加者(阿·伊·諾特京、勒·德·雅罗申柯、阿·維·薩宁那和維·格·溫什尔)关于他的意見所提出的問題分别作了答复。这些答复于1952年10月2日，即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10月5日至15日)开幕前三日，以"苏联社会主义經济問題"的名称在"布尔什維克"杂志上刊出。10月3日"眞理报"社論宣称斯大林的答复乃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經济学發展的最高阶段"。这些答复的出版被宣布为"党和苏联人民的知識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而答复本身因其"眞正的历史重要性"受到贊揚。斯大林的这一著作發行了几百万册并且决定了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一般气氛。因为这一著作不仅討論了教科書所应包括的純粹的經济理論，同时也討論了比較一般的意識形态上和政治上的各种問題。

經过了这样生动的創始和兩年以上的辛勤审愼的工作，这書于1954年出版，書名是"政治經济学教科書"。俄文的原版"在短期內"售出六百万册，此外还"用苏联各民族和国外的許多种語文"出版。从事写作該書的一群經济学家有十人在該書的前言中被列举出来，其中有六个院士(康·維·奧斯特罗維季揚諾夫、德·特·謝皮洛夫、勒·阿·列昂节夫、伊·德·拉普捷夫、帕·雷·尤金和阿·伊·帕希科夫)，二个經济学博士(勒·麦·加托夫斯基和維·納·斯塔罗夫斯基，后者負責选擇和整理書中的統計材料)和一个經济学碩士(維·伊·彼雷列斯金)。教科書最后的校訂工作是奧斯特罗維季揚諾夫、謝皮洛夫、列昂节夫、拉普节夫和加托夫斯基担任。就学者的声誉上說，奧斯特罗維季揚諾夫最为显著。在該書进行編审的时候，他是莫斯科的科学院經济研究所所長和拥有广大讀者的"經济問題"杂志的主編。在他的許多有关經济学的著作中，以前出版的他和伊·拉皮杜斯合著的政治經济学教科書和他自己所著的資本主义以前的經济形态二書，对这里所評論的教科書是特别重要的。列昂节夫以研究列宁(1941)、馬克思(1945)和西欧經济(1949)著称。帕希科夫自1948年以来任莫斯科大学政治經济学教授，謝皮洛夫自1956年以来任苏联外交部長，斯塔罗夫斯基系苏联部長会議中央統計局主席。而在苏联經济思想界和經济决策的人士中，有些著名的領导人物(瓦尔加、斯特罗米林、涅姆欽諾夫、柴尔諾莫尔基克、圖列茨基、烏达尔佐夫等等)都沒有参加这書的編审工作。

(一)范圍和方法

著者的任务虽然在于写出一本馬克思主义的政治經济学教科書，但全書中用于批判資本主义以前和資本主义的經济制度的几乎占了一半。由于作者們对馬克思主义的辯証法还保持着正統的观点，这种情形是不足奇怪的。在这种观点下，教科書几乎是同样着重于批判地否定資本主义的正題，正面地分析社会主义的反題，其中还包括某种未来的共产主义的合題的一些極簡略的提示。結果，整个論述伸展入各个發展时期，强調过去、現在和未来的經济發展間的关系，并且基本上采用了作为卡尔·馬克思的經济学的特点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严格形式。开宗明义便把政治經济学的定义确定为研究人类社会各个發展阶段上社会的物質資料生产和分配的一門社会科学，这就更加强調了这种观点。在介紹全書的范圍和方法而長达九頁的导言中，基本的术語和概念都是依照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原文解釋的。

論述資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法的几章，除了关于"基本經济規律"那种三分式的骨骼外，几乎什么也沒有提出，而这些規律又給硬套入一种历史發展的框子中，即从最古老的"原始"社会形态到奴隶制經济然后再到封建的生产型式。关于最古老的社会形态的論述多少有点烏托邦式的，强烈地使人記起奧維德所歌頌的"黃金时代"。(3)例如，生产物的原始平均分配据說是曾經存在过，直到私有財产和阶級差别發展后才被消灭。以后的奴隶制阶段和封建主义阶段也被片面地描述为用以剝削奴隶和依附的农民的不同經济制度。与此同时，逐漸进步到技术上效能更大的生产方法和上升的資本形态是被承認的。各时期的經济思想上的轉变，从汗穆拉比和孔子到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罗馬的法律学派、中世紀的經院学派、重商学派，以至19世紀初期俄国第一批革命的經济学家如亞·尼·拉吉舍夫和十二月党人，書中也簡單地提了一下。

关于資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分析和批判，所費的力量較多。把壟断前資本主义和壟断資本主义区别开，从而把它們分别处理，这是很牽强的并且是本書这一主要部分的严重弱点。关于壟断前資本主义时期，書中所論述的問題是：資本主义的組織和手工制造業的各种最初历史形式，机器的被重視，馬克思主义的所謂剩余价值的起源，資本积累的發展，資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資本主义下工資、利潤和地租的相互关系，国民收入和經济危机。帝国主义說是壟断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关于資本主义制度的大量的批判，其共同的基础就是馬克思主义的突变論和一切与之相关的、时常爭辯的論点。这一些观念被十分系統化地应用着，虽則已經給修改为可以适用于这一机会主义的立場，即社会主义可能單独在一个国家內取得胜利(4)，尽管整个世界上資本主义的崩潰还可以稍延时日。

与此相应的"資本主义时代的經济学說"的論述，所占的篇幅只等于一篇稍長的杂志論文。簡單地檢查一下其中所提到的

(1) 这篇文章的原文載于"美国經济評論"(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6年12月第三期第937至946頁。作者提奧·苏蘭尼-翁格尔(Theo Suranyi-Unger)是美国"叙拉庫斯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的經济学教授。

(2) 原文直譯应作苏維埃軌道，意思是指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陣营。

(3) 奧維德 (Ovid) 是古罗馬的詩人，原名叫 Publius Ovidus Naso，生于紀元前43年，死于紀元后17年，他的詩以想象力的活潑生动著称。

(4) 原注：見政治經济学教科書德文版第一版第294頁和以下各頁。1956年6月人民出版第279至281頁。按原注所指教科書德文版第一版系由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委員会馬恩列斯研究所依照1954年俄文第一版逐字譯出，于1955年由"狄滋書店" (Wietz Verlag)出版的。以后續印二、三、四版、文字均和第一版相同。

名字可能有些意思。資产阶級古典經济学的創始者（威廉·配第、弗朗斯瓦·魁奈、亞当·斯密和大衛·李嘉圖）尽管受到批評，但依照馬克思主义的看法，仍不失为社会科学家，而托·罗·馬尔薩斯、讓·巴·薩伊、弗·巴师夏和查·凱里則被否定为膚淺的"庸俗"經济学派的典型。同样地，西·西斯蒙第和比·約·普魯东被看作"小資产阶級"否定了，而历史学派（威·罗雪尔、布·希尔德布蘭德、古·施穆勒）、奧地利学派（卡·門格尔、弗·維塞尔、欧·巴姆-巴維克）、新古典学派（阿弗里德·馬歇尔、約翰·倍滋·克拉克）、社会有机学派（艾·阿蒙、魯·斯托尔滋曼、奧·施潘）和充分就業学派（約·梅·凱因斯、阿·汉遜），因为多少保持"反动的"观点，因为对工人阶級还保持着不够友好的态度，因为各种各样理論上的缺点，也被駁斥無遺。在馬克思主义的經济学家中，修正主义学派（埃·伯恩斯坦、彼·司徒盧威、米·杜崗-巴拉諾夫斯基）、第二国际的首領（卡·考茨基、魯·希法亭）和"右翼社会主义者"（孟什維克、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列·勃倫姆、卡·倫納）也被否定了。只有早期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亞·伊·赫尔岑、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卡尔·馬克思、弗德里希·恩格斯和他們政治上的徒党（保尔·拉法格、威廉·李卜克內西、奧古斯特·倍倍尔、格·瓦·普列汉諾夫、德米特里·布拉哥也夫）以及一些近代的領导人物如弗·依·列宁，約·維·斯大林，或多或少地受到高度的称誉。

作为苏維埃經济学基础的原則、法令、制度的正面而系統的分析稍微超过了本書的一半。其中兩小部分（甲部和丙部）論述了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經济过渡和各个人民民主国家的經济結構，而占絕大部分的乙部，則專門論述社会主义經济学的一般理論和苏联經济制度的具体情形。

关于向社会主义的經济过渡，着重論述無产阶級革命的技巧和成就，加速度的工業化和农業的集体化、机械化。此外，还着力地說明了充分發展的社会主义在最近时期內对国內經济的社会各方面以及对国际經济关系所發生的影响。

論述苏联社会主义經济各章的次序和批判資本主义經济的次序大略相仿。对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評价是依其对于不断增長的物質需要的滿足和对于整个經济有計划按比例的發展的貢献来确定的。劳动、貨幣、工資、社会核算、农業、国內和国际貿易、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增長、財政、信貸、和国民財富再生产，都依其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的經济的关系得到系統的評价。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頗为乐观的一章，預示着城市生产和乡村生产及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間經济差别的最后消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一口号只是联系到充分發展的共产主义来說的。

苏維埃陣营全部人口几乎有四分之三是住在欧亞兩洲的各人民民主国家中，而教科書仅以三章的篇幅来論述这些国家最近的經济發展，經济結構和对苏联的經济关系，这在比例上显得很不适当。在这有限的范圍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所占的篇幅比波蘭、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馬尼亞、阿尔巴尼亞、蒙古、北朝鮮各国合占的篇幅还多了一些，这虽然是差强人意，但依然是不够的。論述的重点是战后的革命轉变，局部的集体化和工業化，国內經济發展情况以及在苏維埃陣营內部的貿易。

"結束語"只是对全書提出了一个重复的全面的撮要，而对書中帶有根本性質的論断則并沒有提出进一步明确的啓示或發揮。这些結束語跟全書四十二章每章末后从一頁到兩頁的簡短的結論，实質上很相同。結果，結論和結束語却占了和全書很不相称的一个大的部分。另一方面，書中的注解非常少，而且也沒有任何索引。

（二）批判的估价

除了在方法論上側重于黑格尔的辯証法和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外，这書的特点，就是一种强烈的独断态度，这种态度是以生硬而挑衅的腔調表达出来的，是由冲动的情緒激發起来的，同时又反映着党的方針、路綫的指示。这种独断态度所形成的教条主义，表現为不敢偶或逾越党的方針路綫的一种战战兢兢的小气魄。結果，当党的方針路綫表現得完全明确的时候，那里就出現了充溢的狂热和过火的强調；当党的方針路綫表現得不很明确、或者容許伸縮性和相反的解釋的时候，那么就是模糊的措詞，躲閃的說法，甚至于公开的自相矛盾(1)。

另一种馬克思的遺产，就是对德国式的抽象分析和分歧論点之純概念的解答的一种偏爱，在全書中到处都显得突出，而对于法国式或其他拉丁語系国家的理性的思考方法、或者傳統的盎格魯·薩克遜式以实践为基础的經驗的軌范，則只有一些零星分散的回忆而已。职是之故，全書以不同程度的先入之見作为假設的出發点，作为获得証明的基础，作为結論的樞紐，这固然是寻常的方便之門，但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弱点。在絕大部分的章节中，假設和結論間的联系也往往是牢固地前定了的，因为坚持和依靠党的方針路綫，必然削弱了任何眞正的分析的論証的灵活性。

联系到党的方針路綫本身的变动，書中包括：（1）比較長期或相对稳定的方面，（2）显然是暫时的或可变的方面，这兩者間的区别可以作为評价本書合适的依据。前者的稳定性是基于苏維埃經济中若干最基本的因素，而暫时性的方面則往往随党的方針路綫的轉变而轉变。

1. 从苏維埃的观点看来，在長期性方面，可能的优点中，最显著的或許就是在經济思想上、教育上和全盤研究方面上的大規模的标准化，这是由教科書的这种典范强烈地激励起来的。在苏維埃陣营中，合于这种典范的便可以获得一种相对的安定和相应的生产力的增長。

在經济决策方面广泛的指导的統一化，也可以获到一些便利。

至于由市場和私营企業所組成的那些国家，它們的經济学家和商人对于官方發表的苏維埃經济的事实和趋势，大可不必再有什么怀疑了。当然，如果这些官方所發表的事实和趋势与眞正的現实有任何出入的話，这种出入將繼續引起推測性評价中的各种分歧。

关于苏維埃社会中經济方面和相关的政治、历史、道德、法律、行政及其他社会方面、以至于有关的地理情况、技术發展間的密切联系，該書作了一个頗好的論述。当然，在这一本"政治經济学"中，政治上的考虑确定地占优势。在这类的优点中还可以加上一項，那就是著者們在解釋和应用苏維埃經济諸基本原理方面，大体上都能依照党的方針路綫完滿地作成了一种小心

(1) 原注：例如德文版第700頁710頁关于平均和級差的收入分配的自相矛盾的陈述。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66頁和第675頁。

謹慎的学究式的經典注釋工作。

在相应的弱点中，存在着观点上的片面的整齐划一，和在事实的評价上的畸輕畸重而缺乏平衡，这种不平衡的产生可能是由于依賴不同个人的意見和看法和由于在这样一部極端壟断而又具有特殊权力的教科書中任何錯誤都必然引起經济上更多的危險。由于教科書的規定对象，不仅是大学学生而且是文化水平較低的一般广大群众，这就需要在典范的通俗化上做很多工作。这样，經济学上最新的进步的定性和定量的論述方法就不能被采用了。甚至書中的統計資料大体上也是用作簡明的例解，而不是用作分析上的根据或証明。許多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中的引文和引証，以及对多少已經过时的統計資料之經常而偏执的信賴，使人对这本書感到一种熏香衣服的陈腐气息。情緒上的激动一点也不隐諱，因而，求得学术上客观性的任何努力就显得無影無踪了。

2．关于暫时性方面，最好就其三位一体的分类基础加以評价：

(甲)关于东方和西方的經济关系方面，这書反映了斯大林晚期和馬林科夫領导下"新路綫"上半期所特有的那种挑衅性的苏維埃态度。对苏維埃經济發展的最夸張而屡見不鮮的歌頌，对資本主义經济制度和方法的过火的攻击、以及对社会主义經济世界性的早日胜利的渴望和預期，在書中随处都可以看到。例如，关于东西方的貿易問題很少提到过，这自然是不足奇怪的。

(乙)重工業的繼續發展虽然依旧是苏維埃經济的主題，但"新路綫"下对于輕工業、农業和消費者的水平的进展之暫时性的重視，在書中还可以明确地覚察出来。

(丙)全書所表現的經济的意識形态，前后一致地以馬克思、列宁、斯大林这三人間的关系为依据。馬克思被推崇为社会主义經济学的創始者，恩格斯的名字也常常和馬克思的基本学說联系在一起，馬克思学說最重要的进一步的發展則归功于列宁(1)。斯大林被頌讚为曾經把馬克思的經济思想进一步的賦以具体的形式，曾經把近代的經济經驗的要旨加以总結，曾經在現代經济学中精致地闡明了科学思考的新的指导原則(2)。全書引証斯大林的著作或引用其原文，达二十处以上。这些引証或引文的精髓大体上都是苏联流行經济学說的最僵硬最極端的公式化。关于各种經济制度，某些經济發展阶段以至于生产的各部門的严密規定的种种"基本規律"，在書中一見再見，不言而喻地也是由于他个人的影响。書中引証馬林科夫(3)、赫魯曉夫(4)、莫洛托夫(5)、毛澤东(6)和其他决定經济政策的当代領导人物的地方，和斯大林比較一下，眞可說是鳳毛麟角了。至于研究苏維埃經济理論的当代学者，書中連提都未提到过。

(三)將来可能的改变

書中那些比較稳定的方面，对于整个苏維埃陣营經济思想的長期性的統一化，將起着重大的作用，这一点是在意料之內的。現行的学术研究的典范和教育的型式也將相应地标准化起来。

但在苏維埃經济發展的动态过程中，人們也尽可以期待着教科書中那些暫时性的方面会有所修改。倘若党的方針路綫表現出突然的轉变，那末教科書的未来版本就也可能盖上形势轉变的标志。在1956年夏以前，已經發生过兩个这类的轉变。这兩个轉变被决定于：(1)"新路綫"执行了約一年之后开始逐漸削弱；(2)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当时和以后，"斯大林崇拜"被禁止。

1．1955年9月出版的教科書俄文版第二版，表明已經依照1955年三、四兩月間会議所商討的范圍有所改变。参加会議的經济学家代表了苏联十五个重要城市的研究所。会議的决定，以及各大学政治經济学教研室所組織的辯論的成果和讀者应教科書第一版前言中所作的請求而写来的建議，都由負責編审第二版的少数作者(奧斯特罗維季揚諾夫、謝皮洛夫、列昂节夫、拉普捷夫、庫茲明諾夫、加托夫斯基和斯塔罗夫斯基)加以研究。

教科書的第二版又恢复了对技术改进和生产机械化之苏維埃式的傳統的强調，准备在工業化上来一个重新的推进。同时，对"新路綫"后半期被决定保留下来的目标任务給予了更多的注意，因此書中对农業生产、对合作农場(集体农庄)的成本会計、对全国集体的經济計划工作的某些分权化，都表現了更大的强調。关于东西方的經济关系前此生硬的挑衅表示，也在好些方面放低了音調。例如，歌頌苏联經济成就的那些最富挑衅性的自吹自擂和以經济帝国主义、剝削工人、人民群众生活悪化等名目来反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那些最刻毒的咒罵，也多少沉寂了下来。对社会主义革命也重新下了定义，因而不再包括对資本主义經济的直接摧毀。現在他們也承認并不是所有西方国家的职工会都由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所控制，承認并不是所有熟練工人的上層分子都是被收买的，承認并不是所有西方的經济学家都为資本主义辯护，承認有些西方的經济学家也懂得馬克思主义的經济学，承認有些"小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曾經指出过資本主义的弊害，承認在殖民地解放运动中無产阶級并不一定都是唯一的領导集团，承認資产阶級对于这种运动也曾經有过貢献。

2．由于非斯大林化运动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教科書發动了尖銳的攻击，第二版出版后不过几个月，到1956年初也变成陈旧了。不仅那些或显或隐地反映斯大林影响的章节，連書中其他部分也突然变成严重的弱点了。

举个例子，阿·伊·米高揚，由于从1926年以来历任各种重要的职务包括苏联政府的人民委員会委員和好几个經济方面重要的部的部長、中央政治局委員、部長会議副主席等等，所作的反面的批評必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依照他在大会上所提出的坦率的警告，"教科書中关于資本主义發展的現阶段的几章，特别是关于周期性的危机的周期性問題，以及社会主义政治經济学問題，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根本性的研究和修改，如果不承認

---

(1) 原注：見德文版第353頁和以下各頁(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35至339頁)及書中許多其他地方。

(2) 原注：見德文版第358至359頁(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39至340頁)及書中許多其他地方。

(3) 原注：見德文版第468和499頁。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44和474頁。

(4) 原注：見德文版第643頁。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11頁。

(5) 原注：見德文版第318和449頁。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01和425頁。

(6) 原注：見德文版第669和678頁。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36和644頁。

这一点，那就不对了[1]。他接下去說：多数苏联的經济学家“只忙于用各种方法在旧的引文、公式和原則中牽强附会，轉弯抹角”[2]。同样地，苏联最高苏維埃外交委員会主席兼苏共中央委員会主席团委員麦·阿·苏斯洛夫在他的一篇名叫“馬克思列宁理論的創造性运用”的文章[3]中，也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此外，还有其他的会議参加者。可以相信，这些批評主要是从赫魯曉夫和布尔加宁对大会所作的兩个主要报告中得到啓發的。

代表大会閉幕后几个星期之內，苏維埃陣营的經济学專家就已开始研究如何对教科書第二版进行系統的批判。各政治經济学教研室和研究所也組織了另一种会議并且再一次对教科書的結構进行了审愼的檢查。从这些会議所提出的尖銳批評中可以想見第三版可能作出那些重大的改訂。对教科書提出的这些偏执的严厉批判，正好和苏維埃陣营內对第一版所發表的評論和論文那种一致的頌揚成一尖銳的对比。在后一种的評論和論文中，只有極小数的敢于对那种过分学究式的形式主义所可能引起的危險愼重地提出了警告[4]，或者敢于作些小心翼翼的諷示，希望有一些平淡無奇的理論上的改善[5]。苏維埃陣营以外所發表的一些評論往往只是对教科書最严重的弱点加以指出而已[6]。

教科書第一版直到1955年年中还是被热烈地贊揚着[7]。当时，这書还被肯定为：提出了“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經济学的基础的第一个科学概念的体系”；标志着“馬克思主义經济学的發展的新阶段”；構成了“在經济和政治方面都有重大意义的事实”[8]。一年之后，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和繼續召开的專家会議的影响之下，就有人力主將書中的甚至在第二版中的“庸俗的經院主义”、“偏执的教条主义”、“膚淺的过度通俗化”和僵硬地概括出来的“各种基本經济規律”代以对全部詳細內容进行眞正深刻而細致的审查”、“对当前事实进行眞正的科学分析”和“对經济發展的易于变化的趋向”予以刻苦的研究[9]。

关于資本主义下的經济情况，工人阶級絕对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战爭的不可避免性、長期性的失業和不断增長地严重而頻繁的經济衰落等等命題被抛弃了。同样地，生产的有系統的扩張不再是現代資本主义的特征之一，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有必然的联系，現代国家資本主义有計划的干預政策，必然是玩忽無能——这一类的意見和看法也不再被保持了[10]。

和教科書第一、二版的情况正相反，現在給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政治經济学还远远地不是一个完成的科学体系；現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流通，市場的供給和需要，以至生产活动之物質的奬励，还需要加以很大的注意。同样地，現在給着重指出的是：金子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惟一的价值尺度；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新經济政策对于私营商業、手工業和国家資本主义的讓步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社会主义的經济計划工作必須比以前有更多的伸縮性，多种多样性和地方分权化[11]。

非斯大林主义和“回到列宁”的热烈运动是密切地联系着的，被否定的斯大林的主張千篇一律地給代以从列宁主义和（当然地）馬克思主义的軍械庫中剛剛重新發現出来的意見[12]。最后，似乎还有一种不断增長的要求，希望对各个欧洲和亞洲的人民民主国家中所特别發展出来的向社会主义逐漸过渡的經济方法多作些分析的研究，以作为教科書的补充。教科書前此对俄国式突进的經济革命所表示的那种片面性的强調，似有遭受日益尖銳化的批評的可能[13]。

对这些評論加以估价来推測教科書俄文版第三版可能出現的修改，必須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可能的修改只会影响到書中的我們叫做暫时性的那些部分。書中那些或多或少地稳定的方面会保証着这書在經济学史上的独特地位。（編譯組裘 譯）

---

(1) 原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总結报告。第六个五年計划总結报告，發言摘要和祝詞”德文版（杜塞尔多夫：新知識出版社 Verlagwas Neue Wort 1956年版）第271頁。譯者按，上面的文字系按英譯的引文直譯的，唯与“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發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4月第一版）第271頁的譯文有所出入：“关于周期性危机的周期性問題”，后一譯文是“关于周期性危机的性質和周期性的問題”；“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根本性的研究和修改”后者作“还需要有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和充分的加工”。

(2) 原注：見前揭書第273頁。譯者按：这一节英譯文字的原意和人民社版汉譯的文字亦有出入，后者是“經济学家們……他們只好充当重复旧公式和背誦旧材料的書呆子”。（第125頁）。

(3) 原注：見前揭書第223頁。

(4) 原注：“关于这类早期的警告，格·科茲洛夫和莫·沙可夫在“共产主义者”杂志（莫斯科：1954年9月第31卷第78至93頁）上批評教科書的一篇文章的最后二頁，可算是很突出的”。

(5) 原注：汉斯·約特 Hans Jeuthe 的“生产成本和銷售成本。关于苏联政治經济学教科書第三十三章的討論集”見“德国財政”杂志1955年2月第9期第90至91頁和134頁及以下各頁。

(6) 原注：“屬于这一类的有（德文的）下列各篇文章：埃·約·亞历山德洛甫（E. J. Alexandrov）的“苏联的經典”（見“新社会”杂志1955年3—4月第2期第76頁和以下各頁）；法蘭滋·洛普（Franz Rupp）的“政治經济学的一本教科書”（見“人民經济”杂志1955年9月第9期第12頁及以下各頁）；克劳斯·梅涅尔特（Klaus Mehnert）的“关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經济問題”（見“东欧”杂志1952年12月第2期第401頁及以下各頁；此文系討論斯大林对于教科書編审工作的貢献）”。

(7) 原注：（匈牙利）“經济評論”杂志1955年5月第二期（第517至533頁）刊載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經济学的偉大成就。政治教科書的匈牙利版”。1956年6月第三期（第657至675頁）刊載的塔瑪斯·納吉的“政治經济学的几个問題。政治經济学教科書新匈牙利版。”这个杂志是匈牙利科学院經济研究所的定期刊物，納吉是該所所長兼杂志的編輯委員。前一篇的文章的作者沒有被明显地指出。

(8) 原注：前条第一篇論文第521至522頁和第533頁。

(9) 原注：前揭塔·納吉論文第659至656、665、670和675頁。

(10) 原注：同前第660頁和以下各頁；第667頁。

(11) 原注：同前第669頁和以下各頁；第675頁。

(12) 原注：同前第667至668頁。

(13) 原注：同前第673至674頁。

駁斥潘序倫在会計書本中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会計的右派謬論

婁尔行

潘序倫是伪裝的会計学者。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披着伪裝的学者外衣，假借学术活动的名义，出版了大量的会計書本。在这些会計書本中，他肆意地向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翻开他写的会計書本，我們就不难發現，原来在这些書本里，潘序倫主要不是在發表他学术上的見解，而是在提倡他政治上的反动主張。他的政治立場很明显：一方面竭力为資本主义这个腐朽制度进行辯护，宣揚資本是永恒的、剝削是合理的等等謬論；另一方面則竭力詆毀社会主义，尽力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从他标榜国营企業会計的書本中，我們还不难發現，他不是眞心誠意地在闡明社会主义会計，而是別有用心地在对社会主义会計加以汚蔑、歪曲。他的用意也很明显，他要他的讀者放弃社会主义思想，信从他的資本主义会計，在会計学的研究上走資本主义道路——一句話，他企圖攻击和占領会計学这門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陣地。

潘序倫近来散布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謬論，叫囂三反、五反运动完全否定了資产阶級的好处，打击了他搞会計工作的积極性。是的，五反运动以后，潘序倫不再从事他的所謂"会計著述"工作了。他不再写会計書本，讀者也就不再受他反动思想的毒害了。这正是五反运动所做出的一件天大好事。同时，他既然說五反运动打击了他搞会計工作的积極性，我們倒不妨来看看，他在五反运动以前搞会計工作所积極圖謀的到底是些什么，是为了社会主义呢，还是为了資本主义。

本文要揭發出潘序倫在解放后所写書本中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会計的若干右派謬論，并專就这一部分作一些初步的分析。

(一)

潘序倫的会計書本中含有不少攻击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謬論。

他攻击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所用的一个最恶毒的手法，就是故意曲解社会主义經济的性質，把社会主义企業和私营的資本主义企業等同起来，混为一談。且举出几个例来看看：

> "企業的組織，就業主的立場来講，有公营与私营之分。公营企業的業主便是整个国家，或是某一地方自治团体，某一政府机構……"（以上引語見基本会計学，第284頁，引語中的重点是本文作者加的，下同）。
>
> "公营企業如由一个政府机構所創設，相当于私营企業中的独資組織，如由几个政府机構联合創設，便相当于私营企業中的合伙組織。事实上有許多公营企業使用公司名义，……公营企業的出資人卽政府对于企業債务所負的責任，如不提明为有限或無限，总該認定它是無限"（基本会計学，第285頁）。
>
> "合作社……可以分为：甲、有限責任合作社，乙、保証責任合作社，丙、無限責任合作社等类"（基本会計学，第285頁）。

我們注意到，潘序倫在写以上这些东西的时候（1950年），宪法虽然还未公布，但已經有了共同綱領。共同綱領中規定得很明白："国营經济为社会主义性質的經济"；"合作社經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質的經济"。他写的以上这些东西，不仅無視于共同綱領的規定，还狂妄地公开采用旧法观点。共同綱領是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基本大法，采用旧法观点来替代共同綱領，就是拒絕接受这个基本大法，就是敌視新中国，敌視共产党的領导的具体表現。其次，他抹煞了各种所有制的根本差别，从什么"業主"的立場来划分各种企業，妄圖使他的讀者們相信，国营企業、合作社和私营企業之間，仅有出資人卽"業主"的不同，而無本質上的区别。我們必須指出，实行生产資料的全民所有制，意味着生产資料为創造它們的劳动者所占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財产。在社会主义經济中，生产資料不再是企業"業主"的資本，不再是資本家所占有的剝削手段。它們为劳动者所掌握和使用，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因此，在社会主义性質的国营企業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業主"。把国营企業說做国家"業主"的企業，是对生产資料公有制最恶毒的攻击，也就是从根本上来詆毀社会主义經济。

潘序倫的反动言論还表現在对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攻击。他反对劳动創造价值这一普遍眞理，荒謬地主張"利潤是資本的产物"。我們且看，他在講到社会主义国

营企業的盈亏时，写道："盈亏即指資金經企業本身运用后，所有增加或減少之数而言"。繼而又写道："照会計慣例来講，所謂損益只發生于成品的銷售阶段，而不發生于其供应及生产阶段(以上引語分見国营企業会計概要，修訂本，第104頁和128頁)。我們知道，潘序倫在他的会計書本中，一貫地主張国营企業和私营企業除了資金来源有所不同外，兩者并無什么区别。因此，他在这里講国营企業所說的盈亏是資金运用的結果，实际上等于在說資本主义利潤的来源，乃是由于資本家运用了資本。也就是等于在說資本家沒有剝削，資本家取得的利潤乃資本运用所帶来的报酬。根据这种論点加以推演，自然潘序倫就要欣賞和附和"定息不是剝削"这种荒謬絕倫的右派言論了。其实，不管說"利潤是資本的产物"也好，說"定息不是剝削"也好，其用意只有一个，这就是企圖为資本主义利潤，或者更确切地說，为資本家的剝削的合法性进行公开的辯护。这种說法，根本否定价值是由劳动創造的。同时，它还企圖推翻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說。我們知道得很清楚，剩余价值学說揭穿了資本主义剝削的实質，暴露了資本主义制度中不可調和的阶級矛盾。正因为这样，这个学說照亮了無产阶級革命的道路，成为推翻資本主义制度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潘序倫"利潤是資本产物"这种謬論，徒劳地想掩盖資本主义剝削的眞相，妄圖冲淡兩个敌对阶級的矛盾。毫無疑問，这是对馬列主义基本理論的猖狂进攻，是企圖从理論上来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極其反动的言論。

我們还要指出，他为了証明他的反动言論，拾出了所謂会計慣例，这也是一派胡說。他所說的会計慣例，是根本不存在的。社会主义会計学的学者們，从来就是承認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由劳动創造出来的。沒有生产过程，沒有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就不会有价值。沒有价值，也就不会有价值的增殖，不会有損益。我們在会計上所存在的慣例，只是習慣于在成品銷售之后，計算企業經营的財务成果(即損益)。这是因为，在成品銷售之后，我們才有可能用一定的数字正确地計算出实际發生的損益。这种計算，絲毫也沒有暗示損益是發生于成品銷售阶段，而不是發生于生产阶段的。潘序倫的說法，正好証明他对于会計学并無深刻的理解，只是他妄圖以他自吹自擂的所謂会計学术，作他反动言論的掩护而已。这种异常拙劣的手法，只要稍具会計常識的人，也是不难識破的。

潘序倫反对社会主义經济，还从故意曲解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質，来陰謀破坏劳动人民之間的团結。他在写出"国营經济是社会主义性質的經济"之后，接着写道："国营企業經济在基本上已消灭了資本主与劳动者間的对立关系"(以上引語均見国营企業会計概要，临时版，第1頁)。他混淆視听，狂妄地把資本主义生产关系，硬套到社会主义企業的头上。既然他已知道国营經济的性質是社会主义的，他必然明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他必然明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按其实質来說，根本不同于以生产資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資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資本主义生产中，劳动者是和資本主对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則建立在生产資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劳动者不受剝削，在生产过程中实行同志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产品的分配是有利于劳动者本身的。他明知这样，然而他却偏偏說，在社会主义性質的国营企業中"基本上消灭了資本主与劳动者間的对立关系"。在他言下，"对立关系"仅仅是基本上消灭，那末当然还未完全消灭，而这种关系，竟还是"資本主与劳动者"間的关系！眞是狂妄透頂，荒謬絕倫！很明显，这是他妄想煽动劳动人民起来反对国营經济，是針对社会主义制度所施放的一支毒箭。

潘序倫或者会說，他上面这句話不过是一时失言，在他国营企業会計概要这本書的修訂本中已予删除，可資証明。我們不妨再分析一下。我們看到，就是在这本書的修訂本中，这种謬論也还有踪迹可寻。他在說到国营企業經营資金来源的时候，說道，国营企業可用"延期支付职工工資"的方式，以"补充其自有資金之不足"，(国营企業会計概要修訂本，第7頁)。这种說法，实質上是他上述謬論的發展。我們知道，在資本主义企業里，資本家剝削劳动者是多方面的，不擇手段的。延期支付职工应得的工資，正是剝削的方式之一。社会主义性質的国营企業，絕不会有这种行为。在国营企業中，只是因为工資結算方法的关系，只是因为企業不可能每天把工資結算付清，才有一部分应付工人和职員的工資，經常参加企業資金的周轉額，構成了"視同自有流动資金"。因此，国营企業絕不是用延期支付工資的方式，作为自有資金的补充手段。潘序倫在說到这点时，故意曲解。这种說法，显見得是伸引了他"国营企業中存在对立关系"这一荒謬論点。他运用这种說法，企圖引起广大职工群众的不滿，陰謀从人民内部来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潘序倫在說到国营企業的企業奬励基金时，先用譏諷的笔調写道："我国国营企業的生产条件，在目下还不能算是那么良好，生产、銷售、財务計划，在这恢复或新建时期也不見得会定得怎样的正确。企業职工如能完成其获取計划利潤(或維持其計划亏損)的任务，也算得是一件难能可貴而值得奬励之事了"(国营企業会計概要，修訂本，第139頁)。他对社会主义計划經济的輕蔑的神情，如此躍然紙上，使我們看到这里，仿佛也看到了这个前伪經济部次長鄙視人民經济事業，不屑一顧的一副丑惡嘴臉。資产阶級的御用学者們，在無法駁倒我們計划

經济的优越性时，总是用計划訂不好、訂不正确等流言蜚語来肆意攻击。潘序倫就是这一类人中的一个。他近来在上海政协会議上又大肆叫囂，要求統計因計划錯誤而造成的損失，借此来汚蔑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正是这种陈詞濫調的一貫表現。

关于国营企業企業獎励基金，他在譏諷之余，又对前政务院財政經济委員会發布的企業獎励基金提用办法(1952年1月15日發布)，作了别有用心的曲解。查这項办法，对各类企業从利潤中提留企業獎励基金百分率的高低，有明文解釋。办法中說，百分率的高低，是根据不同企業的不同劳动强度和影响职工健康程度以及提高生产定額和降低消耗定額的可能性来規定的。他在写書时，显已看到了这个文件。然而他偏偏惡意曲解，說道，"对于职工的生命和健康具有相当危險性或影响的重工業"百分率最高，"对重工業中比較安全輕便各業……及輕工業中比較辛苦不安全各業"百分率次之，"工作比較輕易的輕工業"百分率最低（以上引語均見国营企業会計概要，修訂本，第139—140頁）。我們必須严正指正，潘書中这段文字，对提高生产定額和降低消耗定額的可能性避而不談，而妄自添上"安全"、"不安全"、乃至"生命危險"等字句，不仅是对我人民政府法令的極度藐視，而且还是对职工感情的惡毒挑撥。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从来是十分重視生产安全，劳动保护的。我国工業企業，在解放以后莫不在党和政府的領导之下，大力进行了安全生产的宣傳教育，采取了許多劳动保护的具体措施，增添了設备，建立了檢查制度等等。潘序倫抹煞了这些事实，妄称有不安全的企業，有工人操作要冒生命危險的企業。照他說来，翻身了的工人，竟还要冒着生命危險，从事不安全的操作，好像国营企業比之剝削职工血汗的資本主义企業并沒有什么区别。可見这也是直接制造职工不滿，挑撥离間，蓄意进行破坏的惡毒言論。

潘序倫在書本中攻击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像以上所說的以职工为对象，歪曲事实，尽力制造不滿而已，他还鼓励投机，企圖扰乱社会的經济秩序。在講到企業中多余的資金时，他写道："这項多余的資金，若听其呆存于低利的銀行活期存款，不如暫时設法予以利用，購些买卖轉讓極其便易的有价証券，以获取較高的利益"（会計学教程，第二分册，第183頁）。看来，这位"經济学家"，倒是投机倒把的能手！人民的金融事業是社会主义經济建設的重要一环，把錢存入人民銀行，間接支援建設事業，也是一种爱国行动。这种起碼的經济常識，在潘序倫不会不知道，可是他却教唆讀者不要把錢"呆存"于銀行，要把多余資金，放入投机市場，去买卖証券，兴風作浪。这是他从扰乱社会主义經济来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策划，陰謀使我們的經济生活不得安定，經济建設受到挫折，不能够稳步前进。当然，他的陰謀是不会得逞的，而他惡毒的策划，則在書本中已暴露無遺了。

（二）

潘序倫的資产阶級反动思想，表現在会計学的闡述和研究上，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会計，反对会計学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从他的一些所謂"会計著述"中，我們看到，他反对社会主义会計主要是从兩方面入手的。第一，他制造和宣揚"新民主主义会計"，用它来堵塞会計学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并繼續为他的資本主义会計找寻市場。第二，他公开地、大量地采用資本主义会計的論点来闡述社会主义会計，用偷天換日的办法，妄圖使資本主义会計長入社会主义会計。

他从主观想像出發，机械地套用共同綱領上的語句，从五种經济成分中推論出所謂五种"会計成分"，然后把它們湊合起来構成了他的一套所謂"新民主主义会計"理論。他写道，一部会計学教程"必須……能包括五种的会計成分，即：(1)具有社会主义性質的国营企業会計；(2)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質的合作社会計；(3)农民及手工業者的个体会計；(4)具有国家資本主义性質的公私合营企業会計；及(5)仍具有私人資本性質的私营企業会計"（会計学教程第一分册前言，第1頁）。根据这套理論，他于是編写了会計学教程、国营企業会計概要和苏联会計述要等几本書，儼然自成体系。在这个荒謬的体系中，他公然以資本主义会計作为骨干，使社会主义会計退居于从屬、次要的地位。無論从这几本書的篇幅或者內容来看，这样的論断都是無可爭辯的事实。就是他自己也明白承認这一点。他說，国营企業会計概要一書，是作为"已經学过私营企業簿記会計的讀者們作补充讀物之用"的（国营企業会計概要修訂本，例言）。

我們再看，在他的所謂"新民主主义会計"中，对于具有社会主义性質的国营企業会計和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質的合作社会計，他又是怎样荒謬地来解釋的。关于国营企業会計，他說，从"国营企業来看，因它們要与私营企業同样繳納工商業税，又因产品供銷計划在某些国营企業还不能徹底实施，还不能不在具有一些竞爭情况的市場中活动，因此它們所用的会計原理与方法，还不能完全脫离資本主义会計的形态"（高級会計学教材，序言，第2頁）。关于合作社会計，他說，"合作社簿記或合作社会計等名辞只可說淨值会計的一支"（高級商業簿記教程，序言，第3頁）。照他的說法，社会主义会計脫离不了資本主义会計的形态，而半社会主义性質的会計又不过是資本主义会計中的一股支流，那末很明显，構成他新民主主

义会計的所謂五种"会計成分",碩果仅存者,只有資本主义会計一种而已。其实,"新民主主义会計"不过是他玩弄的一种手法,他的眞正的意思是只承認有資本主义会計,不承認有社会主义会計。

我們知道,会計学是一門有明显阶級性的科学。在一定的社会經济形态下,它是为一定的經济基础服务的。在資本主义社会,会計成为帮助資本家进行剝削的工具之一,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它必然要为巩固和發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發生作用。我們又知道,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屬于社会主义体系、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具有过渡性質的社会,在过渡时期,居領导地位的是社会主义經济,而絕不是資本主义經济。資本主义經济要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而逐步归于消灭。因此,在过渡时期,作为上層建筑的会計学,决不可能是实質上就是資本主义会計的所謂"新民主主义会計",而必然是社会主义会計。

由上可知,潘序倫鼓吹的"新民主主义会計",实質上乃是他反对社会主义会計的一种飾詞。

他反对社会主义会計的另一手法是在講到国营企業会計时,尽量用資本主义会計的观点来解釋,或者逕把它們等同起来。这种歪曲社会主义会計的說法,在他的"著述"中是不乏例子可寻的。在他的国营企業会計概要一書中,几乎俯拾皆是,尤为众多。例如:

"国营企業的自有資金及其积累同是屬于全体人民或劳动大众所有,所以沒有严予区分的必要,……不妨把自有資金及积累并成一类,而称之为淨值"(会計学教程,第一分册,第155頁)。

"严格地說,所屬投資……这个科目乃是企業对所屬企業或机構的資金統制科目"(国营企業会計概要,修訂本,第56頁)。

"国营企業各种定額資产的会計处理,基本上与普通会計所講这些資产的处理方法并無不同"(国营企業会計概要修訂本,第86頁)。

說国营企業的"会計記录要在能正确表現一个企業的資产負債狀况"(国营企業会計概要,修訂本,第93頁)。

"国营企業会計事务的处理程序如与一般私营企業会計事务的处理程序相比較,在大体上可說是相同的"(国营企業会計概要,修訂本,第175頁)。

以上所举出的,不过是他这一类謬論的一部分而已。但就憑这些例子,已足証明,他裝着在闡述社会主义会計,实际上他所推崇的还是一套腐朽的資本主义会計观点。这些例子也証明,关于会計学要走什么道路的問題,他是态度坚定,爱憎分明的:他对于資本主义会計是爱护备至,对于社会主义会計則抗拒惟恐不力。

随着社会經济基础的改变,会計的目的、任务、对象和方法,都跟着發生根本性質的改变。社会主义会計与資本主义会計有着根本的区别。先拿任务来說,社会主义国营企業会計的任务,主要在于反映和监督計划的执行情况,保护社会主义財产,从而保証經济核算制之得以巩固和貫徹。它絕不是像資本主义会計那样,"要能正确表現企業的資产負債狀况"。資本主义会計为了滿足資本家的要求,确实以編制資产負債表列作首要的任务,因为資本家所关心的,除了他們剝削收入以外,就是他們剝削手段——資本的消長变化。社会主义会計也要編資产負債表,但是,这是作为一种会計的方法来使用的,通过資产負債表来檢查和分析企業完成計划的程度,借以發掘企業生产的潛力。再拿方法来說,社会主义国营企業会計有严密的会計組織,要按照統一的会計科目来反映各种經济業务,要編制有統一格式的会計报表,会計事务的处理是严肃、及时、并且是力求正确的。所有这些,和私营企業会計方法上的混乱、虛假、自各为政等相比較,絕不是什么"大体相同",而是有很大的差别。就以各种定額資产的会計方法来說,社会主义会計中按定額来計算和考核企業流动資金的运用情况,以計划成本来处理日常的会計記录,要計算和反映定額和超定額的短缺等,这些都是私营企業会計(潘書中所称的普通会計)中所沒有的內容。以上这些說明了,实际上在社会主义会計与資本主义会計之間存在着很大的本質差别。然而潘序倫竟說兩者的任务和处理方法"基本上""并無不同"。由此可見,他在标榜社会主义会計的花招之下,实际乃是販卖私貨,宣揚着資本主义会計。

他把国营企業会計中的所屬投資,說成"資金統制科目"。他的意思是說,国营企業和所屬企業或机構間的关系乃是壟断資本的股权公司和附屬公司之間的关系。他主張国营企業的自有資金和积累"不妨""并成一类",称之为"淨值"。他的意思無非是說,国营企業乃国家当"業主",和私营企業的独資經营并無区别。这些說法都套用了資本主义会計的观点,歪曲了社会主义会計。不仅如此,这些說法还把国营企業和資本主义企業等同起来,也污蔑了社会主义性質的經济。

我們必須指出,不顧事实,硬把資本主义会計观点套用到社会主义会計头上,或者硬把兩者等同起来,乃是企圖取消社会主义会計,企圖以資本主义会計来取而代之的資产阶級复辟陰謀。

(三)

从以上談到的一些問題来看,潘序倫在他会計書本中所积極从事的,显見得是在宣揚資本主义,攻击社会主义。他利用会計書本,积極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会計,乃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駁斥費孝通、李炳煥、吳承禧、楊蔭溥等右派分子誣蔑上海財經学院积压人才的謠言謬論

李鴻寿

右派分子費孝通在全国宣傳工作会議上攻击党对資产阶級社会学教师的安排和使用問題时，曾以上海財經学院为例，說有教师140余人未开課，积压人才，未曾發揮潜力。据費本人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座談会上的交代說："从1955年年底起，不但决意搜集社会学教师的安排問題，而且扩大到其他資产阶級社会科学，先是財經方面。1955年过上海时，就打听了上海財經学院的情况"。費孝通要打听我院的情况，就需要在我院找寻"內綫"，供給"情报"。右派分子李炳煥（我院副院長，民盟上海市委会委員）吳承禧（我院前教务長，民盟上海市委会常委）楊蔭溥（我院前会計系主任）就里应外合地勾搭起来对我院进行破坏活动。

李炳煥經常叫囂我院有很多老教授沒有开課，到了党整風开始，他更到处宣揚，利用这枝毒箭作为向党猖狂进攻的武器之一。据李炳煥自己的交代，当1955年年底費孝通到上海进行陰謀活动并向他的同党面授机宜时，李炳煥曾参加过座談会，并且供給了不少被他所歪曲的以及揑造出来的材料。吳承禧不但在1955年12月冒用了民盟上海財經学院区分部名义，向民盟中央故意夸大和歪曲地反映說上海財經学院未担任教学工作的教师有160余人；而且在1956年到北京时还特地向費孝通汇报。楊蔭溥在上海市宣傳会議中与右派分子姜庆湘一搭一档地唱着同样的論調。他們說："一直到現在，在全国許多高等学校研究机关里还有着不少人整天沒有事情可做，無从貢献自己的力量，造成了人力的極大浪費"。并且举例說上海財經学院有100多教师，現在还沒有工作。同时，右派分子沈志远也在1955年底民盟市委座談会上說上財有100多人沒有开課。

这些右派分子或者說我院有140余位教师未曾开課，又說有160余位教师未担任教学工作，或者說我院有100多教师沒有工作做。似乎我院积压了很多人才，浪費了很多人力，而領导上也一直不聞不問，听任这种情况長期存在下去。企圖用这样一个被他們所夸大了的和歪曲了的事例来攻击和排挤党在高等学校中的領导，挑撥离間党和知識分子的关系，来达到他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

我們知道夸大事实、歪曲事实、抓住一点、抹杀全盤是一般右派分子所用的慣技，在这个問

这个事实說明了，他最近大肆攻击共产党的領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叫囂反对苏联，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大量散布右派謬論，决不是偶然的事情。他所写会計書本的荒謬內容和他最近的右派言論，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如果我們把这兩方面的謬論联系起来看，他的右派面目，就更加暴露無遺了。这是他解放几年来，拒不进行認眞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一貫地坚持他資产阶級反动立場的必然結果。

这个事实指出了，他会計書本中的問題，并不單純是一个学术性的問題。他在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推广和發展社会主义会計这些帶有基本性質的問題上，抱着根本和我們不同的态度。这完全是一个政治立場問題。他站在他反动的資产阶級立場，企圖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取消社会主义会計，千方百計地为資本主义制度和資本主义会計辯解，妄想証明剝削是合理的、資本主义会計观点可以适用于社会主义企業。我們的态度与他完全相反，我們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推广和發展社会主义会計。我們会計工作者，决心要保衛我們社会主义会計的思想陣地，我們要坚决駁斥这些右派謬論，粉碎它們的陰謀詭計。

題上也同样不能例外。然而事实总归是事实，事实終于是胜过雄辯的。右派分子的謊言謬論只能蒙混于一时，終久是站不住脚的。現在我以上海財經学院一个教师的身分，同时也以行政負責人之一的身分，根据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来談談这个被右派分子所夸大歪曲了的事实眞相。

大家都知道，我院是从 1950 年起由华东地区二十多个院校系科合并而成，尤其在 1952 年大規模院系調整以后。华东地区大部分的財經院系教师集中，情况非常复杂，当时确是有一部分教师未能开課。1953 年山东財經学院調整来院，人数更为增加。后来我院对外貿易專業并入外貿学院，有一部分教师沒有随同轉入該院，因而他們就不能不在一定范圍以內改換專業，准备新課。此外，保險專業撤消后也發生一部分教师未能开課。当时未开課教师前后总計有 76 人。

未开課的主要原因有下列几种：（1）年老体衰或長期生病休养；（2）本人專業不适合学校需要，無課可开；（3）業务观点陈旧或業务水平很差，不宜开課；（4）少数人有严重政治历史問題而且政治思想反动。

我院对上述未开課教师的安排处理，从 1953 年卽开始进行。当时遵照 1953 年华东高教局关于安排处理未开課教师的指示精神，根据每位教师的具体情况，逐步分批安排。安排办法大致有下列几种：

（1）經进修、备課、試教后陆續开課；

（2）照顧本人專長專業外調其他高等学校，中等技术学校等任教；

（3）根据本人具体情况及个人志願，分别担任科学研究、翻譯、資料等工作。

1956 年初領导上又檢查了这一工作，对于部分教师的工作安排得不够妥当的加以重新調整。在处理过程中，我院曾对外联系了几十次，并数次召开未开課教师座談会征求意見。由于領导上的重視和努力，我院未开課教师基本上已妥善安排处理結束，76 人中除 2 人因病休养以外，仅仅只有 9 人未开过課，而在这 9 人之中担任科学研究的有 5 人，担任翻譯工作和資料工作的各 2 人。也就是說他們虽然沒有开課，但都在担任着一部分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而且都是与提高教学質量有关的重要工作。去年春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雷潔琼由北京来我院視察未开課教师的安排情况，我院特地邀集了一部分有关教师举行座談会。到会的教师都表示对自己的安排处理并無意見。由此可見，右派分子所叫囂的有 140 余人未开課啦，有 160 余人未担任教学工作啦，或則說有 100 多教师到現在还沒有工作啦，积压人才啦，浪費人力啦，甚至認为学校領导不关心，不处理等等，都是抹杀事实的謊言。

右派分子也許会狡辯說：由于你們学校所分配的招生名額比較少，学生少，教师多，每学期总有許多人沒有开課任务，因此就不得不分配他們去做别的工作，不能發揮教师們的力量，造成了人力上的浪費。如果是这样講，就不但与事实不完全符合，而且还帶有严重的片面性。

首先应該指出：各高等学校的招生任务是根据国家需要作有計划的安排的，解放以后，一方面由于我們需要大力發展工科，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另一方面因为原有財經院校的学生人数就已不少，需要集中力量进行教学改革和提高教学質量，所以暫时將招生数字减少一些是完全正确的。况且我院的学生来源并不限于統一招生中所分配的名額，我院有單独招生的夜校部。而且为了适应業务部門的需要，除不断扩大夜校部的招生名額外，又在校內校外举办專修班、訓練班和講座。根据过去的統計，担任这些班級开課任务的教师人数，在一个学期內曾达到 95 人之多。此外，在 1957 年又添設了函授部。这方面也需要配备一定数量的师資力量。这些事实都說明了我院領导上一直在努力扩展教学任务，尽量發揮着現有教师的力量来滿足不断增長着的客观需要。其次，是不是如右派分子所說，我院每学期总有許多人沒有开課任务，因此就不得不分配他們去做别的工作呢？不是的，在这里右派分子不但是故意地夸大了数字，而且也是不加分析地进行歪曲。根据过去的統計，每学期是有許多教师沒有开課任务，例如有一个学期有过 137 人，但其中除了需要長期休养無法任課的 14 人，需要經过培养才能任課的助教 44 人，担任行政工

作的6人，所以实际上只有73人，这些教师虽然沒有任課，但都分别担任着与教学有关的工作，其中包括編写教材，准备新課，也包括进行科学研究、搞資料、进修以及到業务單位实習等等。我們認为这些都是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教学工作，而且在这些工作中都能發揮教师的力量，共同为既能滿足客观需要又能不断地提高教学質量而努力，任何偏輕偏重的看法都是片面的，而且是有害的。大家都知道，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搞自然科学的教师可以就原有的基础上逐漸發展，但是搞社会科学的教师就需要下一番弃旧更新的工夫，这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簡單工作。如果只强調扩充开課任务，而不照顧到現有的能力，显然是有問題的。正因为如此，准备新課、編修教材和翻譯、資料等工作就成为不断掌握和丰富教材內容的重要关鍵，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理論联系实际的問題上也存在着同样的艰巨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須充分运用教师們的集体力量，分工合作地来进行。正因为如此，科研工作、資料工作以及进修、实習等等，也就成为联系实际进一步提高和改进教学內容的必要手段。这些都是教学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不管教学任务輕或是重，都必須分配一定的力量来进行这些工作，当然如果趁开課任务还不太重的情况下来进行，条件上更是有利的。最近我院整風运动中，有的同志还主張适当地压縮校內外專修班，訓練班等开課任务，抽出更多的人到業务部門去实習，加强理論联系实际，提高教师的業务水平，以便將来更好的更大的滿足培养人才的需要。这种主張是否正确，暫时不去研究，但是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教师中的确有这样一种看法和要求。因此，右派分子如果認为我院的教学任务少，許多人沒有开課任务，不得不去做别的工作，因而不能發揮教师的力量，造成人力上的浪費等等，完全是脫离实际不加分析的片面之談，是極其謬謬的。

当然对于教师工作的安排处理是一件細致复杂的工作，不可能毫無缺点。在安排的过程中也遭遇到一些思想問題，如不願調离上海，不願改換新的專業等等，沒有很好地加以解决，工作中常常縮手縮脚，陷于被动。因此到目前为止，还存在着机構較大人員較多的現象，必須再进一步的調整和安排。我院的党对于这些情况也从来沒有否認过或忽視过。在这次整風运动中，还特地提出如何充分發揮我院教师潜力作为一个專題發动大家討論和爭辯。同志們也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根据具体情况，提出批評和建議，帮助領导徹底地进行整改。但右派分子却利用这个机会故意夸大和歪曲事实眞相来进行誣蔑和攻击，把我們已經基本上解决了的未开課教师問題，說成原封未动，并在数字上加以扩大；把已經在各种教学工作中进行着艰辛劳动的教师說成是無事可做，这是我們所不能容忍的。

我們知道，在大規模院系調整时，党和政府是把所有高等学校的教师全部包了下来。当时的情况是泥沙俱下，魚龙混杂。事实証明，在当时未开課教师76人中就有反革命分子四人先后被捕。在这次被揭發出来的右派分子中，就有不少人曾在講堂上散布过許多反动言論，毒害青年学生。因此，学校領导对于教师工作的安排，尤其是开課任务的分配，采取审愼态度，是完全必要的。

右派分子李炳煥是我院副院長，右派分子吳承禧、楊蔭溥都曾在我院工作过，而且是行政負責人（吳任教务長、楊任会計系主任）对于我院教师的安排情况，不但知道得很清楚，而且有时还参加过安排工作。例如楊蔭溥在安排会計系教师工作时（1956—1957学年第二学期），他自己就主張把課排得集中些，留出一部分教师来編修教材，进行进修和实習等工作。現在他們都和費孝通、姜庆湘、沈志远搞在一起，不惜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为他們献謀策划，他們的用意何在，目的何在，是非常明显的。

一切事实已經清楚地告訴我們，他們这些活动就是章罗联盟陰謀活动的一个部分。根据費孝通自己的交代，承認复辟資产阶級"社会科学"是章罗联盟复辟資本主义社会陰謀的一部分，而他是一个主要的鼓吹者和組織者。他說："我一貫地执行罗隆基在政协發言里所做的指示，就是从旧社会科学者这个'很小的角度'里打开缺口，而且从安排使用問題上去挑撥党和知識分子的

关系”。他又說：“挑撥党和旧社会科学者的关系，还不过是章罗联盟陰謀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要复辟資产阶級社会科学来为复辟資本主义服务。更具体地說，章罗联盟更利用旧社会科学者去搞反动的陰謀活动。包括提供向党进攻的資料，扩大反党的思想領域，制造資产阶級政治綱領，为夺取共产党的領导权的陰謀服务。”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他們就蓄意串联知識分子，注意調查所謂“旧社会科学者”的使用安排問題，进行所謂“專題研究”，到处扑風捉影，点火煽动。反对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主張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一方面表示他們是最“关心”知識分子的，也是最“爱护”人才的，使一部分立場不稳是非不明的知識分子受到他們的迷惑，离开了党，离开了社会主义，和他們一齐滾进右派的泥坑里去；另一方面攻击党的領导，說党是不关心知識分子的，也是不爱护人才的，意圖借此証明他們所謂“外行不能領导内行”的謬論，妄想进一步来篡夺党在高等学校中的領导权。費孝通說：“关于人才的使用和安排問題的研究，应該由过去学資产阶級社会学的人来担任”。他們的用意，难道还不够明显嗎？同时在右派分子中不是还夢想搞出一个聘用人才的“自由市場”嗎？有了这个“自由市場”，就可以使他們的“人才”大批出籠归队，从而为实現他們的政治陰謀准备条件。这又不是極其明显的事嗎？

这里还必須指出，在我院所揭發的右派分子中对同一問題，一呼一应，一唱一和，共同进行着陰謀活动的还大有人在。例如右派分子張畏凡、叶元龙不都在异口同声地說：“学校的人事安排有問題，沒有开課的教授有60人之多。”“我院过去对教师的特長不了解，所以积压了許多人才，系、人事科干部对此不聞不問。我認为教师应該有自由市場，这里不用，可以調学校”嗎？可見凡是右派分子都想在这个問題上鑽空子，找缺口，歪曲事实，借題發揮。但是在鉄的事实面前，他們的鬼蜮伎倆，終于是無法得逞的。

正告这些右派分子：有史以来沒有那个阶級象工人阶級这样重視知識分子，任何社会都不可能象社会主义这样能够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党对知識分子不仅是“包下来”加以照顧和安排，最重要的是要貫徹团結、教育、改造政策来使所有的知識分子發揮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我們財經学院的党对于教师一向是关心和重視的，我們的工作在党的正确領导下，已經得到适当的安排，今后还要在充分發揮潜力的前提下，安排得更好。党能領导一切，一切也必須由党来領导。右派分子的任何誣蔑、挑撥离間或誘惑，結果都是枉費心机的。我們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一切都是有計划的，知識分子是国家的財富，它的培养和使用，当然要納入国家計划之中。知識分子也唯有在国家有計划地安排与使用之下，才能發揮力量，眞正成为国家的財富。你們所夢想的“自由市場”是永远不会实現的。

关于我国1958年度国民經济計划

李立中

一 1958年度国民經济計划的主要任务

1958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胜利完成之后，第二个五年計划开始的第一年。1958年度国民經济計划的編制，是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問題的报告，根据党和政府按照我国具体情况所决定的方針政策，根据第一个五年計划执行过程中的經驗，和根据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發展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建議的原則，来积極安排各項計划指标的。这些計划指标的安排，是要正确地解决我国国民經济發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的新的矛盾，而这些新的矛盾的解决，便是第二个五年計划和1958年度国民經济計划的主要任务。

什么是第二个五年計划和1958年度国民經济計划的主要矛盾呢？

目前我国国民經济高速度發展过程中，所出現的新的主要矛盾是农業生产的發展赶不上整个国民經济發展的需要，特别是工業發展的需要；原材料工業的發展赶不上加工工業發展的需要；于是在国民收入方面，便又产生了积累和消費的矛盾，国家建設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矛盾。

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的工業生产，是在最快的速度上进行的，1957年的工業总产值比1952年增加了123.4%超过原計划数字12.7%。这个数字是說：五年来工業發展速度超过从前一百年。假使以这个速度与資本主义国家比較，則在1952—1956的五年中，美国工業增長19%，英国增長16%，法国增長35.7%。我們远远將資本主义国家抛在后面。同时，在农業生产方面，虽然它的發展，还是高速度进行的：1957年的农業总产值比1952年增加26.4%。超过原計划2.5%。虽然这个数字若与資本主义国家比較，則我們的發展速度还是很快的：資本主义各国的小麦产量，在1938—1952的十五年中，共增加不到30%；稻谷，十五年內共增加了0.5%；棉花，十五年內共增加了20%。但是，五年来我国农業增加速度(26.4%)，若与工業增加速度(123.4%)相比較，則农業生产的發展赶不上工業生产發展的需要了。这是第一个五年計划工农業高速度發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矛盾。正确地解决这个矛盾，积極地發展农業，使之更加适应工業的發展，这便是第二个五年計划和1958年度国民經济計划的主要任务之一。

五年来，我国原材料工業的發展，以鋼而論，年平均增長速度为31%；加工制造工業的發展，以机器制造業而言，以全部产值計，年平均增長速度为33%。从速度上看，机器制造工業的發展，并不是过快于鋼产量的增長。但問題却在于鋼材的品种，不足以适应日益增長的加工工業的需要，以1953—1957年鋼絲繩的生产量和需要量而論，兩者越来越呈現出不相适应的情况：①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計划)
逐年生产量	100%	100%	100%	100%	100%
逐年需要量	140%	147%	150.5%	142%	267%

鋼絲生产量的落后，就会影响到輪胎工業的發展，甚至会影响到捕魚業和內河航运；其它如矽鋼片的生产不足，就会使电机工業的生产受到限制；鋼管生产的不足，就会影响地質鑽探工作和石油工業的生产等方面，总括的講，鋼材品种的生产不足，就会影响工業生产的發展和基本建設的进度与規模。故解决原材料工業生产赶不上加工工業需要之間的矛盾，是为第二个五年計划和1958年度国民經济計划的主要任务之一。

① "計划經济"1957年，第9期，第16頁。

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由于工农業生产的高速度發展，国民收入也是高速度的增長，五年內，增長了53%。每年平均增長9%左右，这个速度，远远超过資本主义国家的增長速度。1949—1956年，美国的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長4.4%。我国国民收入增長这样快，說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虽然国民收入增長速度很快，但由于我国經济落后，生产力水平低，国民收入水平，却是低的。以1956年为例，全国每人平均的国民收入只有150元左右，不仅低于美国，而且还低于日本，此外，更加以我国人口多，生殖快，就使得消費基金的增加不能过快，1952—1956，我国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加69亿元，假使每年人口增加1，300万左右，消費基金需要增加13亿元左右；則用于积累和提高人民消費水平的数字，仅为56亿元左右②。假使將此数全部用于提高人民生活，則每人每年也只能提高9元左右，故在国民收入水平低的条件下，积累和消費之間出現了新的矛盾：人民消費水平提高較慢，国家財政收入增加的大部分，只能用于积累，正确地安排国家建設与人民生活，解决积累与消費之間的矛盾，使当前利益与長远利益有更好的結合，这也是第二个五年計划和1958年度国民經济計划的主要任务之一。

从上所述，解决上述各項矛盾，便是当前国民經济計划的主要任务。

为了完成1958年發展国民經济的主要任务，党和政府規定，必須貫徹执行在重工業优先發展的基础上，工农業同时并举的方針，其所以必須优先發展重工業，是因为它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物質基础，其所以必須工农業同时并举，是因为在發展工業时，应充分注意农業的發展，以便为工業提供原料和开辟市場，从而推动工業的發展，这样，便能够更好地滿足国家建設和人民生活的要求。

二 1958年基本建設投資的大躍进

1958年度国民經济計划是一个大躍进計划，这是因为从国內外的形势看，我們有許多有利条件。

国內方面的有利条件是：（1）整風运动和反右斗爭的偉大胜利，社会主义干勁，空前高漲。（2）第一个五年計划的輝煌成就，社会主义工業化初步基础的建立，为今年工农業生产高速度的發展，創造了物質条件。（3）第一个五年計划的实踐經驗，提高了計划的編制与执行的工作水平，更能符合于社会主义經济規律的要求。（4）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各項工作的改进，为更进一步的發揮各地区的人力、物力、財力和資源，提供了有利条件。

国外方面的有利条件是：东風压倒了西風。苏联兩个人造地球衛星上了天，社会主义陣营和平力量的增强，进一步巩固了国际和平环境。

在这些有利条件之下1958年度基本建設增長速度之快，和規模之大，超过以往任何一年，1957年基本建設投資額預計完成12,370百万元，1958年計划数字为14,577百万元，比1957年度，增加22亿元，增長17.8%。这是一个飞躍速度。

为什么基本建設投資額有这样高的速度和規模呢？主要的应从財政收入和物資供应兩方面看。1957年工农業生产的增加，和勤儉建国取得巨大的成績，丰富了財政收入，去年全国工業总产值預計將达628.1亿元，比原計划超过4.1%，比1956年增長6.9%。全国农副業总产值达到603.5亿元，比1956年增加20.6亿元。与此生产增加的同时，去年节約成績也很大，例如：單以中央六个工業部对于91項工程設計的审查修改，就节約造价4亿多元，又如：农貸方面，1957年虽比1956年增加了3亿元，但由于农民节約和按期归还貸款，1957年底，留在农民手中的貸款数字，反比1956年同期，减少約2.7亿元。这些情况，使得1957年的財政收入多于支出，为1958年的躍进，在財政資源上提供了保証。

至于从物資供应方面看，基本建設所需的建筑材料，1958年鋼产量拟定为624.8万吨，在数量上可以滿足需要，虽然在品种規格上，还存在着一些問題，但可以通过进口，进行調节，基本上可以滿足需要。至于基本建設所需要的木材，虽

① 国家統計局研究室：我国国民收入生产和分配的初步研究，統計研究1958，1。

然生产量和需要量之間的矛盾，一时不能解决，但是可以水泥代用，和采取其它节約措施，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故無論从財政資源上，抑从物質資源上看，它們与基本建設投資額的增長速度和規模，都是平衡的。

1958年国民經济基本建設投資額的分配，是針对着克服当前国民經济發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主要矛盾而进行的。（1）为了解决农業生产的發展赶不上国民經济的需要，于是提高了农業投資的比例，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时期，工农業投資的比例，預計是6.6:1。1958年計划是4.7:1。农業投資的用途，主要有3个方面，卽兴修水利、排涝和开荒，除去开荒是增加播种面积外，其它二个方面的投資，都是着重于提高單位面积产量。（2）为了解决原材料工業的發展赶不上加工制造工業發展的需要，于是提高了原材料工業投資的比例。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时期，原材料工業和加工工業的投資比例預計是2.5:1，1958年計划是4.6:1。大力促进黑色金屬、有色金屬、石油、鹽碱等工業的發展，以满足制造工業、运輸机械工業，和化学工業發展的需要。原材料工業的大力發展，不仅是满足国家建設的需要，而且还可以增加出口。适当地增加煤炭、生鉄、有色金屬等的出口比重，从而縮小农产品出口的比重，这是有利于国民經济的發展的。（3）为了正确地安排积累和消費的比例关系，适应国民收入中消費資料生产較生产資料生产增長慢的情况，适当地提高了重工業投資的比例。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重工業和輕工業投資的比例，預計是7.9:1，1958年計划則是8.9:1。輕工業投資比重的减少，是由于农業原料的生产不足和木材的严重缺乏。棉花的不足，就必須对紡織工業的發展，作适当的限制，木材的不足，就必須对造紙工業和人造纖維工業的發展作适当的限制。但对于原料可靠的鹽和食糖工業，則增加适当的投資，以满足国內消費和出口的需要。（4）为了适应行政管理体制的改进，增强地方的积極性和創造性，提高了地方基本建設投資的比重，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中央和地方的投資比例是4.1:1，1958年計划則是3.2:1。地方投資比重的提高，可以調动一切当地的有利因素，来發展工农業，特别是为农業服务的地方工業。地方工業的絕大部分是以农产品加工的消費資料，和为农業生产服务的生产資料，它的积極發展，是工农生产大躍进的組成部分。

此外，基本建設投資，必須貫徹党的多、快、好、省的建設社会主义的政策，党中央号召，1958年基本建設，积極采取下列的措施，就有可能节約投資20%，或者更多，例如：（1）新企業与旧企業和手工業的結合。（2）大、中、小型企業建設的結合。（3）机械化、半机械化和手工操作的結合。（4）适当降低設計标准和定額。（5）尽量削减不必要的工程和非生产性的建設項目。（6）尽量自行設計并使用本国制造的設备，尽可能利用原有建筑物和設备。（7）尽量节約建設用地。（8）尽量組織企業之間的协作。（9）在工業布局上，尽量接近原料产地和消費地区，减少不合理运輸。（10）尽量利用原有城市和建筑物，控制城市人口增加，动員城市人口下乡上山。（11）加强基本建設的組織和計划工作。

三　1958年工农業生产的飞躍發展速度

关于我国工农業發展相互之間的关系，毛主席曾說："我国是一个大农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农業，同时并举。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業积累較多的資金……在第二个五年計划和第三个五年計划期間，如果我們的农業能够有更大的發展，使輕工業相应地有更多的發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經济会有好处。农業和輕工業發展了，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会更快地發展①"。这段話指示我們：工業和农業之間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約的关系，而發展工業和發展农業同时并举，正是为了貫徹以优先發展重工業为中心的社会工業化的路綫。

1958年的工农業生产計划，卽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間內，实現全国农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在今后十五年或者稍

①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第12节。

多一点的时間內，在鋼鉄和其他重要工業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偉大号召之下，进行編制的。为了促进国民經济的新躍进，工农業生产增長的計划指标規訂得比較积極的。

1958年工業生产增長速度的計划数字为14.6%。以之与1957年預計完成数字6.9%相比較，是一个大躍进。在工業总产值中，重工業繼續保持着較高速度的發展，增長18.8%，貫徹着重工業优先增長的方針。輕工業生产，則因受到原材料的限制，提高較慢，但由于1957年的农業收成較好，1958年消費品生产計划增長9.7%.与1957年消費品生产增長3%比較，又是大大提高的。

在發展工業，同时發展农業的方針下，1958年农副業总产值的增長速度，計划为6.1%。大大地超过1957年預計完成3.5%的增長速度，在农業机械化尚未广泛推行的現阶段，这个計划指标，是相当高的。至于产量方面，重工業生产为适应加工工業的發展，和基本建設規模扩大的需要，1958年將积極發展燃料、电力、和原材料的生产，增产不足的物資和某些特别缺乏的产品品种，并合理地安排机械工業的生产。

1958年燃料，电力和原材料的生产，是保持着适当的比例發展的：

煤 产 量：150,724千吨　比上年增加17.2%
發 电 量：2,245千万度　比上年增加18%
鋼 产 量：6,248千吨　比上年增加19.2%
鋼材产量：4,820千吨　比上年增加13.1%

在第一个五年計划中，由于整个工業的發展速度加快了，煤的需要量大过于生产量。1953—1957年，煤产量平均每年遞增14%；而工業生产用煤，平均每年遞增16.8%。民用煤，平均每年遞增16.9%。煤的生产量，赶不上需要量，又表現在煤的年平均增長速度14%，低于工業生产的增長速度17.4%。从这里，卽显示出不平衡的情况。1958年煤的生产增長17.2%，工業总产值增長14.6%前者超过后者，这就体現出积極的平衡。

电力主要是用于工業生产方面的，發电量的增長速度，一般都要快于工業总产值增長速度。第一个五年計划时期，發电量每年平均增長速度为21%，超过了工業总产值年平均增長17.4%的速度。虽然如此，但發电量的供应，却是紧張的。其原因是：發电設备的增長速度，(1953—1956年平均增長16.5%)，低于發电量的增長速度。1958年發电量的增長速度18%，是高于工業总产值增長速度的14.6%。虽然它低于过去五年的年平均增長速度，但今年电力工業的建設項目，却很多：中央和地方共有119个，这就大大增加了發电設备的增長速度，預計今年發电設备將增長50%以上。發电設备容量今年將增長90多万瓩，这个数字，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新增加的全部設备容量的40%。这是一个新躍进。

鋼材与机械工業之間的比例，根据过去几年的实际資料，机械工業每提高1亿元的生产总值，平均需要鋼材1.5万吨左右，据此，1958年鋼材的增長速度規定为13.1%，用以适合机械工業的需要。1958年机械产品中的發电設备、电动机、生产氮肥的設备，載重汽車和蒸汽机車等的增長速度，都將达到50%以上。机器制造中主要产品的增長速度就大大地超过鋼的增長速度，这表明我国机器設备的自給能力，將大大提高。至于支援农業的机械产品，則增長更多，排水灌溉机械將比1957年增長兩倍多。这表明1958年机器制造業的大力支援农業。此外，鋼材的增長，在品种方面，則將更多地供应机器制造業和国民經济的需要。

至于农作物的产量方面，1958年粮食产量將达3,920亿斤，比上年增加220亿斤，增加5.9%棉花产量將达到3,500万担，比上一年增加220万担，增長6.7%。从增長的速度上看，兩者都超过第一个五年計划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粮食平均每年增長4.3%，棉花，2.9%。特别是在棉花的增長速度方面，大为提高，超过一倍以上。但从产量上看，粮食則超过第二个五年計划建議中的数字，棉花則还达不到建議数字。按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建議，1962年的粮食产量为5,000亿斤左右；棉花4,800万担左右，照此建議，五年內要增产粮食1,000亿斤左

右，即每年增产200亿斤左右，1958年粮食增产220亿斤，是超过了建議数字。又照此建議，五年内要增加棉花1,800万担左右，每年需增加360万担左右，1958年棉花产量預計增加220万担，是还达不到建議数字。这显示出粮食作物和棉花种植面积的比例，是当前突出的矛盾。为了貫徹优先增产粮食的方針，1958年棉花的种植面积，保持在9千万亩水平上是适宜的；但这就較难完成建議数字的增产任务，这种情况又說明棉粮播种面积比例的矛盾的解决，是長期計划的任务，而不是年度計划的任务。

但是，从現在执行計划的社会主义干勁看，从計划指标与指标之間的平衡看，上述的棉粮增产指标，超額完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1958年棉粮的增产，主要是依靠于提高單位面积产量。而單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又主要是依靠于兴修水利和增加肥料。例如：1958年預計粮食增产220亿斤，棉花增产220万担，是与1958年預計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指标9,221万亩，相平衡的。可是截至今年1月底为止，灌溉面积已經完成11,798万亩，从去年10月份算起，用120天的时間，超額完成了全年計划，解放前，我們的祖先4千年才开辟了23,000万亩的灌溉面积，而今只有4个月，即开辟了11,798万亩。4个月的成績，等于4千年的一半。以这种惊人速度看，1958年全国灌溉面积，还要大大增加。現在全国灌溉的总面积已超过6亿亩。加水土保持的成果，已經基本上解决了旱灾的威胁。这样，粮食增产220亿斤以上；棉花增产220万担以上，接近于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建議数字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关于增加肥料方面，除去广大农民开展积肥运动外，今年棉粮的增产，还有賴于化学肥料的支援。为了实現农業發展綱要所提出的發展化学肥料的任务；爭取到1962年生产化学肥料500—700万吨。今年中央和地方，以历史上空前的建設規模，建設17个化学肥料厂。今年即可以动用的有4个，預計可增产合成气4,7000吨，磷肥548,000吨，磷矿石粉300,000吨，共計895,000吨。1957年化学肥料产量，只有70多万吨，仅新增生产能力产量，即超过去年产量。加上原有企業的潜力，进一步發揮，（現在磷肥厂的設备能力，还沒有充分發揮），再加上有些地区还計划兴办一些小型化肥厂，則今年化学肥料的产量，將更有所增加，这样，自必又增大了今年棉粮产量指标超額完成的可能性。

四　人民生活的妥善安排

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国民收入中出現的新矛盾是：消費基金的增長速度較慢于积累基金的增長速度。国民收入五年中增長了53%，每年平均增長9%左右。积累基金增長了93.8%，每年平均增長14.1%消費基金增長了36.8%，每年平均增長6.5%。根据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首先即需要考虑：在消費基金增長速度較慢的情形下，对人民的生活，作适当安排，保証消費品的供应。根据消費品生产的增長速度，来确定購买力的增長速度，使人民購买力的增長与商品零售額的增長相适应。

根据上述基本建設規模的扩大，工农業生产的增長，和其它各項事業發展的需要，1958年的职工总数將有所增加，因此工資总額亦將相应增加，但增加数不多，只有5亿多元，此数与农村居民購买力和机关、团体購买力合計，1958年的社会購买力估計为494亿元左右。而商品供应量則估計为500亿元左右。是1958年的社会商品供应量，將超过社会購买力，出現了社会主义建設以来第一次商品供应量超过購买力的局面。同时，这也是第一次証明了，即使在过渡时期，生产赶不上需要并不是社会主义經济規律。

从絕对值看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社会購买力总是超过商品供应額的，其超过額每年总在10亿元左右，以居民購买力，商品零售額和消費品生产增長的比例关系看，則1953—1956年的情况如下：①

	1953比1952年	1954比1953年	1955比1954年	1956比1955年
工業消費品生产	28.4%	14.5%	1%	22%
商品零售总額	33.1%	12.9%	2.3%	19.2%
工資总額	—	—	—	36%

① 資料来源：消費品生产和零售額数字，見1956年国家統計局公报。工資总額数字，見統計工作1957，14，第13頁。

从这里可以看出:(1)商品零售額与消費品增長是亦步亦趋的,消費品生产增長快了,則零售額也随之而增長快;前者增長慢了,則后者也慢。(2)1956年的工資总額增長速度,不仅超过了零售額,而且还超过了消費品的增長速度。这就說明了工資总額增長太快,与增長較慢的消費品生产不相适应,于是就造成当年消費品的供应緊張,和零售物价的上漲。

我們吸取了这个經驗,在編制1958年度計划时,首先研究了人民生活。在保証了人民生活之后,再安排有多少力量从事于建設。这也卽是說,我們正确地处理了消費与积累之間的比例关系。

其次,在研究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时,我們还考虑了消費基金的分配,卽职工和农民之間消費基金的合理分配問題。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工人的消費水平提高了26%,农民提高了22%。农民消費基金的增長速度,比較慢,这完全是合理的。因为这是由于农業生产的增長比較慢。农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必須基础于生产發展之上。我們不能离开生产發展而提高消費水平。虽然农民消費基金的增長速度比职工慢,但它却快于农業生产的增長速度。第一个五年計划农業净产值約增加27—28%,而农民实际收入,則增加34%。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这是由于农产品采購价格提高之所致。例如:1956年的全国农产品采購价格,比1952年提高了16.6%。农产品采購价格的提高,是必要的。这就使得工农消費水平逐漸接近,巩固了工农联盟。五年来,职工和农民消費額的比例关系变动如下:①

职工消費額:农民消費額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2.36:1	2.32:1	2.18:1	2.37:1	2.39:1

工农消費額比例,虽由于农業丰收或歉收和职工工資增加較少或較多,而有逐漸縮小(1953–1955年),和逐漸扩大的情况;但比例变化的基本趋势則是趋向于接近的。

1958年度計划的編制,为了控制購买力的增長,使之与商品供应額相适应;因此,对农产品采購价格,力求保持稳定,沒有較大的調高或降低,对于职工工資增加也少,这样就保持了工农消費額比例傾向于接近的基本趋势。同时,更由于1958年农業生产的增長速度,將有一个大躍进,农民收入將有較快的增長;而参加农業生产大躍进的劳动人民中,有一部分上山下乡的干部;故为了体現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設方針,适当的安排人民生活,1958年农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就会略快于职工,使工农消費額比例进一步的接近。

五 厉行节約、反对浪費、为完成和超額完成1958年度国民經济計划而奋斗

毛主席指示我們:"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經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經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間,其中包括执行励行节約、反对浪費这样一个勤儉建国的方針。"②

开展节約和反浪費的斗爭,对完成和超額完成1958年度計划来說,不仅是为了节約一些資金的問題,而是多、快、好、省建設社会主义的大問題。

从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我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是消費資料的生产,赶不上生产資料發展的需要,由于消費資料生产增長較慢,人民消費水平的提高也較慢,故国民收入的增長部分,大部分只能用于积累,以这些积累資金,用来克服我国国民經济中的薄弱环节,用来积極發展农業和原材料工業,这就要求發揮投資的經济效果,就需要貫徹执行勤儉建国的方針。

在工業、商業,运輸業等企業中,則对严重浪費的現象,展开斗爭,例如資金和材料的积压浪費,廢次品过多,經营环节和管理人員过多,倉庫管理不善等等。仅以工業生产而論:若由于展开反浪費斗爭,成本降低1%,則国家收入,卽可增加3亿元;工業生产發展速度增長1%,就可以增加总产值6亿多元,国家財政收入就可以增

(下轉第44頁)

① 統計研究1958,1。第13頁,第6頁。

②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第十一节。

論我国1958年国家預算

胡鑑美

1958年的国家預算已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議批准公布了。

1958年將是我国在各个战綫上大大躍进的一年。它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在各个战綫上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到来的，它是在第一个五年計划完成并超額完成的基础上到来的。

通过1956年三大改造的高潮，生产資料所有制基本改变了，我們在經济战綫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通过1957年全民性的整風运动和反右派斗爭，我們又在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与此同时，由于第一个五年計划的完成并超額完成，建立了社会主义工業化的初步基础，工农業产品大量增产了，商業、交通运輸業和科学文化等各种事業都获得了巨大的增長。

就在这样的基础上，1958年的国家預算公布了。1958年的国家預算將为1958年的大躍进和第二个五年計划的胜利开端提供財政上的保証，它获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我国的預算是社会主义类型的預算，它是基本的財政計划，是有計划地建立并使用集中化貨幣基金以滿足全社会日益增長的需要的基本形式。我国国家預算的社会主义性質最明显地反映在历年預算收入来源和預算支出方向的变化中。国营企業交納在預算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如1950年仅占34.08%，到1953年已占62.60%，到1956年已占74.34%，而到1957年，国营企業、合作社营企業及公私合营企業的交納，合計已达到总收入的95%。但与此同时，个体經济的交納比重却有显著的下降，如私营工商業的交納1950年为32.92%，1957年已下降到1.10%。在支出方面，經济建設支出有飞速的增長，社会文教支出也有相应的增長，而国防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則日趋减少。例如經济建設支出在1950年占預算支出总数的25.49%，1953年占40.23%，到1956年已达到52.05%了。国防支出1950年占預算支出总数的41.53%，1952年便立刻降到26.04%，到1957年則已下降为18.03%。行政管理支出1950年占預算支出总数的19.29%，但在1957年則已下降为7.60%。这一切，都充分說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說明了我国所具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以及因此而反映在国家預算上的社会主义面貌。

我国国家預算在完成和超額完成第一个五年計划中，曾起了重大的作用。第一个五年計划的关鍵問題——資金积累問題，絕大部份是通过預算而解决的。資金积累問題包含着积聚資金、使用資金和节約資金等各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我国国家預算在这各个方面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积聚資金方面，第一个五年計划規定，五年內全国用于經济建設及社会文教事業的总支出为766.4亿元①，由于我国国家預算是基本的財政計划，是有計划地建立并使用集中的貨幣基金的基本形式，因此这笔資金的絕大部份必然是通过国家預算来积聚。五年来我国国家預算收入总数共达1385亿元强②，毫無疑問，其中絕大部份是根据第一个五年計划的任务而积聚的。在分配和使用資金方面，第一个五年計划規定，上述的766.4亿元中，有741.3亿元③应由国家

注：本頁所列各項收支比重数字，系录自历年預、决算报告，均为决算数。1957年数字中除国营企業等交納比重外，均系笔者根据1957年預計执行数字計算得来。

①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發展国民經济的第一个五年計划”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9頁、第22頁。

② 此数系將1953至1957年各年决算收入总数相加而得。

財政撥款，亦卽第一个五年計划的全部投資有96.7%①要通过預算撥款来实現。我国国家預算确也担当起了这一重大任务，五年內，預算对經济建設和社会文教事業兩方面的撥款，已达846亿元②之多。在节約資金方面，国家預算也根据第一个五年計划所指出的各个方面，卽有效、合理、节約地使用基本建設資金方面，促使国营企業完成并超額完成积累任务方面，以及降低国家行政管理費用方面，加强了监督：每年的預算报告都規定有节約基本建設投資和降低工業企業成本的指标，并屢次指出应該大力精簡机構，节約管理費用。

1958年的国家預算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制定的，但是1958年的国家預算更充分考虑到了目前形势的要求。自去冬今春以来，我国已經进入一个反浪費、反保守、社会主义建設事業在各个战綫上大躍进的新高潮，第二个五年計划也已于今年开始。我們將按照在优先發展重工業的基础上發展工業和發展农業同时并举的方針；將按照勤俭建国的方針；將按照从六亿人口出發、統筹兼顧、适当安排的方針，調动一切积極的因素，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具有現代工業、現代农業和現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和这一新高潮相适应，1958年的国家預算也具有一系列的新的特点：

1958年的国家預算是一个反对保守傾向，积極挖掘潜力，收入和支出增長得比較快的預算

預算收入的不断增長，是解放后我国国家預算固有的特色，如以1950年的預算收入为100，則1951年为188.84；1952年为261.35；1953年为340.16；1954年为402.30；1955年由于对1954年水灾所造成的損失估計不足，并且有一部份国营企業沒有很好执行增产节約的措施，以致預算收入未能全部完成，为397.23；但1956年又立卽增長为402.26③。1958年預算收入总数为3,306,300万元，与1957年預計执行数相比較，按1958年預算編列方法計算，增加224,200万元，增長7.27%。这一增長速度与1957年相比，显然是比較快的，1957年收入預計执行数字較1956年决算收入仅增長6.81%。

今年的預算收入增長得比較快，并不是沒有根据的，相反的，这样的安排完全具备可能实現的条件：

首先，如前所述，今年的形势与往年大不相同，經过全民整風和反右派斗爭，全国人民朝气蓬勃、干勁十足，工人們不断創造先进的生产定額，农民們日以繼夜地兴修农田水利，生产大躍进的消息一个跟着一个。并且猛攻保守，横扫浪費的烈火正在全国各地熊熊燃起，这样一个規模空前的大生产运动和增产节約运动的展开，必然促使工农業产值大大提高，而事实上这一形势也已为我們国家所估計到，因而在1958年度国民經济計划草案中便拟定今年的工業总产值为6,437,000万元，比1957年預計数增長14.6%，大大超过1957年的增長速度；拟定今年的农業和农副業总产值为6,883,000万元，比1957年增長6.1%，大大超过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的平均速度。这是今年国家預算收入得以較快增長的最重要的因素，亦卽是李先念副总理所指示的，我們应該充分認識的政治的因素和人的因素。

其次，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所建厂矿已有許多建設完工，能在今年投入生产。例如我国已有450个限額以上的工厂建成④，已經拥有能够制造飞机、汽車、蒸汽机車、远洋貨輪、新式机床、發电、冶金和矿山設备等近代工業。这样就势必大大提高我国的工業生产能力，为国家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这是今年預算收入能够較快增長的物質保証之一。

第三，1957年的农产品收成是比較好的。虽然1957年遭受到不小的自然灾害，但农業仍然增产，粮食产量达到3,700亿斤，比1956年增加50亿斤，比1952年增加610多亿斤。棉花达

① 根据前頁注①，③兩笔数字計算得来。

② 此数系將1953年至1957年各年决算的經济建設費、社会文教費相加而得。

③ 以上数字均見葛致达著"过渡时期的中国預算"財政出版社1957年版第16頁。

④ "乘風破浪"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論。

到3,280万担，比1956年增加390万担，比1952年增加670多万担①。由于农产品、特别是經济作物的丰收，遂为輕工業提供了原料，促使輕工業更加發展，因而也就使得工商企業的积累与交納有所增加。这样当然也保証了国家預算收入能够較快地增長。

最后，除了上述直接可以为国家增产物質財富的因素外，在保障增加收入方面，今年也有着优越的条件。从今年起，我国决定实行新的財政管理体制。新的財政管理体制可以在保証統一領导和保証重点建設的条件下，适当扩大地方財政管理权限和增加地方机动財力，从而將促使地方进一步發揮組織收入、节約支出、积累資金的积極性。这也有助于1958年国家預算得以在收入增長較快的基础上实現。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肯定，我国各方面都存在着無穷的潜力；挖掘这些潜力，將使国家預算收入有可能作較快的增長。在1958年的国家預算中，正是估計到这一点，体現了这一点的。

再从本年預算支出的增長来看。支出增長也和收入增長一样，是我国解放后历年預算固有的特色。如以1950年的支出为100，則1951年为162.88；1952年为234.93；1953年为315.62；1954年为361.81；1955年为431.06；1956年为451.56②。今年預算支出总数为3,306,300万元，較1957年預算估計执行数增加239,500万元，增長7.81%。这一速度較之1957年支出与1956年大体相平的情况，無疑是大为迅速的。这就充分說明了我国1958年国家預算具有鮮明的反对保守的性質。因为，由于1956年农業曾遭遇到較大的自然灾害、某些物資供应比較緊張，以致1956年底到1957年初，我国財政上曾發生一些暫时的、局部的困难。按常規看，1958年預算支出可能会是安排得緊縮一些的。然而，恰恰相反，由于党与毛主席的正确指示，主流和支流、本質和現象的問題在全国人民面前已十分清楚；政治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已被十分重視；因此，1958年的預算支出終于在反对保守、反对浪費的基础上向前躍进了。

反对保守，挖掘潜力，收入和支出的較快的增長，这就是我国1958年国家預算的第一个特点。

1958年的国家預算是一个貫徹整風精神、坚决反对浪費和緊縮非生产性支出的預算

的确，1958年的預算支出是增長得比較快的。然而，前面說过，我国的預算是社会主义类型的預算，預算支出的目的是为了建設社会主义事業和滿足广大人民的需要，非生产性的开支向来力求减少。今年，由于全民整風运动的开展，由于反对浪費、勤儉办一切事業的風气空前高漲，这一社会主义預算的特点在預算支出中就表現得更加突出、更加鮮明了。

首先，非生产性开支在今年預算中有着显著的緊縮。例如，国防支出今年是50亿元，占支出总数的15.12%。与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历年預算中国防費所占比重相比較：1953年为26.43%；1954年为23.60%；1955年为22.15%；1956年为20%；1957年为18.03%，下降是很快的。不仅如此，今年的国防費，在整个支出增長較快的情况下，絕对数也是較前大为削减了的。例如，今年为50亿元，而1957年为55亿余元，1956年为61亿余元，1955年为64亿余元，1954年为58亿余元，1953年为52亿余元。这不但充分說明了我国正大力緊縮非生产性开支，以全部精力投入社会主义建設，而且也雄辯地証实了我国热爱和平、反对战爭的眞誠願望。这一点，如果把美国的預算拿来比較，那就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照。根据最近美国总統向国会提出的1959財政年度預算咨文来看，他要求美国人民进一步束緊腰帶，把1958財政年度的軍事撥款再追加13亿美元，而1959財政年度的軍事撥款則还要比1958年度增加38亿美元。于是在美国1959年

① 以上农業产量数字录自1958年度国民經济計划草案报告及"乘風破浪"一文。

② 以上数字見葛致达著"过渡时期的中国預算"財政出版社1957年版第16頁。

注：本頁及下頁的国防費数字与行政管理費数字均录自历年預、决算报告，除1953年外均为决算数。其中百分比数字，在历年預、决算报告未列及者，則系由笔者根据絕对数計算得来。

度的預算中，全部軍事性开支要达到总預算支出的81%①以上。

在行政管理支出方面，我国1958年預算規定为20亿元，占总支出的6.05%，而1957年則为7.60%，1956年为8.69%，1955年为7.34%，1954年为8.78%，1953年为9.86%，这說明逐年降低速度是較快的。并且絕对数也較前減少，今年为20亿元，而1957年为23亿余元；1956年为26亿余元；1955年为21亿余元；1954年为21亿余元；1953年为23亿余元。就目前全国精簡机構、下放干部的热火朝天的情况来看，可以預料，預算所規定的这一任务是一定可以完成并超額完成的。

今年行政管理費与国防費兩項非生产費用合計，占預算总支出的百分比降至21.17%，这已大致符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建議中所指出的，在第二个五年計划中必須使軍政費用的比重下降到20%左右的标准。

同时，在今年預算的基本建設投資分配上，还縮減了社会文教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基本建設投資，而增加了經济建設方面的基本建設投資。并且要求在保証工程質量的条件下，进一步降低造价、从而將基本建設投資总額再节約7%到10%。

此外，也要求在預算执行过程中，依靠紧縮机構、減少人員、降低費用开支标准等途徑，力求降低各項事業費用。

凡此种种，都充分說明1958年的国家預算是在貫徹整風精神、坚决反对浪費的基础上提出的。

貫徹整風精神、坚决反对浪費，大力紧縮非生产性支出，这就是我国1958年国家預算的第二个特点。

1958年的国家預算是一个积極增加生产性支出，积極發展基本建設和大力支援农業的預算

我們曾在前面指出，我国国家預算成为社会主义类型預算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以絕大部份的預算資金投入經济建設与社会文教事業，而且經济建設費用的比重特别大。現在，在1958年的国家預算中，这一标志是更加突出了。1958年国家預算的經济建設費为1,754,800万元，占总支出的53.07%，超过总支出的半数。与历年預算中这項支出的比重相比較，1950年为25.49%；1951年为29.50%；1952年为45.43%；1953年为40.23%；1954年为50.12%；1955年为46.89%；1956年为52.05%；1957年为48.64%②；实在是历年来比重最大的一年。社会文教事業費为489,600万元，占預算总支出的14.81%。这兩項費用合計，占总支出的67.88%，也已大致符合于中共八大关于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建議中所指出的第二个五年計划期間应使經济文化建設支出的比重提高到60%到70%的标准。

在經济建設支出中，工業建設支出为916,900万元，占整个經济建設支出的52%强，这說明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基本方針——繼續进行以重工業为中心的工業建設的方針，首先在今年的預算中得到了保証。

1958年国家預算的基本建設投資共1,383,600万元，連同国营企業等在这方面的自用資金共計1,457,700万元，比1957年增長17.8%，較之去年，增長速度是可观的。而且，如前所述，今年的基本建設投資还大大增加了經济建設方面的投資比例而削減了社会文教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投資比例。这也更加突出了我国今年預算的积極增加生产性支出的特点。

在1958年的預算中，还具有着一个最突出，最值得人注意的特色，那就是，今年的預算是一个大力支援农業的預算。大家知道，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的方針，是在优先發展重工業的基础上，發展工業和發展农業同时并举。那就是說，"必須大力發展农業生产，使农業的發展同工業的發展互相协調，滿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③。1957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全国农業發展綱要(修

① 以上数字均見1958年1月14日人民日报第5版。

② 以上数字均录自历年預、决算报告，或根据决算数字計算而得。

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發展国民經济的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建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頁。

正草案)、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等的公布，已大大鼓舞了全国农民的劳动热情，已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兴修水利、發展生产、爭取农产品大丰收的高潮。固然，农業建設不同于工業建設，由于所有制的关系，其所需資金主要是靠农業生产合作社本身的积累，但是，国家亦必須給农業以相当的財政援助，以便解决化学肥料工業、农業机器工業以及大型水利工程等。这些事業必須投入巨大的資金，不是农業生产合作社本身的力量所能解决的。在1958年的国家預算中，充分体現了这一精神。預算中用于援助农業的資金有294,000万元，比1957年增加40.78%，而絕对数則更比历年預算有較多的增加，历年預算中这項支出1957年为20亿余元，1956年为22亿余元，1955年为14亿余元，1954年为13亿余元，1953年为5亿余元。

除了上述对农業的直接援助外，国家預算中在基本建設方面曾着重增加了对农業、水利、化学肥料工業、农業机械工業的投資。同时，还通过發放农業貸款、發放农产品預購定金等方式加强对农業的援助，而且这兩項信用資金均較去年有所增加：前者为44亿元，計增加4亿；后者为11亿元，計增加5亿。这些也都有助于促进农業發展。

总之，积極增加生产性支出、积極發展基本建設、大力支援农業，乃是1958年国家預算的第三个特点，而其中大力支援农業，从而促使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工农業同时并举方針得以順利貫徹这一点，更是1958年国家預算最为突出的地方。

* * *

从上面对1958年国家預算的特点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結論：1958年的国家預算是一个貫徹整風精神的預算，是一个适应于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基本方針的預算。那也就是說，这是一个反对保守，反对浪費，在增产节約运动中大大躍进的預算，这是一个在优先發展重工業的基础上促使發展工業与發展农業同时并举的預算。从上面对1958年国家預算的特点的分析中，更可以得出結論：我們国家的預算是社会主义类型的預算，它具有無比的优越性。

这些結論以鉄的事实粉碎了資产阶級右派对我国財政預算工作的惡毒攻击。

在过去黑云压城的时节，資产阶級右派曾經惡毒地攻击我国的税收政策，說什么农業税負担太重，影响农民生活；說什么工商税收是剝削多端，影响生产。更借1956年我国曾在財政上發生一些暫时的、局部的困难而肆意詆毀我国整个財政預算工作，說什么"并非沒有錯誤，甚至是严重的錯誤"，"并非不出偏差，往往是幅度很大的偏差"；甚至危言聳听地說什么"目前我国經济建設的实踐，正处在危机的阶段中"。

事实証明，农業税的負担是不重的，农業税征收額占农業实产量的比例已由1952年的13.2%下降到1956年的10.7%①，即使在今年适应农業生产發展而农業税收略有提高的情况下，比例也仍然由去年的11.3%下降为11.06%，而且随着农業生产的發展，这一比例还会下降。事实証明，对資本主义工商業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不但对社会主义事業有利，而且对有益于国計民生的工商業本身也有利。当然这一政策确也明白指出有限制那些無益于国計民生的資本主义工商業的一面、資产阶級右派攻击这一政策，适足以暴露其企圖复辟資本主义道路的阶級本質。

至于关于我国1956年的財政工作問題，則1956年和1957年的預算最是雄辯地粉碎右派讕言的明証。1956年預算收入較1955年增長15.82%，經济建設支出增長22.8%，农業貸款增發20.3亿元。由于这一大力的投資与支援，1956年工業产值較1955年增長31.1%，农業产值增長16.5%，职工工資增長14%。在这鉄的事实面前，1956年的財政工作是成功而不是失敗，实已毋須贅言。至于該年預算略有赤字，那是由于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高潮估計不足，將上年結余列入預算收入、并追加了一些支出所致，完全是胜利中局部的、暫时的缺点。而且經过1957年預算的安排与执行，不但收入又已超过支出，

(下轉第52頁)

① "坚决粉碎資产阶級右派对社会主义財政的猖狂进攻""財政"杂誌1957年第10期社論。

商業資金节約額的計算

葛霖生

增产节約是發展社会主义經济、扩大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方法，它并不只是解决某种困难的临时措施，而是一个經常性的重要的政治經济任务。由于今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的經济發展，不但要保証完滿地实現第一个五年計划；而且要为第二个五年計划准备巩固的基础。因此，大力地开展增产节約运动，保証1957年度的国民經济計划和財政收支計划的順利实現，具有極其重大的意义。

为此，商業部門应該"为降低商品流轉費用，減少商品流轉环节，減少商品損耗，認眞克服各种浪費現象而斗爭。"① 以便用最少的資金和劳动把商品尽快地由生产者轉移給消費者（包括生产資料消費者），相对地縮減商業部門所占用的資金和劳动的数量，以滿足国家最紧迫的建設需要。利用統計方法正确反映和檢查商業組織在一定时期內所已获得的实际成績，可以及时推广先进企業以及先进工作者的先进經驗，有助于增产节約运动的深入开展。本文試圖就商業資金节約額的計算方法，特别是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的計算方法，作一初步的探討。

一

商業資金按其用途区分为固定資金和流动資金。

固定資金是固定資产的貨幣表現，它包括：房屋、建筑物、商業設备、运輸工具等等。商業固定資产是商業工作的物質基础，它为商品流轉服务但不直接参加商品流轉；一般說来，它的价值較大，使用期限較長，在使用过程中不变更其形态，而是在長期使用过程中逐漸磨損，并按其磨損程度通过折旧方式逐漸轉移到商品价格中的。

流动資金則是流动資产的貨幣表現，用来保証商品流轉的不断进行。商業流动資金包括：(一)儲存的商品，包括在商店、倉庫中的商品和在途商品；(二)存在銀行結算帳戶上的貨幣資金和存在企業中的現金；(三)其他定額資金，如包裝材料、物料用品、低值易耗品等。这些資金一般是直接参加商品流轉，在每次周轉以后，即轉化为貨幣形态。

商業資金中的絕大部分是流动資金，而商業部門流动資金中占压倒比重的是商品資金部分。因此，加速商品資金周轉速度是商業部門合理利用資金的关鍵。

商業資金的节約通常是指流动資金的相对节約，这意味着流动資金的增長速度低于商品流轉增長的速度；加速資金的周轉，就可使国家能够用同样数目的錢做更多的事情。由于固定資金不直接参加商品流轉，固定資金与商品流轉額之間不能要求保持相应的比例；同时，一切固定資产按期提出的折旧費已列入商品流轉費中計算其节約；因此为了避免重复，我們在計算商業資金节約額时，只計算流动資金的节約，不計算固定資金的节約。

如前所述，商業流动資金的形态时刻在变化着。商業企業在获得一定的貨幣資金后，就用来購买商品，进行商品儲备，經过商品銷售又得到帶有利潤的貨幣資金；再用来購买商品、儲备、銷售……。企業的商品流轉周期愈短，就有可能使每一元流动資金循环得愈快，其使用效果就愈大。因此，流动資金运用的效果，主要决定于一定时期內（例如：一年、一季）流动資金周轉次数（一般称流动資金周轉率）的大小，或流动資金周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協商会議第二届全国委員会第三次全体会議关于增产节約問題的决議，1957年3月21日人民日报。

轉一次所需日数（一般称流动資金周轉日数）的長短。这兩个指标的計算公式如下：

$$\text{流动資金周轉次数}=\frac{\text{商品銷售額}}{\text{流动資金平均余額}};$$

$$\text{流动資金周轉一次所需日数}=\frac{\text{流动資金平均余額}}{\text{平均每日商品銷售額}}。$$

我們假設：o 代表商品銷售額，c 代表流动資金平均余額，m 代表平均每日商品銷售額，R 代表流动資金周轉次数，D 代表流动資金周轉一次所需日数；則上述兩个公式可用符号表示如下：

$$R=\frac{o}{c};$$

$$D=\frac{c}{m}。$$

根据第二个公式，流动資金平均余額 $c=Dm$，可見 D（流动資金周轉一次所需日数）每縮短1天，企業所占用的流动資金卽可节約 m；反之，D 每延緩一天，則企業所占用的流动資金就增加 m。根据这个道理，我們得出計算流动資金节約額的公式为：

$$\text{流动資金节約額}=\left(\begin{matrix}\text{計算期(或实际)流动資}\\\text{金周轉一次所需日数}\end{matrix}-\begin{matrix}\text{基期(或計划)流动資}\\\text{金周轉一次所需日数}\end{matrix}\right)\times\begin{matrix}\text{計算期(或实际)}\\\text{平均日銷售額}\end{matrix}$$

$$=(D_1-D_0)m_1$$

大家知道：商業流动資金包括定額流动資金和非定額流动資金。計划規定的資金平均余額及其周轉速度，只有定額流动資金部分的；非定額流动資金則并沒有計划数，所以在計算非定額流动資金和全部流动資金的节約（或超支）額时，只得从动态上进行分析，不能作計划檢查。

現在我們举例来說明。假設某商店 1955 年和 1956 年的商品銷售額和流动資金平均余額的資料如下：（單位：百元）

	1955年	1956年	
		計 划	实 际
銷售額	15,000	18,000	27,000
流动資金平均余額	1,250	—	1,875
其中：定額流动資金	1,000	1,000	1,350

根据公式，我們可以分别計算出 1955 年和 1956 年的流动資金周轉次数和周轉一次所需日数，如下表：（为便于比較，一年以 360 日計）

	1955年	1956年	
		計 划	实 际
流动資金周轉次数	12	—	14.4
其中：定額流动資金	15	18	20
流动資金周轉一次所需日数	30	—	25
其中：定額流动資金	24	20	18

該商店由于流动資金周轉的加速而相对节約的資金額为：

$$\text{全部流动資金节約額}=(25-30)\times\frac{27,000}{360}$$

$$=-375\text{ 百元}①$$

定額流动資金节約額

$$\text{按計划規定：}(D_n-D_0)m_n=(20-24)\times\frac{18,000}{360}=-200\text{ 百元}$$

$$\text{实际：}\quad(D_1-D_0)m_1=(18-24)\times\frac{27,000}{360}=-450\text{ 百元}$$

計划規定与实际所得节約額之差，形成为定額流动資金的超計划节約額，卽 −250 百元；定額流动資金节約計划超額完成了 125% $\left(\frac{-450}{-200}-1\right)$。

不难了解，定額流动資金的超計划节約額分别是下列兩个节約額之和，卽：按实际銷售額計算的超計划节約額与按超計划銷售額計算的計划节約額之和 $(D_1-D_n)m_1+(D_n-D_0)(m_1-m_n)$；或按計划銷售額計算的超計划节約額与按超計划銷售額計算的实际节約額之和 $(D_1-D_n)m_n+(D_1-D_0)(m_1-m_n)$。在本例中

定額流动資金的超計划节約額

$$=(D_1-D_n)m_1+(D_n-D_0)(m_1-m_n)$$

$$=(18-20)\times\frac{27,000}{360}+(20-24)\times\left(\frac{27,000}{360}-\frac{18,000}{360}\right)$$

$$=-150+(-100)=-250\text{ 百元}$$

或者，定額流动資金的超計划节約額

$$=(D_1-D_n)m_n+(D_1-D_0)(m_1-m_n)$$

$$=(18-20)\times\frac{18,000}{360}+(18-24)\times\left(\frac{27,000}{360}-\frac{18,000}{360}\right)$$

$$=-100+(-150)=-250\text{ 百元}$$

同时，我們也不难看出：按实际銷售額計算的超計划节約額和按計划銷售額計算的超計划节約額之差 $(D_1-D_n)m_1-(D_1-D_n)m_n$；或按超

① 在这里和以后，“−”表示节約，“+”表示超支。

計划銷售額計算的实际节約額和按超計划銷售額計算的計划节約額之差$(D_1-D_0)(m_1-m_n)-(D_n-D_0)(m_1-m_n)$；就是超計划銷售額的超計划节約額$(D_1-D_n)(m_1-m_n)$，在本例中是－50百元。

由此可見，定額流动資金的超計划节約总額也就是下列三个节約額之和：（1）按計划銷售額計算的超計划节約額；（2）超計划銷售額的超計划节約額；以及（3）按超計划銷售額計算的計划节約額。用公式表示为：

$$\begin{aligned}&\text{定額流动資金的超計划节約总額}\\&=(D_1-D_n)m_n+(D_1-D_n)(m_1-m_n)+\\&\quad+(D_n-D_0)(m_1-m_n)\end{aligned}$$

其計算結果可列表表示如下：

	金　額（百元）	对資金节約額計划完成的影响（%）
1. 按計划銷售額計算的超計划节約額	－100	＋50
2. 超計划銷售額的超計划节約額	－50	＋25
3. 按超計划銷售額計算的計划节約額	－100	＋50
定額流动資金的超計划节約額	－250	＋125

以上我們是就全部定額流动資金来进行分析的。由于商品資金在商業流动資金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加速商品資金的周轉速度，相对縮減商業企業所占用的商品資金数額，实是节約資金的主要关鍵。因此有必要單独計算商品資金的节約額并檢查其节約計划的完成。此时

$$\text{商品資金节約額}=\left(\begin{matrix}\text{計算期（或实际）商品}\\\text{資金周轉一次所需日数}\end{matrix}-\begin{matrix}\text{基期（或計划）商品資}\\\text{金周轉一次所需日数}\end{matrix}\right)\times\times\begin{matrix}\text{計算期（或实际）}\\\text{平均日銷售額}\end{matrix}$$

$$\text{其中：商品資金周轉一次所需日数}=\frac{\text{商品資金平均余額}}{\text{平均日銷售額}}$$

我們知道：不同的商品，其生产条件、运輸条件和使用性質都有所不同，因而也就影响其流轉速度的不同。例如：在正常情况下，面包蛋糕在商業網中的商品儲存平均起来只相当于一、二天的銷售額；而其他食品（如糖果）的儲存則常保証十天或半月的銷售；至于像裝飾品、化粧品等品类繁多的商品組，則需要有保証更長时期銷售的商品儲存，既然各商品組的流轉速度如此不同，那末所售商品結構的改变对于商業企業商品流轉速度的变动便会發生重大的影响。正因为这样，所以商業企業的商品資金占用額（即按購进成本計算的商品儲存額）既受各商品組流轉速度变动的影响，又受所售商品結構变动的影响。因而

$$\begin{matrix}\text{商品資金}\\\text{节約額}\end{matrix}=\begin{matrix}\text{由于每組商品資金周轉日}\\\text{数縮短而得的节約額}\ ①\end{matrix}+\cdot+\begin{matrix}\text{由于銷售額商品結構变动而}\\\text{产生的节約額（或增加額）}\end{matrix}$$

如以B代表商品資金周轉一次所需日数，則

$$\begin{aligned}&\text{商品資金节約額}(\overline{B}_1-\overline{B}_0)\Sigma m_1\\&=\Sigma(B_1-B_0)m_1+\left(\Sigma B_0\frac{m_1}{\Sigma m_1}-\Sigma B_0\frac{m_0}{\Sigma m_0}\right)\Sigma m_1\end{aligned}$$

这在一般商業統計学書籍的商品儲存統計中都有着詳細的論証，而其节約計划的檢查也与全部定額流动資金节約計划的檢查大体相同，这里不再举例說明。

二

上面所討論的是个别商業企業計算資金节約額及其計划檢查的方法，現在我們来討論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的計算和檢查。为了論証簡便起見，以后都只从全部流动資金出發，不再分項計算。

計算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时，通常有兩种不同的方法。第一、按綜合單位平均的資金周轉縮短日数乘綜合單位純銷售額来計算，即所謂系統法或部門法；第二、按綜合單位所屬各企業資金节約額之和来計算，即所謂企業法。

分別用这兩种方法計算出来的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在絕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一致的。只是在具备下述条件之一时，这兩种方法的結果才会一致。第一个条件，綜合單位沒有內部流轉，且其所屬各企業的基期（或計划）資金周轉日数相同；第二个条件，綜合單位沒有內部流轉，且其所屬各企業銷售額的比重在基期（或計划）和在計算期（或实际）是一致的。

我們举例来說明这兩个条件。先看第一个

① 如果商品資金周轉日数延長，則必然多占用商品資金，形成超支。

条件，即如果綜合單位所屬各企業的基期（或計划）資金周轉日数均相同，則計算期所屬各企業銷售額的比重和資金周轉日数尽管有所变动，用部門法直接計算出来的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必然与其所屬各企業資金节約額之和相等。这一点可由下例得到充分的証明。

（金額單位：百元）

企業	基期				計算期（例一）					計算期（例二）				
	日銷售額		流动資金平均余額	資金周轉日数	日銷售額		流动資金平均余額	資金周轉日数	資金节約額	日銷售額		流动資金平均余額	資金周轉日数	資金节約額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甲	50	40	1,000	20	75	60	1,350	18	−150	50	33.3	950	19.0	− 50
乙	75	60	1,500	20	50	40	950	19	− 50	100	66.7	1,750	17.5	−250
合計	125	100	2,500	20	125	100	2,300	18.4	−200	150	100.0	2,700	18.0	−300

例一：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

$$(\text{部門法}) = (\bar{D}_1 - \bar{D}_0)\sum m_1$$
$$= (18.4-20)\times 125 = -200$$

$$(\text{企業法}) = \sum (D_1 - D_0) m_1$$
$$= (18-20)\times 75 + (19-20)\times 50$$
$$= -150 + (-50) = -200$$

例二：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

$$(\text{部門法}) = (\bar{D}_1 - \bar{D}_0)\sum m_1$$
$$= (18-20)\times 150 = -300$$

$$(\text{企業法}) = \sum (D_1 - D_0) m_1$$
$$= (19-20)\times 50 + (17.5-20)\times 100$$
$$= -50 + (-250) = -300$$

再看第二个条件，即如果綜合單位所屬各企業銷售額的比重在兩个时期沒有变化，則尽管各企業資金周轉日数有各种不同的变化，綜合單位用部門法直接計算出来的資金节約額也与其所屬各企業資金节約額之和相等。例如：

（金額單位：百元）

企業	基期				計算期（例一）					計算期（例二）				
	日銷售額		流动資金平均余額	資金周轉日数	日銷售額		流动資金平均余額	資金周轉日数	資金节約額	日銷售額		流动資金平均余額	資金周轉日数	資金节約額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甲	50	40	1,000	20.0	60	40	1,152	19.20	− 48	80	40	1,600	20.0	—
乙	75	60	1,650	22.0	90	60	1,800	20.00	−180	120	60	2,520	21.0	−120
合計	125	100	2,650	21.2	150	100	2,952	19.68	−228	200	100	4,120	20.6	−120

例一：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

$$(\text{部門法}) = (\bar{D}_1 - \bar{D}_0)\sum m_1$$
$$= (19.68-21.2)\times 150 = -228$$

$$(\text{企業法}) = \sum (D_1 - D_0) m_1$$
$$= (19.2-20)\times 60 + (20-22)\times 90$$
$$= -48 + (-180) = -228$$

例二：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

$$(\text{部門法}) = (\bar{D}_1 - \bar{D}_0)\sum m_1$$
$$= (20.6-21.2)\times 200 = -120$$

$$(\text{企業法}) = \sum (D_1 - D_0) m_1$$
$$= (20-20)\times 80 + (21-22)\times 120$$
$$= 0 + (-120) = -120$$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即使綜合單位沒有內部流轉，其所屬各企業的基期（或計划）資金周轉日数，以及兩个时期的銷售額比重也都很难一致，这就决定了按部門法和企業法分別計算出来的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是不会相同的。例如：

（金額單位：百元）

企業	基期				計算期				
	日銷售額		流动資金平均余額	資金周轉日数	日銷售額		流动資金平均余額	資金周轉日数	資金节約額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甲	50	25	1,000	20.0	65	26	1,235	19.0	－65
乙	70	35	1,260	18.0	100	40	1,600	16.0	－200
丙	80	40	1,920	24.0	85	34	2,040	24.0	—
合計	200	100	4,180	20.9	250	100	4,875	19.5	－350
	m_0	$\frac{m_0}{\sum m_0}$	c_0	$D_0=\frac{c_0}{m_0}$	m_1	$\frac{m_1}{\sum m_1}$	c_1	$D_1=\frac{c_1}{m_1}$	$(D_1-D_0)m_1$

在本例中：按部門法計算出来的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bar{D}_1-\bar{D}_0)\sum m_1=(19.5-20.9)\times 250=-350$百元；而按企業法計算出的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sum(D_1-D_0)\,m_1=(19-20)\times 65+(16-18)\times 100+(12-12)\times 170=-265$百元；兩者不等。

此时，究应采取那一种方法来計算綜合單位的資金节約額呢？我們認为：就綜合單位来說，应当采用部門法来計算。

首先，因为国民經济計划直接規定的大都是整个商業部或整个專業局的資金周轉速度指标，其所屬机構以至基層企業的計划指标，則由各有关上級机構分别逐級核准确定。因此，在檢查綜合單位財务計划时，所注意的也是整个綜合單位資金周轉日数的縮短；而非各企業資金周轉日数的縮短。虽然各企業的計划是綜合計划的有机組成部分，但綜合計划并非各企業計划簡單的总和，这决定了綜合單位与所屬企業檢查計划的角度和范圍都有所不同。因而只有采用部門法来計算綜合單位資金周轉加速的絕对效果，才能与計划編制及其檢查的要求相适应。

其次，正因为部門法是以整个綜合單位作为出發点，所以按部門法計算出的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在上例中是－350），既包括了由所屬各企業資金周轉日数縮短而产生的节約額（在上例中是－265）；而且还包括了由所屬各企業銷售額結構变动而产生的节約額（在上例中是$\left(\sum D_0\frac{m_1}{\sum m_1}-\sum D_0\frac{m_0}{\sum m_0}\right)\sum m_1=-85$）。它說明了整个綜合單位有关資金节約的全部效果。而按企業法所計算出的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在上例中是－265），它首先是从所屬各企業的观点来計算节約額然后相加的；既然这样，它当然不能考虑到各企業間銷售額結構的变动，因而在說明整个綜合單位資金周轉加速的絕对效果时，只具有部分的意义。

此外，在綜合單位存在内部流轉的情况下，要求我們在計算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时，必須采用純銷售額。因为只有采用純銷售額計算，才能促进商品流轉环节减少，便于控制經营管理的改善；假如用总銷售額計算时，綜合單位在計算期内扩大商品内部流轉，就会使資金周轉虛假加速，造成綜合單位資金的虛假节約。所以用总銷售額来計算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是不正确的，它不能說明銷出綜合單位总体范圍外的商品实在数量上所占用流动資金节减的全部实际效果。

按企業法計算的各企業資金节約額之和，虽然是从各企業純銷售額計算的，但从綜合單位角度来看，实質上仍是按总銷售額来計算的；它与綜合單位直接用总銷售額計算的資金节約額不同之处，只在于企業法是从企業角度出發，未考虑企業銷售額結構变动的影响。所以用企業法来計算資金节約額，同样也不能說明銷出綜合單位总体范圍以外的商品实在数量上所占用流动資金节减的全部实际效果；相反，还会在客观上促使用扩大計算期内部流轉的办法来"加速"資金的周轉，夸大資金节約的效果。显然，这是不妥的。

最后，我們还应該注意：当綜合單位所屬企業有所增减时，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还要受到增

加的或（和）减少的基層企業的影响。采用部門法来計算时，能够包括这种变动的影响；但如果用企業法来計算，則不能反映这种变动的影响。因为如果在計算期所屬企業有增减，則这些增减的企業無从独立計算資金节約額，它們在这种意义上成为不可比的單位，因此它們不包括在所屬企業資金节約額之和的計算中。但是，如前所述：企業增减变动的影响却应該包括在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的計算中。

总之，由于企業法首先从基層企業的观点来計算节約額然后相加的，不能考虑到在基層企業間銷售額結構的变动、总体内部銷售額在总銷售額中所占比重的变动、以及基層企業增减等对于資金节約額的影响，故計算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不宜采用企業法。

但是，由部門法計算出来的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是一个平均指标，它常常会掩盖各企業加速資金周轉的实际成績，不能說明企業的工作質量及改善情况。因此，用企業法来补充部門法分析和說明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的構成也是必要的。同时，各企業节約額之和还能用以說明綜合單位由于所屬各企業加速資金周轉而节减的垫支流动資金。因为各企業是經济核算單位，企業資金独立，并有独立的会計制度，各企業發生購銷行为时，都要發生一定的結算关系，均須垫支一定数目的流动資金，所以各企業在購銷过程中所發生的流动資金支出的縮减，就是垫支流动資金的节省。

由此可見，部門法与企業法各有其本身的經济意义。为了全面地說明整个綜合單位加速資金周轉的全部实际效果，只能用部門法来計算；而为了檢查所屬各經济核算企業节約成績和說明由于各企業加速資金周轉而节省的流动資金垫支額时，則应該用企業法来計算。

三

根据以上論証，我們举例来說明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的具体計算方法。

前已指出：当綜合單位沒有内部流轉时，其資金节約額的計算可用公式表示如下：

$$\underset{\text{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bar{D}_1-\bar{D}_0)\sum m_1}=\underset{\text{由于各企業資金周轉日数縮短而产生的节約額}}{\sum(D_1-D_0)m_1}+\underset{\text{由于企業銷售額結構变动而产生的节約額（或增加額）}}{\left(\sum D_0\frac{m_1}{\sum m_1}-\sum D_0\frac{m_0}{\sum m_0}\right)\sum m_1}①$$

在上例中：$-350=-265+(-85)$。

为了便于計算，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也可通过下列公式来計算：

$$\text{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sum c_1-\sum c_0\cdot\frac{\sum m_1}{\sum m_0}②$$

在上例中，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4,875-4,180\times\frac{250}{200}=4,875-5,225=-350$百元。

但是，綜合單位总体内部商品流轉往往是存在的。因为内部流轉，所屬各企業的商品銷售額可能一部分是向总体外銷售的，一部分是向总体内其他企業銷售的；也可能全是向外或全是对内的；所以綜合單位的純銷售額一般小于所屬各企業銷售額之和。我們仍以m代表所屬各企業的銷售額，以s代表各企業向总体外的銷售額，t代表各企業对总体内的銷售額；$m=s+t$。当一个企業沒有对总体内的銷售額时，$t=0$；若無向总体外的銷售額时，$s=0$。

此时，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为：

$$\left(\frac{\sum c_1}{\sum s_1}-\frac{\sum c_0}{\sum s_0}\right)\sum s_1$$

为了要清楚的說明内部流轉对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的影响，这个公式可变为：

$$\sum c_1-\sum c_0\cdot\frac{\sum m_1}{\sum m_0}\cdot\frac{K_0}{K_1}$$

其中$K=\frac{\sum m}{\sum s}$即环节性系数。当綜合單位

---

① 这个公式可証明如下：

$$\begin{aligned}&\sum(D_1-D_0)m_1+\left(\sum D_0\frac{m_1}{\sum m_1}-\sum D_0\frac{m_0}{\sum m_0}\right)\sum m_1\\&=\sum D_1m_1-\sum D_0m_1+\left(\frac{\sum D_0m_1}{\sum m_1}-\frac{\sum D_0m_0}{\sum m_0}\right)\sum m_1\\&=\sum D_1m_1-\sum D_0m_1+\sum D_0m_1-\frac{\sum D_0m_0}{\sum m_0}\times\sum m_1\\&=\bar{D}_1\sum m_1-\bar{D}_0\sum m_1\\&=(\bar{D}_1-\bar{D}_0)\sum m_1\end{aligned}$$

② $$\begin{aligned}(\bar{D}_1-\bar{D}_0)\sum m_1&=\left(\frac{\sum D_1m_1}{\sum m_1}-\frac{\sum D_0m_0}{\sum m_0}\right)\sum m_1\\&=\sum D_1m_1-\sum D_0m_0\cdot\frac{\sum m_1}{\sum m_0}=\sum c_1-\sum c_0\cdot\frac{\sum m_1}{\sum m_0}\end{aligned}$$

总体内部銷售額在总銷售額中的比重愈小，則K愈小；反之則愈大。这样，在其他条件不变时，K_1愈小于K_0，則資金节約額愈大，反之則愈小。

我們把上例資料作适当的改变来說明。

（金額單位：百元；一年以360日計）

企業	1955年					1956年					
	銷售額			流动資金平均余額	資金周轉日数	銷售額			流动資金平均余額	資金周轉日数	資金节約額
	年銷售額	日銷售額	比重			年銷售額	日銷售額	比重			
甲	18,000	50	25	1,000	20.0000	23,400	65	26	1,235	19.0000	− 65.00
乙	25,200	70	35	1,260	18.0000	36,000	100	40	1,600	16.0000	−200.00
丙	28,800	80	40	1,920	24.0000	30,600	85	34	2,040	24.0000	—
合計	72,000	200	100	4,180	—	90,000	250	100	4,875	—	—
綜合單位	57,600	160	—	4,180	26.1250	68,400	190	—	4,875	25.6579	− 88.75

$$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left(\frac{\sum c_1}{\sum s_1}-\frac{\sum c_0}{\sum s_0}\right)\sum s_1$$

$$=(25.6579-26.1250)\times 190=-88.75$$

或者，

$$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sum c_1-\sum c_0\cdot\frac{\sum m_1}{\sum m_0}\cdot\frac{K_0}{K_1}$$

$$=4,875-4,180\times\frac{250}{200}\times\frac{\frac{200}{160}}{\frac{250}{190}}$$

$$=4,875-4,180\times 1.25\times\frac{1.250}{1.316}$$

$$=4,875-4,963.75=-88.75$$

实际上，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可以直接通过1955年和1956年的年銷售額来計算，而不必通过日銷售額。这样在实际工作中計算起来，就更为簡便了。此时

$$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sum c_1-\sum c_0\cdot\frac{\sum o_1}{\sum o_0}\cdot\frac{K_0}{K_1}$$

$$=4,875-4,180\times\frac{90,000}{72,000}\times\frac{\frac{72,000}{57,600}}{\frac{90,000}{68,400}}$$

$$=4,875-4,180\times 1.25\times\frac{1.250}{1.316}$$

$$=4,875-4,963.75=-88.75$$

以上我們是就綜合單位純銷售額来計算的。此时，如果用总銷售額計算，則資金周轉一次所需日数1956年比1955年縮短了1.4天$\left(\frac{4,875}{250}-\frac{4,180}{200}=19.5-20.9\right)$，实际是0.4671天(25.6579−26.1250)；資金节約額为−350百元(−1.4×250)，实际只−88.75百元(−0.4671×190)。显然夸大了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的实际效果，因而是不正确的。① 其次，用企業法計算的結果，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是−265百元，它实質上既是仍按总銷售額計算的，而且还沒有考虑到企業銷售額結構变动的影响。因此，如前所述，它不能反映綜合單位資金节約的全部效果。

按企業法計算的結果之不足以說明綜合單位資金节約的全部工作，在綜合單位所屬企業有增减时，表現得尤为明显。例如：

（金額單位；百元）

企業	1955年					1956年					
	銷售額			流动資金平均余額	資金周轉日数	銷售額			流动資金平均余額	資金周轉日数	資金节約額
	年銷售額	日銷售額	比重			年銷售額	日銷售額	比重			
甲	18,000	50	25	1,000	20.0000	23,400	65	21.7	1,235	19.0000	− 65.00
乙	25,200	70	35	1,260	18.0000	36,000	100	33.3	1,600	16.0000	−200.00
丙	28,800	80	40	1,920	24.0000						
丁						27,000	75	25.0	1,470	19.6000	—
戊						21,600	60	20.0	1,200	20.0000	—
合計	72,000	200	100	4,180	—	108,000	300	100.0	5,505	—	—
綜合單位	57,600	160	—	4,180	26.1250	81,000	225	—	5,505	24.4667	−373.13

① 由总銷售額計算出的資金节約額，只是在計算期和基期的环节性系数一致时，才有可能与由純銷售額計算出的資金节約額相等。但这是特例，在一般情况下往往是不一致的。

（下轉第58頁）

为什么生产与需要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經济矛盾？

王惟中

社会主义社会"沒有矛盾"，或者"沒有基本矛盾"的說法，現在已經沒有市場了。但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經济矛盾，迄今还未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見。这个問題关系到社会主义經济建設的發展，关系到社会主义經济理論的探討，特别是政治經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因此，对这一問題更进一步展开討論是必要的。

什么是基本經济矛盾？馬克思和恩格斯發現了資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經济矛盾，即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資本主义占有制之間的矛盾。毛主席指示出根本矛盾的性質和作用，指示出資本主义基本經济矛盾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关系。很多苏联專家在这方面亦有不少宝貴的闡述。

根据这些發現、指示和闡述，可以看出基本經济矛盾的主要特点：（1）它直接反映一个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2）它直接反映一个社会最基本的性質，即阶級与阶級間或人与人間最深刻最本質的經济关系；（3）它决定或影响这一社会經济各个方面和各个过程中的矛盾；（4）它存在于这一社会各个發展阶段中而成为發展的动力，并决定其發展方向；（5）它是这一社会的基本經济規律的基础，而基本經济規律是它的反映。

如果这些是正确的話，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經济矛盾也就必須具有这些特点，尽管其表現形式有所不同。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經济矛盾呢？在苏联有人認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經济矛盾是"利用生产資料方面的平等地位和享受物質待遇方面的不平等現象的矛盾"；在中国，也有人認为是"人們平等从事劳动而在經济上还沒有完全消除差别的矛盾"。这兩种說法在实質上是相同的，因为它們产生的根源同是按劳分配。正因为这样，这种矛盾就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說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經济矛盾。理由是很明显的：（1）按劳分配只适用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阶段，因而从它产生出来的矛盾就不能反映共产主义社会兩个阶段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間的矛盾。（2）从分配中产生出来的矛盾并不能决定生产中或其它領域中的矛盾，而恰恰相反，尽管前者对后者是有影响的。（3）这个矛盾不但不存在于共产主义的兩个發展阶段，并且也不能决定这个社会的發展方向，相反地，它將随这个社会發展到高級阶段而消逝。（4）这种矛盾并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基本經济矛盾所由产生的基础，而是由它所决定的，因为按劳分配是为發展生产的要求所决定的。所以这种矛盾并沒有基本矛盾的特点，而是由基本矛盾派生出来的。

还有人認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經济矛盾是新的社会主义关系同資本主义"斑痕"和殘余之間的矛盾。这种主張仅有很少拥护者。它并不具有基本經济矛盾的五个主要特点是很明显的，不贅述了。

在苏联和我国，很多人認为"日益增長的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發展水平之間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我認为这种說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必須根据基本矛盾所具有的主要特点，加以补充說明：

（1）在共产主义的兩个阶段，虽然社会生产高速度地發展，但是由于生产資料公有，社会需要亦高速度地增長，并且后者的增長在許多方面

不断地超过前者的增長。这时，生产与需要一方面相互促进，不断地增長，另一方面又不断地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到更高水平的均衡。生产与需要所以能相互适应，不断地增長，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性質基本上相适应；它們所以又相互对立，不能均衡，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間还有不相适应的地方（关于这点后面再細述）。非常明显，社会主义下的生产与需要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間的矛盾所决定的，前者是后者的直接反映。这符合于基本矛盾的第一个特点。

（2）与資本主义下的生产与需要間的矛盾的性質完全不同，社会主义下的生产与需要間的矛盾直接表現社会主义生产者間的經济关系，表現在經济方面的人民內部的矛盾，从而表現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基本的性質。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基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社会上生产出来的产品完全用来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社会生产愈發展，人民的需要也愈得到满足，反过来，也是这样；因而，从总的趋势来看，生产与需要是統一的，相互适应的。可是，人民之間还存在着矛盾，在經济方面，这种矛盾突出地表現在各阶級、阶層和个人对社会产品的需要上，例如：工人阶級、农民阶級及知識份子对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就各有不同的要求。在一定时期一定的生产力的水平上，社会总产品是一定的，而各阶層人民对社会总产品的需要，包括对生产資料和消費資料的需要，無論在質方面或在量方面，常互相抵触，这就不能不引起生产与需要間在某些方面的不协調，不适应。所以說社会主义下生产与需要的矛盾直接地反映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內部的矛盾，反映这一社会最根本的性質。这符合于基本矛盾的第二个特点。

（3）社会主义下生产与需要間的矛盾决定社会主义經济各个方面和各个过程中的矛盾。社会主义經济，与其它社会經济一样，包含生产、流通、分配、消費四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这四个方面各有其特殊的矛盾，这些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都是由生产与需要这一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在这里，限于篇幅，只能举几个例子。在生产領域中，很突出的矛盾是兩大部类間的矛盾，工农業間的矛盾，积累与消費間的矛盾，劳动生产率与工資率間的矛盾等。兩大部类的生产基本上是适应的，但在很多种产品的数量上和質量上又常常不相适应。工業与农業間的关系是相輔相依的关系，但一方面的生产也常常不能满足另一方面的需要。从長期看，积累与消費是完全統一的，但从短期看，从一个年度看，由于社会总产品是一定的，它們又相互排斥。一般的說，工資率的提高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互促进，但是为了增加积累来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工資率的提高又必然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追根究源，这一切既相互依賴，又相互排斥的現象都是生产与需要这一基本矛盾的反映；如果沒有后者，前者就根本不会存在。在流通領域中，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社会，因为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基本上是适应的，所以，生产与流通間，商品基金的总量和構成与購买基金的总量和社会需要的構成間，各种商品之間，以及商品流通与貨幣流通間基本上也都是协調的。可是，另一方面，由于生产与需要間的某些环节还不相适应，上列各种关系的兩个方面又时常相互脫节。在分配領域，也出現同样的情况。在企業里，在合作社里，为了进一步發展生产，就要多积累，为了进一步满足成員的需要，就要提高工資率和劳动日所得的价值。年总产品是一定的，要更好地满足这一阶級或阶層人民的需要，就必然影响其它阶級或阶層的需要的满足，工农产品的比价、以及价格与工資率等应当如何适当地規定都說明了这一点。在一定的时期內，生产資料的总量是一定的，分配到工業方面多一些，分配到农業方面就要少一些。很显然，在分配領域中的若干重要矛盾，如个人与集体間的矛盾，各阶級和各阶層間的矛盾，特别是工人阶級与农民阶級間的矛盾，無一不是从生产与需要这一基本經济矛盾产生出来的。分配如此，消費也必然如此，因为产品的分配导致产品的消費。可見生产与需要这一矛盾决定着社会經济的各个方面的矛盾，决定着这些矛盾的發展过程，从而决定着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这符合于基本矛盾的第三个特点。

（4）这种生产与需要間的矛盾貫穿着共产主义兩个阶段，有力地推动社会由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向共产主义第二阶段过渡。整个社会的需要包括社会对生产資料的需要及对消費資料的需要。这些需要随时随刻都在变化中。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只要社会生产力一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一提高，社会对生产資料特别是对劳动对象的需要就立刻增長。促进这种提高的因素很多，或者是由于生产关系某些环节的改进，如有关生产、流通、分配某些制度的改善，或者是由于上層建筑某些环节的改进，如有关政治制度的改进，思想覚悟的提高等，或者是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如最現代的科学成就的运用等。这些因素几乎每天都不断地出現，而其中很多并不是事先所能預料到的，因而对生产資料的新的更多的需要也就不断地發生。可是，生产資料的生产并不是一下子的事，它需要一定的时間。例如：我国农業合作化高潮一到来，农業对肥料及机械的需要就紧迫而来；对私营工商業改造的高潮一到来，工業对鋼鉄等原料的需要就立卽紧張起来；政治战綫上及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胜利，生产战綫上有如万馬奔騰，对各种生产資料的需要就一定高速度地增加。这时，虽然生产与需要同时大躍进，但是，在一定时間內，由于社会生产力及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对生产資料，特别是对劳动对象的需要的增長率就一定大于它們的实际生产的增長率。同样地，社会上对消費資料的需要，特别是为个人消費的需要也随时随刻都在变化中。社会上的任何变化，無論是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或上層建筑某一环节方面的变化，都会立卽反映到人們对消費資料的需要上来，特别是生产对需要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人們对某一种消費資料的需要变化了，与之相关的需要也必然相应地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現在量上，特别是在質上，在需要的構成上。在我們的社会里，随着整个社会不断地發展，生产的躍进，整个社会的很多种需要与其相应的生产間的平衡就一定要被打破。計划化可以暫时地促使它們趋于相对地平衡，但是平衡的趋势剛剛形成，不平衡的現象又出現了；这时，通过国家計划的調节，社会的生产与需要又在更高的水平上趋于平衡，就是說，它們的总量进一步增加了，質量也进一步提高了。显然，生产与需要間的矛盾不断地出現，不断地被解决，社会也不断地速迅地前进。正是这个矛盾推动着社会向前發展，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

到了共产主义第二阶段，这个矛盾仍然起着同样的巨大推动作用，因为它的根源在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它是这一矛盾的特殊表現形式。在共产主义第二阶段与在第一阶段一样，生产与需要相互促进，共同高速度地增長，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生产的目的是为滿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長的需要，因为極高度社会化的生产为共产主义的生产資料公有制所巩固，也就是說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共产主义的生产力的發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共产主义第二阶段，生产与需要还常常不相平衡，在某些方面生产仍然赶不上需要，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生产力的实际發揮与其充分發揮的可能性比較，在一个生产周期內，还要受到一些限制，而社会对生产資料的需要是按照生产力充分發揮的可能性提出的，也就是說，共产主义生产的某些环节就在共产主义第二阶段也还不能完全与共产主义生产力發展的要求相适应。在共产主义第二阶段不是要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則嗎？为什么还說，生产在某些方面赶不上需要呢？我認为，这时的个人所需不是依据于任何个人的主观幻想，也不是依据于生产力充分發揮的可能性，而是依据于当时生产力的实际發揮的結果，卽生产总量来确定的。在任何社会，社会的实际消費量是不会大于实际生产量的，可是，在共产主义的兩个阶段，社会按照生产力充分發揮的可能性（对生产資料的需要）及消費的可能性（对消費資料的需要）所提出的需要量是經常大于合乎这些需要的实际生产量的。可見，生产与需要的矛盾貫穿着共产主义兩个阶段，有力地推动社会不断地前进。这符合于基本矛盾的第四个特点。

（5）基本經济規律是基本矛盾的反映，是在基本矛盾的基础上产生的；反过来，它又促进基本矛盾的發展，同时，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可能

性。在資本主义社会，資本在社会化的生产下利用其对生产資料的私人占有殘酷地剝削雇佣劳动，剩余价值規律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很显然，这一規律反映出生产社会性和資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这一基本矛盾的內在联系，反映出資本主义經济中的最本質最深刻的联系。反过来，剩余价值規律作用的結果，資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尖銳化了，不断地引导到危机的爆發，最后导致資本主义的死亡。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沒有生产与需要这一矛盾，就不会用發展生产的手段来滿足社会日益增長的需要的目的，就是說，不会产生这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經济規律。后者把前者內在的、稳固的、重复的联系完完全全地表現出来；它不仅不断地激化了前者，并且不断地为解决前者創造必要的条件。这符合于基本矛盾的第五个特点。

根据上面五点分析，可以肯定，社会主义下的生产与需要間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經济矛盾，因为它完全具备基本經济矛盾的主要特点。可是，一直到現在，还有学者們不承認这一看法。他們認为，生产与需要間的矛盾是任何社会所共有，因而不可能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經济矛盾。他們忘却了，与在其他社会制度下比較，社会主义下生产与需要的矛盾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拿資本主义社会来看，在这里，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着滿足社会的需要，而是为着榨取最大可能的利潤；一般的說，資本主义社会的需要总是落后于生产，因为除在極特殊情况下人民大众的需要与生产比較起来总是相对地縮小；并且，这种生产与需要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它必然引起經济危机的爆發。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切都倒轉过来，因为社会条件完全相反。可見，要了解任何一种矛盾的性質和作用，必須进行具体的分析。

为了进一步明确这一基本經济矛盾在社会主义經济中的作用，还有必要簡略地談一談下列几个問題：

（1）生产与需要間的矛盾的涵义是什么？生产与需要是对立的統一，它們一方面相互依存，另一方面相互对立。这兩方面的相互关系，从其一般性来說，馬克思已在政治經济学批判的导論中非常透辟地闡述了，可是，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还采取不同的形式表現出来，并具有不同的性質。这就要求作具体的分析。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它們間相互依存的关系充分地發展起来，相互对立的关系也不断地出現，从而有力地推动社会不間断地，飞躍地前进。这是共产主义兩个阶段所特有的。

（2）所謂需要是不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关于这个問題，議論紛歧。我覺得，所謂需要应当是指社会上对生产資料及消費資料的实际需要，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所說的"实际社会需要"一样。它并不是社会上生产者和消費者在市場上所实际購买到的商品量，而是在当前可能的条件下，社会上所需要的生产資料和消費資料的数量，不問这个数量在社会上是否存在。在資本主义社会，它是指在商品的貨幣价格或購买者的生活情况变动下社会上所需要的商品量如馬克思所指示的；在共产主义的兩个阶段，它是指按照現有的生产力充分發揮的条件下社会所需要的生产資料以及按照社会現行的生产和分配情况人民所需要的消費資料这兩者的总和。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产品一般都采取商品的形式，不管是生产資料或是消費資料，实际的社会需要也采取貨幣的形式，这就是說，实际的社会需要是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大家知道，社会主义社会要用一切可能来發展生产，而貨幣流通又是掌握在国家手中，因此，任何一种对生产資料的需要，只要有利于發展生产，有利于充分發揮生产潜力，就会从国家那里得到必需的支付能力，不管是采取撥款或是采取貸款的方式。至于社会对消費資料的需要那就要取决于人民手中的貨幣購买力及国家准备用于社会消費的貨幣購买力这兩者的总和，就是說，取决于国家計划所反映的生产和分配的情况。很显然，社会主义下的实际社会需要是有支付能力的需要。但是，在共产主义第二阶段，商品生产消灭了，而实际社会需要也就不采取貨幣的形式。这时，社会对生产資料的实际需要取决于充分發揮生产力的可能性，对消費資料的实际需要取决于当时生

产和分配的情况。可見，所謂需要既不是指社会上实际購买的商品量，也不是漫無标准的、主观幻想的需要，而是指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分配条件下所可能發生的实际社会需要，这种需要在商品生产尚未消灭之前，除少数自己生产自己消費者外，一般是有支付能力的需要。計划化是可以調节人民手中的購买力及消費品的价格的，但不能調节人民对消費資料的需要的構成，也不能防止由于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引起的对生产資料的需要的增長。

附帶指出，所謂生产应当指实际的供給量，即每年实际再生产出来的产品总量，如馬克思所說的供給那样。如果其中有不合于社会需要的，那就应从供給总量中除去，因为不能滿足某种社会需要的东西，就沒有使用价值，就不能当作产品。

（3）生产与需要的平衡是指社会上供給与需要总量的平衡还是指每一种商品的供需平衡？这样的平衡，也可以說，絕对的平衡是不可能的，因为影响千万种产品的供需的因素太复杂了，并且牽一髮而动全身。所謂生产与需要的平衡是指一些主要的，数量比較巨大的产品的供給与需要相适应的趋势，也就意味着总供給与总需要相适应的趋势，因为次要的比較占少数的产品在总产品中的比重是無足重輕的。在实际生活中，有些产品需过于供，有些基本上需与供相等，也有些供过于需。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于生产与需要同时躍进，从某一短的时期看，例如月度或季度，不平衡是常見的，平衡是較少見的，但是，从較長的时間看，例如每五年，由于国民經济計划化的巨大作用，总的趋势仍是平衡，但这种平衡不是停留在一个固定的点上而是不断出現在更高的水平上，就是說，生产与需要同时不断地躍进。

（4）社会主义下生产与需要間的矛盾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間的矛盾及生产关系与上層建筑間的矛盾有何区别与联系？前一矛盾与后兩个矛盾是有区别的，后兩个矛盾是整个社会，也是整个社会历史發展过程中的基本矛盾，而前者是社会主义經济基础中的基本矛盾。可是，社会是一个整体，各种矛盾是相互关联的，各对矛盾之間又互相成为矛盾。社会主义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这一社会一切矛盾的根源，由它产生出生产关系与上層建筑的矛盾，以及經济基础中生产与需要的矛盾。一般的說，前一矛盾的發展决定着后兩个矛盾的發展，反过来，后兩个矛盾的發展影响着前一矛盾的發展，但在某些場合，亦可能对前一矛盾的發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資本主义社会，当基本經济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引起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在我国現阶段，在政治战綫上及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对現时生产力的大躍进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下，随着生产与需要的不断躍进，到了一定时期，社会就进入共产主义第二阶段。从这些例証，可以大致看出这三对矛盾的相互关联。

（5）社会主义下生产与需要間的矛盾与社会主义經济中其它矛盾的相互关联怎样？这一問題前面已經談到了，再簡單地考察一下。社会主义下生产与需要的矛盾既然是基本經济矛盾，它就必然規定着或影响着整个經济中的其它矛盾。例如：要解决这一基本矛盾，就必須在先进的技术基础上使生产不断扩大和完善，为此又必須进一步改进生产組織，改善产品的流通，調整产品的分配；其結果，就必然引起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及分配过程以及各过程之間的矛盾。反过来，这些矛盾間的斗爭又必然影响生产与需要这一基本矛盾的發展；有些矛盾暫时地解决一下，有些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依靠国家自覚地运用反映这些矛盾的規律，所有这些矛盾不断地被解决，又不断地产生，从而社会亦不断地前进。政治經济学的任务就在于具体地分析这些矛盾間的关系及反映这些矛盾的規律的性質和作用。

（6）社会主义下生产与需要的矛盾反映着什么样人与人的关系？上面已經談到，这个矛盾充分地反映着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生产也好，需要也好，都是人民自己内部的事。全体劳动人民应当怎样組織起来进行生产，生产的成果应当怎样分配、流通，以及滿足什么样的需要，所有这些問題都是从生产与需要这一基本經济矛盾产生的，因为它規定着或影响着整个社会經济的發展。这些問題如何解决都会影响工

人阶級，农民阶級，知識份子及其內部各阶層的利益和相互关系。由于生产資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全体劳动人民的基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他們之間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因而生产与需要之間的矛盾亦不是对抗性的。正因为这样，人民內部的矛盾总是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解决的，同样地，社会主义下的生产与需要的矛盾也是通过国家計划的調节，通过社会主义經济規律的自覚运用来解决的，它不可能引导出什么經济危机来。又由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質，在生产与需要之間，相互适应是主导的，不相适应是次要的；正如在人民內部之間，利益协調是基本的，不相协調是次要的，尽管这种不相适应或不相协調的关系在某些場合会突出地表現出来。

（7）在我国現阶段，生产与需要的矛盾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自从我国在經济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胜利之后，社会主义經济在全国范圍內就取得了絕对統治地位，这时生产与需要的矛盾就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經济矛盾。它反映着我国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反映着我国社会的最深刻的本質，即大量存在的人民內部的矛盾，决定着或影响着我国社会經济各方面的矛盾的發展，从而有力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前进。在現时我国經济中，我們看到一系列的矛盾，如兩大部类間，工农之間，积累与消費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間的等等矛盾都是在生产与需要这一矛盾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我們还看到随着这一系列的矛盾的不断解决和不断的产生，生产与需要也不断地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更高水平上的平衡。非常清楚，这一矛盾是我国發展中的矛盾，它不仅不帶給我們任何灾害，相反地，却大力地推动我們的社会前进。右派份子們抓住某些个别的不平衡現象，便狂吠我們的"生产盲进了"，"統購統銷搞糟了"，甚至說"貨幣膨脹了"，"物价高漲了"，这全是政治上的陰謀詭計，無耻的、恶毒的誣蔑。

应当指出，由于我国过去的生产力水平太低，由于我国目前还处在过渡时期，生产与需要这一基本矛盾也具有一些特点。首先，与苏联比較，在我国这一矛盾更为突出，"这表現在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業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業国的現实之間的矛盾"，表現在"人民对于經济文化發展的需要同当前文化經济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况之間的矛盾"。其次，这一基本經济矛盾所反映的人民內部的矛盾不仅包括劳动人民之間的矛盾，还包括劳动人民与剝削阶級之間的矛盾。因为后者不仅有非对抗性的一面，还有对抗性的一面，于是，生产与需要之間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还有对抗性的因素，这表現在某些資本家在經济生活中的違法乱紀上。再次，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还是資产阶級与無产阶級之間的矛盾，也就是兩条道路的斗爭。因此，生产与需要的矛盾虽然已經成为基本經济矛盾，但并不表現为主要矛盾。在現况下，为了更好地解决生产与需要的矛盾，就必須首先解决兩条道路的矛盾，在目前就是經济基础与上層建筑的矛盾。当然，在我們的国家，解决一切矛盾的最終目的就是为着解决生产与需要这一基本經济矛盾，也就是为着尽量地發展生产力来充分地滿足社会日益增長的需要。

我認为，以上的分析可以說明：社会主义下生产与需要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經济矛盾。不具体地、正确地分析这一矛盾，就会在社会主义經济建設中迷失方向，在社会主义經济理論的分析中失去鎮靜。

（上接第26頁）

加2.5亿元。

最后，为了貫徹勤儉建国的方針，必須把国家計划規定的任务，与群众的积極性創造性結合起来，因为編制和执行国民經济計划，是关系到六亿人民的事情，充分發揮群众的积極性和創造性，就会將国家計划变成为群众眞正自覚的計划，这就是完成和超額完成国家計划的保証。

1958年度国民經济計划，在客观上，有許多国內外形势的有利条件；在主观上，全国人民在党的領导下，鼓舞起社会主义的干勁，滿怀着信心，必定能完成和超額完成大躍进的計划指标。

論农業社产品成本的計算

陈治鈞

一、計算产品成本的意义与作用

农業生产合作社（簡称农業社）是社会主义性質的农業企業，它的生产是接受国家計划指导的，但是又保持自己在生产經营上的独立性。国家对于农業社的生产只頒發主要农作物如粮食、棉花、油料作物等的生产指标，或是对于主要作物控制一定数量的播种面积，或是給农業社分派一定数量的征購任务。农業社在保証完成国家任务的前提下，可以較灵活的运用自己的劳动力、土地与其他生产資料，以發展有利于自己的农牧和副業生产。但是究竟应該生产些什么？其主要关鍵是要根据各种作物（畜牧、副業生产）的經济价值对农業社可能提供收益的大小来权衡取舍的。这就要求农業社的領导者掌握具体的生产情况，了解各种生产的贏利程度。因而就要求农業社进行經济核算，正确的核算每种作物（牲畜、副業）的生产支出，并將其收入与支出互相比較，以判断其收益的大小。通过对农产品成本的計算，使农業社可以發現生产支出低而产量高的作物与产品率高的牲畜，从而找到最正确而有利的生产途徑，使农業社有可能据以訂出切实可行有科学根据的生产計划。

在农業社中計算产品成本，可以确定每种产品的生产費用与劳动支出的总額及其生产費用組成的結構，用以与上年度或其他相同生产条件的农業社中同类产品的成本互相比較，分析产品成本的結構可以發掘生产潜力，找到各种作物（或牲畜）最节約的生产方法，使农業社可据以訂出最正确的生产組織技术措施，从而节約生产費用、提高产品产量，以达到增加农業社收入的目的。

产品成本是一个綜合性的工作質量指标。因为在产品成本中包含了在單位产品生产上所消耗的劳动量、物資和貨幣支出，所以这个指标能彙总的反映出农業社的生产組織与生产技术水平，对生产資料的利用情况，多部門經济發展的程度，各种貨幣支出是否节約等等。正确的組織农業社的生产，發展多部門經济，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生产的机械化水平，节約物資的消耗，控制貨幣的支出等等都能降低單位产品成本，使农業社的生产获得巨大的經济效果。因此，从产品成本水平的高低上可以看出农業社組織各种生产經营工作的質量。

降低單位产品成本是社会主义农業积累增長的基础，是提高劳动农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重要源泉。在农業社中單位产品成本的降低，应該表現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产品产量的增加，农業社收入的加大，社員劳动报酬收入的增多以及公共积累的增長上。所以將产品成本指标与收入分配的各种指标（劳动日报酬、公共积累等）綜合的加以分析，便可以测定整个农業社、各种作物、各經济部門生产的贏利程度。

由于各种农产品的价格是取决于各該种产品生产所消耗的社会生产費用的水平，所以要确定各种农产品的价格，就必須要了解农業社对于各种农产品在生产單位产品上生产費用支出的情况。因此，在农業社中計算产品成本，为国家制定各种农产品的价格（包括确定各种农产品的地区差价）以及确定各种农产品的比价关系提供了实际可靠的資料。这便于国家利用价格政策促进农業生产的發展，以平衡国家的需要，从而間接的將計划外的各种农产品生产（国家未頒發生产指标的农作物）納入国民經济的軌道，使其服从于国民經济建設的需要。

此外，有了农業社产品成本計算的資料，使国家能够根据各地的自然条件以及农業生产的贏利程度来确定全国的农業經济区划，規定各个經济区划的專業生产方向。

綜上所述可知，在农業社中計算产品成本，

可以帮助农業社制定科学的生产計划；树立經济核算的观点，采用节約的生产方法，不断的改善生产經营管理；根据成本指标进行經济活动分析，可以計算各种生产、各經济部門、全社的贏利程度，考核农業社的工作成績；同时，有了农業社产品成本計算的資料，这为国家制定农产品的价格以及确定全国农業生产經济区划提供了科学的理論根据。

二、农業社产品成本計算的特点及其所使用的成本指标

在农業社中，由于生产資料集体所有制的特点，决定了农業社的劳动报酬不用貨幣工資的形式支付，在生产中所支出的劳动是用劳动日計算，而其劳动日报酬的大小，是按照农業社生产收入的多少与全社所支出的劳动日总数来分配的。因而在产品的生产費用中沒有工資这一生产費用要素，因此，农業社不能根据其所支出的生产費用計算出以貨幣量表示的單位产品成本。由于这一特点，也就决定了农業社的产品成本計算不同于其他农業企業如国营农場的产品成本計算方法。然而是否可以將劳动日的价值（在实务上有决算分配用的劳动日單价）或將劳动日加以估价計算以貨幣量表示的产品成本呢？

关于將劳动日用貨幣估价計算产品成本的方法，在苏联現有很多爭論，在我国也正在研究这个問題，归納起来，最主要有兩方面不同的主張：

（一）將劳动日的报酬用貨幣估价計算产品的成本。論者認为，农業社的产品成本应該根据农業社实际支付的劳动报酬与貨幣支出（物資折算成为貨幣，以后相同）計算，因此主張用貨幣估价劳动日报酬計算产品成本；

（二）將劳动日按国营农場工人的工資标准估价計算产品成本。論者認为，农業社的劳动日报酬应該按照农業劳动报酬的社会水平計算，而国营农場工人工資标准就是表現农業劳动报酬的社会平均必要支出的水平，因此主張將农業社的劳动日按国营农場工人的工資标准估价計算产品成本。

將各种产品的劳动日报酬或劳动日按一定的标准計价所得的金額与各該种产品的貨幣支出相加，便可求得各該种产品的生产費用总額，以此总額除以各該种产品的产品数量，即可求出單位产品成本。

將劳动日的报酬用貨幣估价的办法，就是將劳动日报酬中实物报酬部分按照一定的估价标准計价①。对于劳动日报酬的估价标准，最主要的又有兩种不同的論点：

1．按各农業社的实际劳动报酬估价計入产品成本；

2．按各地区内农業社的平均劳动报酬估价計入产品成本。

按各农業社的实际劳动报酬估价計算产品成本的办法，有下面一些缺点：

劳动日是农業社内部衡量社員劳动消耗与計算收入分配的标准，它不是衡量社会劳动消耗的数量和質量的尺度。因为劳动日根据工作定額計算，而工作定額与計算劳动日的标准随各地区、各个农業社的自然条件、生产情况的不同而各有差别，而劳动日的报酬在各农業社里也是不相同的。因此，若將农業社的劳动日报酬估价計入产品成本，則使各农業社的产品成本指标失去可比性。首先，是产品成本指标在各农業社之間不能直接互相比較。因为农業社的劳动日报酬是按农業社的总收入分配的，然而各农業社所生产的产品种类及其經济价值的大小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不同农業社的劳动日分配單价也就不相同，縱然假定在不同农業社之間相同部分产品的产量及其所支出的劳动日与貨幣支出都相同，但是因为劳动日报酬的不同，因而所計算出的产品成本也就有高有低，甚至可能相差較大，这是一方面。另外，农業社的收入因自然气候条件、

① 在我国，农業社根据国家粮食統購統銷政策和农業社示范章程的規定，把应該分配給社員的現金与粮食和其他实物（估价）統一計算在一起进行分配，而不是把粮食与現金分开逐項按照社員所做的劳动日分配，在实务上有劳动日的貨幣單价。在苏联則不同，集体农庄是將实物收入与貨幣收入分别按照庄員所做的劳动日分配，劳动日报酬包括实物与現金兩部分，因此要計算貨幣成本，便要对劳动日的实物报酬估价。

集約化經营程度等的不同，在农業收入中包含有部分級差地租收入在內，因此在有較多級差地租收入的农業社里的劳动报酬比級差地租收入少或沒有級差地租收入的农業社的劳动报酬要高些，若將劳动日报酬計入产品成本，当然在劳动日报酬較高的农業社的产品成本要比劳动报酬較低的农業社的产品成本为高。即使將級差地租的因素剔除（由于級差地租的数目不容易計算，要剔除級差地租收入很困难），在一切条件相同的农業社（产品种类、單位面积产量、劳动日支出、物資与貨幣支出都相同）里，同种产品的成本水平也不会相同，这取决于各个农業社留作內部积累数字的多少而定，在提存內部积累低的农業社則用之于分配的部分多，因而劳动日的报酬便高，于是按劳动日报酬計算的产品成本也就高，反之，在提存公共积累多的农業社里，劳动报酬低，因而产品成本也就低。其次，农業社根据劳动报酬計算的成本指标不能与国营农場的产品成本指标互相比較。这是由于农業社产品成本中劳动这一費用要素的計算标准与国营农場的計算标准不相同的緣故。在国营农場里，农業生产工人是按照固定的工資标准（計时付酬或按件計酬）計算劳动报酬，而农業社的劳动报酬沒有固定的标准，是根据农業社收入的多少决定，而是每年变动的。最显著的是，在丰收之年，农業社得到較多的級差地租收入，由于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劳动日的报酬，因而使产品成本增加。但是，在国营农場里則与此相反，农产品收获量的增加（也是由于級差地租的收入），而生产費用并不是随产量的增加而成比例变动的，因而單位产品的成本則有所降低。因为农業社与国营农場的劳动报酬标准不相同，于是由此所計算出的成本指标的內容不相一致，这就使二者的成本指标不能互相比較。另外，国家对于农業社与国营农場的产品成本指标也不能加以綜合的利用，例如不能將二者的产品成本加以平均計算各种农产品生产的社会成本水平。

至于按各地区內农業社的平均劳动报酬估价計算产品成本的办法，是一种假設性的計算，平均劳动日报酬不是农業社的实际支出，在同一区內各农業社的劳动报酬除个别的与平均劳动报酬相等外，一般的不是高于就是低于平均劳动报酬，以此报酬估价所計算出的产品成本，当然不符合于农業社的实际情况。因此，根据这种产品成本指标分析，看不出农業社劳动生产率發展的情况；也不能用这种成本指标計算农業社生产的經济效果。运用地区平均劳动报酬計算产品成本的办法，將各农業社的产品成本水平削得差不多一般整齐，这就掩蔽了先进农業社与落后农業社之間的差别，对于农業生产的發展沒有促进的作用。

將农業社的劳动日按国营农場工人的工資标准估价計算产品成本的办法，又有兩种主要的論点：

1. 按各地区內各国营农場相同生产部門工人的平均劳动报酬（日工資的平均数）估价农業社的劳动日，农業社劳动日的价值按下列公式計算：

$$\text{劳动日的价值} = \frac{\text{国营农場耕种業（或畜牧業）部門的日工資率}}{\left(\dfrac{\text{耕种業（畜牧業）部門的劳动日总数}}{\text{耕种業（畜牧業）部門的工作人日数}}\right)}$$

至于行政管理部門支出的劳动日价值則按农業社各部門劳动日价值的平均数計算。

2、以农業社一个劳动日的工作定額（工作量）在国营农場同一工作量的貨幣工資为标准估价劳动日。

將农業社的劳动日按国营农場工人工資标准計算产品成本的兩种办法与前面所述按地区平均劳动日报酬的估价方法相同，也不是农業社在产品生产上实际支出的生产費用，因此，根据这种劳动日的估价方法所計算出的产品成本不能反映出各农業社生产的特点与經营情况。

按各地区內各国营农場相同生产部門工人平均劳动报酬估价农業社的劳动日，因为先要确定各个經济部門（耕种業、畜牧業）的工作人日数，目前在实务中还沒有計算这种資料，由于农業生产有季节性，社員在一个工作日內的工作时間沒有固定的标准，每个社員出勤一次并不等于一个工作日，因此不能用出勤次数来計算工作人日数，是以在計算方法上还有困难。对于工作人

日数的計算还須要研究建立核算的方法。此外，对于国营农場工人平均工資的資料还須上級农業主管部門解决。

以农業社一个劳动日的工作定額在国营农場同一工作量的貨幣工資为标准估价劳动日的办法，因为工作定額是根据自然气候、生产技术等条件制定的，在各个农業社里同一作業的工作定額与劳动日計算标准都不相同，因此，各个农業社根据国营农場的貨幣工資标准所計算出的劳动日报酬也不会相同，所以各农業社根据这个办法所計算出的产品成本也难于互相比較。

以上各种估价劳动日报酬与劳动日的办法，除上述各别的缺点之外，共同的缺点是：

1．这些成本計算的办法都先要將各种产品的劳动日或劳动日报酬按一定的估价标准換算为貨幣量，再与貨幣支出相加，然后用各該种产品的数量去除才能算出單位产品成本，計算相当复杂，所以就計算方法而論是不够完善的；

2．將劳动日估价后計算产品成本，对于成本指标的分析增加了困难，各个农業社要將这种产品成本指标互相比較，分析产品成本超支或节約的原因，在劳动消耗方面的增减情况究竟怎样，仍需要計算出产品成本中劳动支出的数字，卽是要將产品成本中劳动日的貨幣估价还原为劳动日，这样才看得出劳动消耗的增加或节約的絕对数，那么为計算产品成本指标而將劳动日估价的工作都是徒劳無益的了；

3．劳动日是农業社組織生产計算收入分配的重要經济工具，为了促使农業社节約劳动的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在計算产品成本时，应將劳动日在成本指标中表示出来，上述各种产品成本計算办法，在成本計算的过程中以及在成本指标中都沒有將劳动日这一重要因素反映出来，在产品成本中所支出的劳动日数被劳动日的貨幣估价掩盖了。

在农業社中計算产品成本，必須要对劳动报酬或劳动日进行估价，从上述可知，对于劳动报酬和劳动日的估价方法有多种意見，然而究竟应該用那一种估价办法最为适当，还沒有統一的認識，还須要进一步的研究討論。在产品成本的計算方法上，如何計算才簡便易行，又能保証产品成本指标的眞实可靠，并且又便于进一步的利用成本指标，对于这个問題也很値得商討。

在农業社对于劳动报酬与劳动日估价标准問題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以前，产品成本的計算以分为兩个步驟进行計算最为适当：第一步，計算單位产品的劳动日与貨幣支出指标；第二步，对單位产品的劳动日支出进行貨幣估价，計算單位产品的貨幣成本指标。

产品成本計算的第一步，計算單位产品的劳动日与貨幣支出兩个指标。在計算方法上能够直接使用帳册中的核算資料，不須要进行任何換算。从帳册中卽可直接摘录每种产品的产量、劳动日与貨幣支出，卽可根据这些資料直接算出每种产品的劳动日与貨幣支出指标。因此这种产品成本的計算方法簡便易行，为各农業社所能够采用。同时，这个指标也反映出农業社的經济特点，在产品生产費用中沒有工資支出。从分析單位产品所支出的劳动日与貨幣支出便可看出农業社生产費用的構成情况，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怎样，以及生产技术發展的程度等等。并且，各农業社根据这种产品成本的計算方法所計算出来的指标，可保証指标的含义都相同，因而各农業社的同种产品的劳动日与貨幣支出指标可以互相进行比較；在农業社的內部，也可以將产品劳动日与貨幣支出指标和上年度同种产品的支出指标进行比較；單位产品的劳动日与貨幣支出指标不但是可以就整个农業社計算，也可按每个生产队来計算(只計算直接支出，不分攤間接費用)，并且在各个生产队之間进行比較。根据單位产品的兩个指标还可以更进一步的对于每种产品計算其每个劳动日的生产收入，这样，便可以对于各种产品生产每支出一个劳动日所得收入的大小进行比較，研究各种产品的贏利程度。通过对于單位产品的劳动日与貨幣支出指标的比較、分析，可以發掘生产潜力，研究降低生产支出和节約劳动日支出的生产方法。

产品成本計算的第二步，是計算單位产品的貨幣成本指标，就是要对于單位产品的劳动日支出进行貨幣估价，以計算出完全以貨幣量表示的

产品成本指标。关于农業社劳动日报酬与劳动日的估价問題，在前面已經研究过四种主要的估价方法，每种估价方法都各有一些缺点，但是也各有其优点，所以不能單独采用其中一种估价方法来計算产品成本，可以采用兩种不同的估价方法互为补充。对于产品成本中劳动日的估价，可同时采用农業社的实际劳动日报酬（即实务上的劳动日分配單价）与按国营农場的平均劳动报酬估价劳动日的方法来計算兩种产品成本指标。

采用农業社的实际劳动日报酬計算出的产品成本，可用来确定各种产品、各經济部門、整个农業社在生产上的經济效果。农产品生产經济效果的大小，可根据其純收入的多少确定之。产品的純收入就是产品的价值減去产品成本后的余額。以每种农产品的純收入与其播种面积进行比較就可計算出每亩土地所获得收益的大小。將各种产品每亩地的收益互相比較，并比較每种产品支出一个劳动日所得的收入，綜合分析研究，便可确定农業社在生产那种产品上最为有利。因此，將产品劳动日与貨幣支出指标以及將按实际劳动日报酬計算的产品成本指标同时进行分析，可帮助农業社研究生产發展的方向，确定产品生产的品种問題，应該生产些什么产品。

采用国营农場工人平均劳动报酬估价劳动日所計算的产品成本指标，可以与社会上农产品生产的成本水平互相比較。因为国营农場与农業社的生产是屬于同一类型，国营农場的工資标准反映农業劳动报酬必要的社会支出的水平，即是說，国营农場的工資是补償农業劳动消耗必要的社会劳动报酬，因此，用国营农場工人平均劳动报酬估价所計算的产品成本便具有社会范圍的可比性，这种产品成本指标在农業社与农業社之間以及农業社与国营农場之間可以互相比較。將前述按农業社实际劳动报酬計算的产品成本指标与按国营农場工人平均劳动报酬所計算的产品成本指标比較，可以說明农業社生产發展的情况，这兩种产品成本指标的区别在于对劳动日报酬所用估价标准的不同，因此，如果按农業社实际劳动报酬所計算的产品成本指标大于按国营农場工人平均劳动报酬所計算的产品成本指标，則說明农業社的生产水平高，用之于劳动报酬的份額大，这是农業社經济發展的表現，反之，則說明农業社經济情况落后，那么农業社便应該采取改进农業生产的措施，以消灭生产發展落后的現象。国家可用农業社按国营农場工人平均劳动报酬計算的产品成本指标和国营农場的产品成本指标計算各个地区的平均产品成本，用以确定每种产品的价格水平；此外，国家也可以用这种产品成本指标計算全国各地区各种农产品生产的經济效果，从而分析各地区农業生产發展的情况，以确定全国农業生产的經济区划和各区專業生产的方向。

綜上可知，先計算产品成本的兩个指标，然后計算产品的貨幣成本指标，不但是簡便易行，而对农業社的生产經营管理都有巨大的意义（見前述）。按农業社实际劳动报酬与按国营农場工人平均劳动报酬計算的兩种貨幣成本指标各有不同的意义，可相互补充其不足，都是必須的。

三、农業社产品成本的計算方法

农業社对于各种主要产品，如国家頒發計划指标的作物如粮食、棉花、各种經济作物，以及那些收入多商品率高的产品都要分别計算产品成本。

要計算产品成本須先要分别核算各种作物、各类牲畜、副業生产、基本建設与大修理，以及其他經济部門如畜力工作、汽車运輸、修理等的生产費用与劳动日支出。每种作物、每类牲畜、副業生产都应同时設立生产費用、劳动日支出以及收入三种明細帳。关于生产費用明細帳：在种植業支出方面，要按三包作物与其他主要作物类别分設明細帳；畜牧業支出方面，要按牲畜类别（或畜群别）設立明細帳；副業生产方面，要按其生产的类别（如編織、竹器生产等等）設立明細帳；基建与大修理按工程对象分别設明細帳；其他經济業务部門都要分别設立明細帳。生产費用明細帳的格式应該采用多欄式，在帳戶的直欄里分别生产費用的構成（如种籽、肥料等）設專欄，在帳戶的横行里逐一登記每笔費用的發生額。关于劳动日支出明細帳：在种植業方面要按每种作物就

全社設立明細帳，在帳戶的直欄中按生产队設專欄核算其劳动日支出，或是对每种作物按每个生产队設明細帳；在畜牧業方面，为整个畜牧業部門設立劳动日明細帳，在畜牧業相当發达的农業社里，要为每个畜牧場（或生产队）設立帳頁，在明細帳的直欄中按牲畜类别（或畜群）核算劳动日支出；副業生产要为每种生产核算其劳动日支出；基建与大修理要設立一个明細帳，在帳戶的專欄中分别工程对象核算劳动日；其他經济部門都要分别核算劳动日；管理人員的劳动日也要設立專門的帳頁核算。

农業社为进行生产所支出的一切費用与劳动日，有一些是与各种作物（或牲畜、其他部門）的生产發生直接关系的直接費用，当其發生时便能直接記入上述各种明細帳之中；但是有一些支出是为几种作物或整个經济部門、为全社支出的，这些費用不能記入各种作物（或牲畜、其他經济部門）明細帳，而应單独設立帳戶核算，要在計算产品成本时用分攤的办法轉入各作物（牲畜、其他經济部門）明細帳中。这些費用对于各种作物而言是間接費用。

屬于間接費用的有种植業部門共同生产費、畜牧業部門共同生产費、輔助生产部門的費用、管理費等。

关于生产費用項目：在种植業支出方面，应將种籽、肥料、农藥、机耕費、畜力工作費、折旧費、共同生产費、管理費等單独列出項目加以核算；对于畜牧業支出，应將飼料、褥草、畜力工作費、折旧費、共同生产費、管理費等分列項目核算。上述各种費用支出在作物和牲畜的生产費用支出总額中都佔相当大的比重，为了反映上述各种費用支出在产品成本結構中所占的比重，又便于分析各費用項目組成的变动对于成本升降的影响，找出降低产品成本的方向，所以对于上述各种費用支出都要在帳戶中設專欄分开核算，并將其列作产品成本項目。上述各个生产費用項目在各地各种不同的生产情况之下还有一些变动，要适当的增添重要的生产費用項目；对于各种生产支出的零星費用，可在帳戶中設置“其他費用”一項加以核算。

为了便于农業社之間的产品成本項目能互相比較起見，产品的生产費用項目应由农業主管机構統一拟訂頒布施行。

在生产費用的核算中有下述几个問題值得研究：

（一）在生产中耗用自产的种籽、飼料、自制的低值易耗品等的計价問題　农業生产的特点之一，是自己生产出的产品不是全部进入流通領域（銷售或分配），有相当大一部分产品要作为生产資料又重新投入生产过程，如种籽、飼料等是，这是一方面；另外，农業社为要节省現金支出，要尽量利用本身力量生产各种小农具、筐籃、繩索等低值易耗品以及磚瓦等建筑材料以供生产与基建上的需要。农業社自产的产品、自制的材料投入生产，在原則上应按照各該产品材料的生产成本計入生产支出之中。但是如前面所述，农業社的产品成本是采用貨幣与劳动日兩个指标表示的，因此，消耗自产的产品材料如按其成本記帳，則势必要將产品材料的成本即貨幣与劳动日兩个部分分别轉計入新产品的生产費用明細帳与劳动日明細帳中。这对于編制产品成本报表，分析产品成本項目的構成都增加困难，如要將这种成本指标与不同年度的成本指标以及与其他农業社的成本互相比較，还要进行一些輔助的計算，这是相当繁复的工作。因此，对于耗用自产的产品材料按兩个成本指标分别轉帳是有問題的，不宜采用。最适当的办法是采用估价的原則，就是按照国家的收購价格、銷售合同价格或管理委員会的議价（經社員大会批准）將耗用的自产产品材料轉入各种生产支出（种植業、畜牧業、副業等），这种計价方法，不但是在帳务处理上簡便（在产品材料帳中以那种价格入帳；在支出时用这同一价格銷帳），而且又簡化成本計算工作；同时，又便于产品成本的分析。故較切合实用。

（二）关于农作物机耕費用的計算問題　机耕費用是农产品生产的直接費用。在实务上，农業机器拖拉机站对于每种代耕作業（耕、耙、播等）都有規定的收費标准。因此，农業社对于在每种作物上的机耕費用，在原則上，都可以根据

每种作物的种植面积与各种作業的代耕單价計算直接記入各該作物生产費用明細帳中。关于間种与混种作物应該計入的机耕費用，可按照各种作物的种植面积的比例分攤。假若农業社在付出机耕費的当时不能确定每种作物的分攤額，則应設立登記簿分别記录每种机耕作業在每次支付的金額，待計算产品成本时，确定每种作物的負担数后再結轉入各种作物的生产費用明細帳中。

对于农業社产品成本中应計机耕費用的問題还有这样的論点，認为农業机器拖拉机站利用其生产資料与劳动力为农業社服务，农机站与农業社共同生产的結果得到同一农产品，因此在农产品中包含了农机站与农業社的生产資料及其劳动量的消耗，因而要按照农机站的机耕作業成本計入农業社的生产費用中（农机站作業成本可按实际成本也可用計划成本）。按这样計算的农产品成本可以同农产品的社会成本水平比較，也使农机站关心降低农業社的生产費。

这种論点是否可行呢？由于农机站的經营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因而各个农机站的成本水平也就有相当的差别，以此計入农業社的产品成本，必然是产品成本水平高低参差不能互相比較，另外，农机站与农業社是各别独立的經济組織，农机站对外服务是按照一定标准收費的，因此把农机站成本計入农業社产品成本中是不正确的，若是由此而使农机站关心农業社产品成本的降低，在目前农机站的收費标准与农業社的产品收获量沒有联系的情况下达不到此目的。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按此論点的作法反而使农業社的产品成本計算問題复杂化，故不切实用。

（三）关于折旧費的計算問題　固定財产（如农業机具、房屋、建筑物、其他生产設备等等）在生产过程中由于使用而逐漸磨損，其磨損部分的价值是轉移到新产品的价值之中；同时，在固定財产的使用期間为了保持其生产能力，还須要定期进行大修理，支出大修理費用。大修理費用也構成产品价值的一部分。所以对于固定財产再生产（重置与大修理）的資金来源应該从产品成本中取得补償。其补償的方法就是在产品成本中計算折旧費用。目前在实务中，有的农業社不計算折旧費。在此情况下，固定財产的再生产資金来源是取給于公积金。从收入分配的观点看，在生产費中不計折旧費，而由提存公积金来补償固定資产的耗損，是二而一的事。但是要計算产品的完全成本，就必須將固定財产的折旧計入产品的生产費用之中。固定財产的折旧一般是將其原始价值加大修理費与清理費减去殘值后的余額按其使用的年限（农業机具按耕地面积亩数、汽車按吨公里）比例分攤計入生产費用。

由于农業社与国营农場都是屬于同一生产类型，如农業机具、牲畜、建筑物等都是相同的，因此农業社固定財产的折旧可采用当地国营农場的固定財产折旧率来計算。

（四）关于畜力工作費　畜力是广大地区农業生产的主要动力，在生产上使用范圍很广。畜力工作費在作物生产費用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正确的核算役畜費用是正确計算产品成本的前提条件。

在实务上，对于役畜一般都是分散交由生产队飼养管理与使用，沒有設立畜力工作費用明細帳；有的社只將对外服务用的役畜費用才設立專用的帳戶进行核算。在計算产品成本的要求之下，对于役畜飼养与使用費用都須要設立明細帳核算。另外，为了便于分攤畜力工作費，还要对于役畜工作按其使用的部門（作物、牲畜类别、副業生产等）核算其工作日（牛工作日、馬工作日等），进行这种業务的核算不但是便于分攤役畜費用，而且还可以监督畜力工作的利用情况。

在年終，各种生产費用与劳动日（作物、牲畜、副業、其他經济部門）明細帳彙集了本年度全社在生产上实际支出的一切直接与間接的生产費用与劳动日。但是已發生而記在各种作物生产支出明細帳中的数字并非全部都是本年度应計入产品的生产費用。在各生产支出明細帳中还要进行下列各項調整：在有的明細帳中要加上已發生应付而未付的費用及上年度为本年度收获作物所支付的費用与劳动日；而应將本年度为下年收获作物所支出的費用与劳动日从帳中减去。

按照上述生产費用与劳动日的核算程序核

算农業社的生产支出，并經过年終調整之后的数字，才是应計入本年度产品中的生产費用与劳动日。

在前面已經說明，在产品生产上所支出的直接費用是記在各种作物、各类牲畜的明細帳中，为各种作物、各类牲畜以及其他經济部門生产都有关的費用，是另設間接費用明細帳核算的，如种植業（畜牧業）部門共同生产費与管理費等是。因此要計算單位产品成本就必須將間接費用用分攤的方法轉記入各种作物（牲畜）的明細帳中。

間接費用一般可以按照各种生产上所支出的直接劳动日的比例分攤。关于間接費用的分攤方法：

种植業部門共同生产費（包括劳动日）可按照各种作物上所支出的直接劳动日的比例分攤計入各种作物的生产費中。

畜牧業部門共同生产費（包括劳动日）可按照各类牲畜（或畜群）所支出的直接劳动日的比例分攤。

至于畜力工作費（包括劳动日）要按照为各种作物、各类牲畜、其他經济部門所作的馬工作日（或牛工作日）的比例分攤。

修理部門的費用应按代各生产队、畜牧場、副業生产等所进行的修理工作上的劳动日数比例分攤。至于在修理工作上所發生的一切費用应直接記入各生产支出明細帳中不用分攤。

管理費（包括劳动日）按照种植業、畜牧業、副業生产等部門生产上所支出的直接劳动日的比例分攤。为避免轉攤之繁，可以不必將管理費用分攤給輔助生产部門。

关于基建投資与大修理支出、农業社对外服务收取报酬的那一部分支出、用农業社公益金开支的各种支出以及向国家繳納的农業税等都不应轉攤計入产品的生产費用之中。

經过上述間接費用的分攤轉帳，在各种作物、各类牲畜、副業生产等的生产費用与劳动日支出明細帳中归集了为进行产品生产所支出的一切生产費用与劳动日。

农業生产的特点之一，是通常在同一生产过程之中能生产出兩种以上不同的产品：主产品与副产品，或是兩种以上不同的联产品，例如稻与稻草、羊肉与羊毛等是。因此，为要确定每种产品的成本，就必須將各种作物，各类牲畜（畜群）的一切生产費用与劳动日在同一生产过程所生产出的产品之間分配。就一般而論，主副产品与联产品的生产費用和劳动日的支出可按其价值的比例分攤。各种作物、各类牲畜的生产費用与劳动日支出的总額經过主副产品（或联产品）之間分配，其每种产品所分攤的生产費与劳动日用各該种产品的产量去除就得出各該种單位产品的貨幣与劳动日支出兩个成本指标，將單位产品的劳动日支出按規定的标准估价所得的金額与貨幣支出相加便得出以貨幣量表示的單位产品成本。

以上說明了成本計算的一般原則。按照上述原則組織农業社的核算工作，可大大的改进財务管理工作，提高三包管理水平。在农業社中計算产品成本是为目前农業生产大躍进形势之下所需要而能付諸实現的。

（上接第 31 頁）

而且庫存物資已增加了 50 亿元之多，弥补 1956 年所曾动用的部分而有余。

这一切，都充分証明我国财政、預算工作的無比的优越性与强大的生命力。右派的誣蔑和讕言絲毫不足以动摇全国人民对我国财政、預算工作的信心与拥护，而只是暴露了他們自己的無知与企圖复辟資本主义的陰謀而已。

在目前的形势下，即在国内粉碎了資产阶級右派、群众的革命干勁空前高漲的形势下，在国际上形成了东風压到西風的形势下，我們偉大的党又發出了关于开展反浪費、反保守运动的指示，而且这一偉大的群众性运动已經在全国各个方面开展起来。在这样情况下，1958 年的国家預算更具备了順利实現的条件。只要我們抓紧反浪費反保守运动这条綱，开展大生产、大躍进运动，那就一定能够完成并超額完成 1958 年国家預算所交予我們的任务。

讓我們乘風破浪，为胜利地完成并超額完成 1958 年国家預算的任务而奋斗！

关于我国农業生产計划向征購計划过渡問題的商榷(下)

張开敏　陈声雅

四　对于过渡方式的几种不同意見

农業計划制度的改变对于农業生产的影响很大，必須采取审愼的步驟，因此逐步过渡是完全必要的，問題在于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过渡方式最为适宜。目前关于这个問題的意見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意見是暫时不过渡，仍然采取規定生产計划的方法，但在指标掌握上应当放寬放松一些，以克服过去規定过严过死的偏向。等到相当时間以后，各方面的条件較为成熟了，再考虑改用征購計划。

这一种意見显然是比較保守的，其产生的根源主要是还沒有認識到問題的实質所在，正如前面已經說明的，农業生产計划之所以存在着缺点乃是由于农業生产計划的性質与目前农業生产中的特点不相适应所造成的。如果不改变現行的农業計划制度，仅仅在掌握程度上加以改进，并不能根本解决問題。

农業生产計划的缺点基本上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放寬掌握程度仅仅是主观上的改进，但是这种改进并不能产生什么效果，相反地，还將会造成其他的不利影响。在生产計划制度下，国家对农業生产的領导是通过規定生产任务来进行，当生产指标掌握过紧时固然会影响到农業社生产經营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但在放寬掌握程度以后，国家的計划任务不明确，农業社安排生产时缺乏确切的依据，难免会發生自流的偏向，其結果將会使得农業合作社的計划不能符合国家計划的要求，影响农产品供需的平衡。并且放寬掌握程度以后又必然会影响到对編制計划的要求，因而更加降低了生产計划指标的正确性，这样就不能提高現有的計划工作水平。况且消極地等待也就是放弃了通过計划制度的改变，加强計划領导，促进农業生产發展的重大作用，不能够利用計划制度来协助解决当前国民經济發展中新的矛盾。因此这一种暫緩过渡的办法是不能够符合目前客观形势發展要求的。

第二种意見是采取"双軌制"的方法，国家計划在規定农产品征購任务的同时，又規定农業生产任务，兩套計划同时下达，最后分配到农業合作社，其中农产品征購指标是帶有指令性的必須完成的任务，农業生产指标則不帶有指令的性質，只是起着参考和指导的作用。贊同"双軌制"的意見認为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既可以推行征購計划制度，同时又能够防止农業生产的自流偏向，保証农業社的生产計划不致与国家計划的要求相差过远。

"双軌制"的办法看来是比較稳妥而且提出了一些重大的改进，例如农業生产計划不是指令性的任务，而只起着参考和指导的作用。但是实际上，这种办法却与現行的制度沒有什么区别，因为国家規定的农業生产計划对于农業合作社从来就不能帶有指令的性質，所以在这一点上实际上沒有什么改变，最多也不过是在掌握程度上放寬一些，但是正如前面已經說明的，放寬掌握程度并不是克服生产計划缺点的根本方法。

此外，"双軌制"虽然也要求国家計划規定并下达农产品征購指标，作为农業社必須完成的指令性的任务，但是在与农業生产計划同时下达的情况下，这种征購指标就会失去了指导农業社安排生产的作用。

应当知道，农产品征購本身并不是一件新的工作，而是早在几年以前就已开始进行了，并且当时的征購指标中的大部分也都是必須完成的任务。差别就在于过去的征購任务是在农業生产計划以后下达，而現在則是提前与生产計划同时下达了，但是农民过去已經習慣于根据国家規定的生产計划安排生产，根据征購計划交售产品，若是改变制度以后，仍然是同时下达兩种計划，那就会使农民难以体会新制度的意义，不能够改变过去的習慣，結果征購計划指导生产的作用也就难以發揮。

根据"双軌制"的要求，农業合作社在制定生产計划时，既要依据国家的征購計划，又要考虑国家的生产計划，这样就將会增加新的困难，如果农業社只需要完成征購計划，不需要完成生产計划，那么生产指标的下达就只是形式；如果农業社完成了国家規定的生产計划，而不能完成征購計划，那么征購計划就將失去其指导生产的意义，而且也不能保証农产品的如数供应；如果既要求农業社完成国家的征購計划，同时又要求完成国家的生产計划，那么对于农業社生产經营独立性的限制就比單独下达生产計划时更为增加了。

采用征購計划制度的原意是要求国家計划通过掌握商品产量来指导农業生产，以便充分發揮农業生产中的机动性和主动性，但是"双軌制"却又要用生产計划来保証征購計划的完成。这样就違背了改变計划制度的原意。兩套計划同时并行的結果，必然是互相牽制，既不能發揮征購計划的优点，同时又不能克服生产計划的缺点。

并且由于生产計划的牽制和掩盖作用，就不能够及

时發現征購計划在实踐过程中产生的問題和缺点，并找出克服改进的办法，因此也將必然会影响到征購計划制度通过实踐不断完善不断發展的要求。从这些方面看来，"双軌制"的方式是否适当，还是值得考虑的。

第三种意見是"分品种过渡"，这种意見認为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按照不同品种的农产品分别过渡的方式更为妥当。对于粮食作物可以只規定征購指标，由农業社根据征購任务和本身需要来安排生产；对于經济作物則仍然应当規定生产指标，由国家直接掌握产量和播种面积。贊同这种过渡方式的理由是：目前我国的粮食和經济作物的供需都很紧張，而农民本身最感需要的首先是粮食，如果国家不直接控制經济作物的产量和播种面积，則农業社在安排生产时，很可能为了多种粮食就片面地提高單位面积产量，縮減經济作物的播种面积，結果將会影响經济作物的产量，不能保証完成征購任务。所以有必要由国家直接掌握經济作物的产量和面积。

这种意見还認为，对于經济作物不規定征購指标只規定产量与面积还可以便于国家根据收获的情况随时調节征購的数量，当經济作物遇灾欠收时，就可以适当降低农民的自留量，优先保証国家的需要。

此外，由于經济作物播种面积在全部农作物播种面积中所占比重較低，大約仅占 15% 左右。因此，即使国家計划直接控制了經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对于整个农業生产的机动性也不会發生很大影响。

主張"分品种过渡"的用意是由于目前粮食作物和經济作物播种面积之間存在着矛盾，因此希望通过国家計划直接控制經济作物的产量和面积的方法来保証国民經济对經济作物需要的供应。然而，若是从可能發生的实际后果来看，这种方式也还是值得商討的。

首先，經济作物的商品率很高，产量的絕大部分是供应工業部門需要的，农民自己消費的部分很少，所以国家計划只要控制了商品产量就能保証国民經济的需要，沒有必要規定全部生产量。而且經济作物的生产量与其征購量之間的差額很小，这一部分差額就是农民的自留量。然而并非所有的农民都需要自留的，但是过去对經济作物生产量的核算却普遍估計了农民的自留量，以致扩大了对經济作物播种面积的实际需要量，結果不仅影响了土地的更合理使用，并且还有一部分自留量流入自由市場，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因此，对經济作物規定生产指标也是不必要和不适当的，直接控制經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矛盾的办法。

至于由国家計划規定經济作物播种面积的方法更是值得考虑，改变計划制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求發揮农業生产中的机动性，直接控制播种面积的办法显然不符合这个要求，虽然經济作物的播种面积仅占全部播种面积的15%左右，似乎影响不大。但是应当知道，主要經济作物的种植并不是平均分布于全国各个地区，而是重点地集中在某几个地区的，因此硬性規定播种面积的結果，就会大大影响这些地区中农業生产的机动性，对于这些地区所产生的影响和限制就絕不止 15% 了。

然而，目前我国粮食生产与經济作物生产之間确实存在着矛盾，为了保証国民經济的需要和工業生产的發展，必須要求农業社种植一定数量的經济作物。但是为了达到这一个目的，并不一定要由国家計划来直接控制播种面积，如果采取控制征購数量以及审查农業社生产計划的方法，并且配合其他一些方面的措施，將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

事实上，即使国家計划硬性規定了經济作物的播种面积，也不一定能保証完成經济作物的征購任务。如果有关經济作物生产的一些問題不能够得到正确的解决，虽然农業社按照国家計划安排了播种面积，但是生产的积極性不能提高，經济作物不是播种在最适宜的土地上，农業社不願多施工、多施肥，也还是不能得到高度的收获率，結果不仅影响了經济作物的生产量和征購量，并且又浪費了农業社土地和人力，所以控制播种面积的方法并不是保証国家能够取得足够数量經济作物的完善方法。

正确解决經济作物供需矛盾的途徑应当是創造有利于經济作物生产的条件，發現有关經济作物生产的一些問題，例如正确分配征購任务，做好粮食供应工作，合理調整价格比例等，并加以适当处理，这样才能够使得农業社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結合一致，提高农業社的生产积極性，使它們願意种植經济作物并爭取高度的收获率，于是国家征購計划的完成才有了眞正可靠的保証。

有些时候也可能出現相反的情况，即个别的农業社为了單純追求产值，过分扩大經济作物的播种面积，以致种植过多超过需要，并且又影响到粮食作物的生产。对于这种情况必須加以糾正，但是也不一定要采取直接控制播种面积的方法，而可以通过地方計划机关对农業社生产計划的审核来加以糾正。在审核过程中，如發現有这种偏向时，地方計划机关就可提出建議，要求农業社修改原定計划，縮減經济作物的生产，保証完成粮食的征購任务，或者保証农業社所需口粮的全部或一部分的自給。同时，国家还可以通过控制粮食供应，調整稅率，以及加强市場管理的方法来限制农業社片面地扩大經济作物的生产。采取这些經济措施的方法較之硬性規定播种面积是更为合理有效的。

也有这样的情况，即个别的农業社在完成国家的征購任务，并保証本身粮食需要的条件下，还有余力扩大經

济作物的生产，那么就应当讓它們按照自己的願望安排生产，自負盈亏，这样做不会發生很大的偏差，对国家也不会有什么不利。所以也沒有必要硬性限制它們的播种面积，这时計划机关的任务应当是通过更好地运用經济規律，加强市場管理，引导农業社的生产向最符合国家需要的方向發展。

根据上述理由，"分品种过渡"的方式也不是最适当的，为了眞正达到改变計划制度的目的，提高計划管理的水平，还应当另外寻求更为妥善有效的过渡方式。

五 "分地区过渡"的方式以及应行准备的各項工作

根据我国的情况，我們認为最好是采取分地区逐步过渡的方式。因为我国的特点是幅員广大，疆域辽闊，各个地区的發展不平衡，各个地区的具体条件也有很大的差异，有些地区自然条件比較优越，合作化以及計划工作的基础較强，就可以先行采用征購計划制度；至于条件較差的地区則可以暫緩一步，农業計划制度的改变并不一定要求在全国范圍內同时进行。

采用这一种方式可以选擇几个条件比較优越的省，同时在其他各省內也可以选擇几个重点县，作为先行过渡的地区。国家計划对这些地区不下达生产任务只下达农产品征購任务，这些地区对下也是逐級分配征購任务，最后下达到农業社，由农業社根据分配到的征購任务結合本身的需要編制社的生产計划，然后逐級上报彙总，以备国家审核平衡。

这一种方式的优点就在于不会受到生产計划的牽制，能够充分發揮征購計划制度的作用，并且通过实踐过程就可以發現新制度执行的缺点，积累經驗，提供进一步研究改进的資料，使得征購計划制度能够逐步趋于完善，創造在全国范圍內普遍实行征購計划制度的有利条件。由于試行的面不是太广，試行地区的条件又比較优越，因此即使在試行过程中發生一些缺点或偏差，也不致于造成过大的影响。所以"分地区过渡"的方式是既积極、又可靠，較之前述兩种方式更为适当，值得考虑推行。

然而农業社計划制度的改变終究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其效果的好坏对于农業生产起着一定的影响。为了切实保証在实踐过程中不致發生任何較大的偏差，充分發揮新制度的效果，在各地区开始試行以前，还应当認眞进行下列一些准备工作：

1.認眞审核并正确制定各种农产品的消耗定額，例如城乡居民的口粮定額、各种牲畜的飼料定額、輕工業生产中的原料消耗定額等，作为核算农产品需要量的科学依据，以便进行农产品的总資源平衡，确定征購量。这一工作在过去几年中已經有了主要农产品計划供应的基础，积累了相当的資料，現在还需要在过去的基础上进一步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情况，更精确地进行核算，并加以必要的調整。2.加强对农产品自由市場的管理，凡是屬于統購統銷的主要农产品不准进入自由市場，农業社在完成了这些产品的征購任务后，除了本身的需要以外，多余的产品应卖給国家指定的商業或供銷社机構，以免影响征購任务的完成，同时也为了防止資本主义經营思想的發展，引导农業社正确地安排生产。至于不屬于統購統銷的农副产品，在完成国家征購任务以后，应当准許农業社自行处理，用来滿足本身需要，或者出卖以协助調节城乡居民的需要。3.动員并組織各个有关部門改进計划工作，及时地提出准确資料，配合征購計划編制工作的需要，并提前計划下达时間以保証計划对生产的指导作用，使农業社能及时地依据国家征購任务安排生产。4.加强下層計划机構，充实力量，提高業务水平，以便能够更好地掌握当地情况，向上提供可靠資料，向下正确分配征購任务，并能够指导和帮助农業合作社編制計划。5.迅速建立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儲备，以防止歉收对于征購計划的影响，保証各个年度之間农产品供应和需要的平衡。6.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覺悟，克服本位主义的思想，树立整体观点，保証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的正确結合。7.加强对农業生产技术措施的指导，配合改制后將要出現的生产积極性，促进农業生产的迅速發展。

以上各項工作，有的已經进行，有的还待开展，認眞做好这些工作就能保証征購計划制度取得良好的效果。

同时，其他各个地区对于这些工作也应当积極准备，創造有利条件，以便逐步地做到全面实行征購計划制度。

农产品征購計划是农業計划制度的进一步發展和提高，这种制度能够促进更好地运用經济規律来引导农業生产的發展，能够适应我国农業生产的特点，从而加强国家对农業生产的計划領导，巩固农業生产与国民經济之間的联系，并且創造有利条件促进农業生产的进一步大發展。

根据当前的在优先發展重工業的基础上，工农業并举的方針，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期間推行征購計划制度將是促进农業生产大躍进，从而推动国民經济全面發展的有力措施，因此我們应当积極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爭取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期間能够逐步地在全国范圍內实現农業計划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挖掘潜力，为农業生产大發展創造更有利的条件，以适应国家經济建設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支援国家工業化，保証第二个五年計划能够得到更为輝煌巨大的成就。

在十五年內，一定赶上英国！

本文系我院举办的專題講座之一，由業务部門同志主講。

主講人　顏次青

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詞說："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業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我們应当爭取在同一期間，在鋼鉄和其他重要工業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將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这是多么偉大的、激动人心的号召，也是中国人民光荣的任务。

英国原来是資本主义世界中挂帅的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工業生产已有308年的历史，就是从历史上所称的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开始也已有二百多年。因此，在很長的一段岁月中，英国的工業生产在国际市場上称王道霸，有"世界工厂"之称，也就憑借了工業力量的优越，挑起骯髒的鴉片战爭，入侵我国的第一号帝国主义，就是大英帝国。就在今天看来，虽然由于第二次大战后的世界形势有了很大变化，殖民主义已經沒落，英国的工業生产已退居美国的后面，但是工業生产的基础还是深厚的，工業生产的水平仍然是相当高的。作为工業發展标志的鋼的产量，在解放前我国最高年产量仅有92万吨，只相当于英国在1875年左右的鋼产量的水平，要比英国落后整整一个世紀，就我国現时的鋼鉄和其他重要工業产品的产量来看，也只等于英国十九世紀末年的生产水平。例如我国1957年年产535万吨鋼，只相当于英国1957年鋼产量2,100万吨的四分之一，相等于英国1904年鋼产量的水平，落后了五十多年；我国1957年产煤12,800万吨，只相当于英国1957年煤产量24,400万吨的二分之一稍强，大致相等于英国1873年煤产量的水平，落后了八十多年。就以英国重要工業之一的紡織工業来說，在1956年生产棉布147,000万公尺，比我国年产棉布576,000多万公尺，从数量看要少得多，但是我国人多，英国人少，英国每人年平均为29公尺，而我国只有9公尺，我国人民在穿衣的水平上仍远落于英国之后。至于毛紡、印染工業，英国历史攸久，品种多，質量好，其中毛紡織品却是世界第一位，每人年平均6公尺，更非我所及。化学纖維1956年年产量21.5万吨，占世界第四位，合成纖維年产2.7万吨，占世界第三位，按人口平均为6.5磅，而我国在这方面却剛开始建厂，尚未生产，相差是更大了。以上这些情况清楚的指出，我們要在十五年內赶上或超过英国，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要作很大的努力克服各种困难才能达到目的，而且我国工業基础先天不足，国民經济还很落后，科学技术也不發达，要在短短的十五年內赶上已有三百年工業历史的英国，并不像有些人所想的那样輕而易举。但是，中国有着六亿勤劳勇敢的人民，有着愚公移山的志气，在久經鍛煉战無不胜的偉大的中国共产党和英明的毛主席的正确領导下，一定会作出历史的奇迹，我們有信心也完全有条件来实現它。那种强調困难而認为無法赶上的看法也完全是錯誤的。

我国已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有着無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和英国在和平竞賽中决定胜負的决定性因素。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就有可能实行計划經济，全面安排国民經济的發展，最合理最节約的来利用一切生产設备和各种原材料，并調动一切积極因素，以取得最大的經济效果。因此，我国工業生产的發展速度是很高的，如第一个五年計划期內，1957年的我国工業总产量比1952年增長了132.5%，其中重工業产量增長了兩倍左右，每年平均增長速度高达18.3%；英国是資本主义的国家，工業生产受利潤法則的支配，整个国民經济無法全面安排，在無政府狀态和激烈的竞爭中进行生产，这样工業生产的發展速度必然大大落后于我国，如英国自1937年至1956年的十九年中，工業总产量只增長了50%，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只有2%。如果以主要产品产量的發展为例，我国鋼产量由1952年的134.9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535.4万吨，增加近三倍，每年平均增長速度是31.8%；煤量产由1952年的6,353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12,230万吨，增加近一倍，每年平均增長速度14.1%；英国鋼产量从1913年到1956年的四十三年中，由778.3万吨增加到2,100万吨左右，增長169.7%，每年平均增長1.3%；即以1941年到1956年鋼产量增長較快的年份来說，英国每年鋼产量平均增長速度也只有3.5%；英国的煤从1913年到1956年的四十三年中，它的产量不仅沒有增加，相反下降不少，从29,200万吨下降到22,556万吨，下降了22.8%。同时，还应当看到，英国就是如此緩慢的工業發展速度，由于受到資源、市場的限制，和不可避免的經济危机，也是不可能經常保持的，今后我国工業發展的速度必然大踏

步的走在英国的前头。

我国有六亿多人口，人口众多，不仅有極丰富的劳动力資源，而且是工業品的最大消費者。因此，我国有着世界上最广大的国内市場，我国工業产品主要是用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上的需要，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生产的目的所决定的。如以我国紡織工業生产的紗布来說，絕大部分用在国内的民用衣着、工業用料和国防工業發展的需要，只有数量不大的紗布为了支持兄弟国家或和平友好中立地区人民的需要而出口，仅占总产量的5% 左右；同时，亦以此換取部分外匯来支援国家工業化外匯資金的需要。由于我国經济落后，工業产品还不能充分滿足人民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的需要，如我国棉布供应1957年还不得不压縮了一下，1958年城市居民供应量每人也只有18尺；同时，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为滿足全体劳动人民和全社会的不断增長的需要；这就給生产力开辟了無限發展的广闊前景。但是英国的情况却不相同，英倫三島人口只有五千多万，国内市場很小，由于資本主义的殘酷剝削，劳动人民購买力增長很慢，而且时高时低極不稳定；因此，英国的工業品主要依靠国外市場銷售的，英国工業的历史，也就是在掠夺殖民地，积累血腥原始資本的基础上發展起来的。在1880年英国棉紡織品輸出占总产量的67%，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輸出棉紡織品竟占产量的85%，但时变势异好景是不常的，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六亿人口的中国摆脫了帝国主义的羈絆，和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組成了社会主义陣营市場，和資本主义世界市場并行，加深和扩大了資本主义市場的紧張和危机，其中尤其对英国，因为解放前的中国是英国历来的最大銷售市場之一。同时，在二次大战后，其他許多殖民地国家如印度、埃及等不断地取得独立自主，并發展了自己的民族工業，美国、西德和日本等資本主义国家又不断扩展国外市場，这就使得英国的国外市場不是日益扩大，而是日益縮小，对英国工業生产和輸出不能不帶来严重的影响和后果。如曾經占英国整个輸出品中50%的第一位的棉紡織品的輸出，今天仅占其产量的10% 左右了，1957年6月份的棉紡織品进口达4,000万平方碼，輸出却仅3,800万平方碼，輸入反超过輸出，这在英国棉紡織历史上还是空前第一次，蘭开夏的大資本家們为此大为苦惱。

我国不仅人多市場大，而且地也大，有着無比丰富的自然資源，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只要加以合理地开發，蘊藏的物質資源必將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而英国却是資源貧乏的国家，許多重要原料需要进口，从而进行加工生产和發展它的工業。我国煤的貯藏量仅根据目前了解的就有一万亿吨，英国只有1,739亿吨，只及我国煤貯藏量的17%；我国鉄貯藏量达120亿吨，英国只有38亿吨，只及我国鉄貯藏量的31.6% 左右，而且品位很低，大部含鉄量只有30%左右。因此，我国工業生产的重要原料主要来自本国自然資源的开發，目前由于我国工業生产还不甚發达，所以还輸出一部分多余下来的矿砂、煤炭、鋼材和鹽等。随着地質勘探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我国地下資源必將大量涌現，今后滿足我国工業生产的需要定將綽綽有余；以解放前依附美棉的紡織工業为例，由于解放后党和政府采取了許多有效措施，大力發展了国内棉花生产，就使解放前要耗用美棉70%左右的上海紡織工業至1956年下降到进口棉仅占5.68%，其中一部分棉花的进口还是为了国际上友好的关系。英国則不然，国内生产的原料只有10% 左右，紡織工業大量消耗的原棉和羊毛，大部分要依靠埃及、印度和澳大利亞等国家的进口，1954年进口原棉量就达756万市担以上，比上海紡織工業年耗原棉600万担还多出150万担以上，数字是相当惊人的；石油工業的原料也大部分依靠榨取阿拉伯和中东国家的石油来維持生产的；化学工業中磷肥工業原料磷矿，几乎全部是从北非摩洛哥等地进口的。本国的工業生产建筑在其他国家原料的供应上，这在資本主义世界如不維持殖民統治是不可靠的，因为原料是壟断資本的生命綫，大家都要爭夺的。但是近世紀来英国的殖民主义已日趋瓦解和没落，帝国主义伙伴之間更尖銳的展开了对原料的爭夺战，英国工業所需原料的进口是在逐年减少中，同时本国的有限資源，經过了几百年大量的开發，埋藏量也已剩得不多了，这不能不給英国工業生产的發展产生極大的困难。

东風压倒西風，社会主义力量胜过帝国主义力量，和平力量胜过战爭力量，这是当今世界形势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力量的空前团結和壯大，和世界形势的根本轉折，对我国工業建設和工業生产的發展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中工業建設發展得如此迅速，主要就是依靠了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結和帮助而取得的，其中特别是苏联的極其珍貴和崇高的無私援助。在第一个五年計划中，我国开始施工的限額以上的工厂有820多个，預計1957年可以全部建成的約有450个，其中屬于苏联帮助設計的有156項的57个，此外还有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的10个。在第二个五年計划內，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还要帮助我国設計140—150个大型項目。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在过去五年中还以最新的技术裝备和最好的專家来支援我国的工業建設，特别是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建設社会主义的經驗更是我們的榜样，我們可以在前人的脚印上繼續前进，抄近路，避免或少犯錯誤，这

一切無疑地都加速了我国工業化的步伐。但是，帝国主义国家都是强盜搭伙各有鬼胎，互相竞爭，互相傾軋，恨不得立刻淹死对方，以取得独霸地位，英美在阿拉伯地区的爭夺战就是一例。

目前英国工業已停滯了一年以上，英国工作母机制造業得到的訂貨从1956年8月的10,400万美元下降到1957年8月的8,800万美元。英国的紡織工業更是在走下坡路，紗錠由最盛时代的6,000万枚，到1956年六月底只有2,397万枚；自1952年到1956年下半年这一期間，就有265家紗布厂倒閉；因此，紗布生产也自1951年的242万件下降到1956年的176万件，只比上海紡織工業1956年总产量162万件多14万件而已。由于工業生产停滯，生产縮減，不能全部开工，工業的技术更新也就更談不到了，原来設备比較陈旧的英国工業裝备，更是老牛拖破車，越拖越破也越重，英国工業的前景是并不美妙的。我国工業化迟，一开始就在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無私的援助下来建設的，就可以采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既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也沒有任何历史的包袱，完全可以迎头赶上去，犹如旭日东升，光芒万丈，日进千里，这自然不是約翰牛所能望其項背的了！

我們还有着能够叫"高山低头，河水讓路"的偉大勤劳的劳动人民，在党中央英明的領导下，可以繞过任何暗礁，使工業生产乘風破浪加速前进。您看鞍山的鋼鉄工人不是已經發出了宏大的声音，要在1958年提前实现1960年生产320万吨鋼的預定指标嗎?!一年要跑三年路程，有了这样生龙活虎般的工人弟兄，还怕在十五年内赶不上英国?!

但是，我們还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英国的工業生产由于种种困难只能倒退，一点也不能發展了。我們設想英国工業生产在今后十五年内还是有可能發展一些的，然而即使英国工業在今后十五年内仍保持目前的發展速度的水平，我国仍然可以赶上去。英国鋼的产量如仍然按照1941—1956年的速度每年平均增長3.5%，則1972年英国鋼产量可能是3,645万吨，而我国鋼产量从1957年到1962年至少將增長到1,200万吨，到1972年有鋼4,000～4,500万吨左右，就大大超过了英国鋼产量水平，假如我国鋼产量在1972年只需达到英国3,600多万吨水平，那只要每年平均增長13.8%就行了，而我国鋼产量在第一个五年計划中每年平均增長率却是31.2%哩！举一反三，其他重要产品的产量也完全可以在十五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

用不到我們自己来作結論，我們的对手在比賽还未开始时就提它的結論式的看法了。倫敦的泰晤士报說："我們最好还是注意，可能很快就会有一条巨龙紧跟在我們的后面。"而且最后还作了結論，不到十五年，英国一定要被打敗。历史是無情的，百多年前首先用炮火打敗我国入侵远东的头号帝国主义，今天在和平竞賽中將輪到我們把它打敗，我們也完全有信心一定会打敗它。讓我們乘風前进！讓我們乘东風压倒西風，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風前进，掀起工农业生产建設的高潮，我們在十五年内，一定，一定能赶上和超过英国，把帝国主义远远抛在后面！

（上接第38頁）

在本例中，按部門法計算出的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为－373.13百元① 而按企業法計算的結果却仍然是－265百元。但事实上，由于撤消資金周轉緩慢的丙企業，而代之以資金周轉較快的丁、戊兩企業，必然会帶来資金节約額的增加。企業法之不宜于用来計算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是十分显然的了。

* * *

根据以上分析，我們可以作出相应的簡短結論。

（一）商業資金节約是指商業流动資金的相对节約，它主要决定于資金周轉速度的快慢。

（二）計算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一般有兩种方法：（1）部門法，（2）企業法；它們各有其經济意义，但以部門法为宜。

（三）采用部門法計算綜合單位資金节約額的最一般的概括的公式为：

$$\Sigma c_1 - \Sigma c_0 \cdot \frac{\Sigma o_1}{\Sigma o_0} \cdot \frac{K_0}{K_1}$$

这个公式全面的包括了下列諸因素变动影响的全部实际效果。

1. 各企業資金周轉日数变动的影响；
2. 企業銷售額結構变动的影响；
3. 环节性系数的大小及其变动的影响；
4. 所屬企業單位增減的影响。

① 計算公式同上，具体計算步驟从略。

一年来在調查研究工作中的几点体会

——上海經济研究所筹备处工作总結的一部分

黃靜澄

我所自1956年8月底开始筹备，1957年3月开始調查研究工作，5月中旬以后即轉入整風运动和反右派斗爭，实际从事調查研究工作的时間，大約为5个月，直接参加調查研究工作的人員为41人，此外尚有高等学校来参加調查的教师18人，时間約3个月。

我所当前的中心任务是調查研究"上海資本主义的發生、發展和死亡的过程及其規律"。我們把这一任务分为兩个大組，一个大組調查研究上海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簡称改造組)，一个大組調查研究上海資本主义工商業的历史(簡称历史組)。1957年的計划确定：改造組把主要力量放在对"上海資本主义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营的过程及其經驗"的調查研究上面，下分五个分組，分别調查紡織工業、重工業、輕工業、商業及普陀区的对資改造的过程。历史組下分三个分組，分别調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恒丰紗厂及大隆机器厂等三个典型企業。在这一段时間，根据各种資料，摘录了680万字，写成报告43篇，約共138万字；其間为了搜集資料曾开座談会75次，訪問有关干部、工人、資本家等共314人次。

通过这一时期的工作，我們对于調查研究取得了一些初步經驗，培养和鍛煉了自己。現在把这一时期工作的几点体会写在下面，供大家参考。

一　調查研究的路綫和方法問題

关于調查研究的路綫和方法問題，我分三方面講：(一)准备工作，(二)調查工作过程；(三)編写工作。

(一)准备工作　首先是思想准备工作，这是开始进行調查的第一件工作，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因为参加調查的人員来自各个方面，而調查工作又是集体进行的，如果人心不齐，工作就一定做不好。我所的研究人員是有从業务部門来的，有从高等学校来的，他們帶着不同的动机和个人要求进研究所，对于深入群众、深入業务部門、企業單位进行調查，多数人都不習慣，很多人希望到研究所就是为了讀書和著作，要自己去搜集資料做研究，就覺得不合自己的意思；还有高等学校的教师来短期参加工作，只是为了拿些資料回去充实教学。由于業务知識不足，开始調查工作也是有困难的，因而感到不如讀書好。我們針对着上述思想情况做了以下三个工作：

(1)对于每一个参加調查工作的同志，都进行了关于我所"輪廓規划"和計划的学習，并对他們講明这一中心任务的意义和重要性，以及我們实現这一任务的初步打算。

(2)对他們进行了一次有系統的关于調查研究的立場观点和方法等方面的学習，我們选擇了毛主席著的"农村調查报告"的序言和跋、"改造我們的学習"、"实踐論"和"矛盾論"等文件，学習了一个多月，每个人都联系思想写出了心得。对于調查的重要性，大家都有一定的認識。有些人批判了自己理論不联系实际的学習方法。这一学習是有收获的。对于动員大家出發調查，起了啓蒙作用。可惜时間稍为短了一些。

(3)搜集了有关資本主义改造的政策、法令和文献，进行了閱讀，并举行几次报告会，主要是关于資本主义改造情况和工業史料。由于时間限制，对这一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如果能結合調查，指定若干有关的参考書籍和文献进行学習，对于調查工作是有好处的。

其次，我們根据我所的輪廓規划，确定工作的起点。对于这样大規模的集体調查研究工作，我們都缺乏經驗，特别是上下百余年，資料、文献，浩如烟海，究竟从何处开始，这是一个关鍵性的問題。如果要工作不走弯路，就要开始得好。在这方面，我們首先明确了兩个原則：第一个原則是从点到面，点面結合。因为像"資本主义發生、發展和死亡"这样大的題目，全面来进行調查，不但在人員上沒有这样大的力量，而且在具体安排上也是有困难的。因此，我們确定从典型开始，取得經驗，再逐步推广到面，而且还可組織其他單位在統一規划下分工进行調查。第二个原則是由近及远与由远而近相結合。我們从解放以后，逐步上溯到各个时期，直到1840年为止。將来有了力量，再組織一部分人从1840年向下面搞，这样做，比較現实，資料容易取得，对每个調研人員的生活經驗接近，比較亲切体会。根据上述兩个原則，我們做了以下几个工作：

a. 摸底：我們組織了一部分人对上海工商業的現行情况及公私合营后的变化，进行了摸底。并通过各同業公会，摸清了主要行業的簡史的面貌，以及資料的情况，

和資料的源泉。同时又組織了一部分人摸清了資本主义工商業改造的簡單过程，在公私合营高潮中的組織領导情况，和資料情况等等。摸清了底，就便于选典型。

b. 选典型的工作，对于我們取得經驗，培养和鍛煉干部，指导一般和推广到全面，有决定的作用。如果典型沒有代表性，就达不到上述的目的。我們大体上提出了以下几个原則：1.先工業后商業；2.工業按重、輕、紡各选一个典型；3.与国計民生有关的数量較多的行業；4.在历史組方面要选历史悠久，曾經在各个时期与帝国主义斗爭、官僚資本主义斗爭而現在仍存在的企業。因此在改造組方面，我們成立了五个分組，分别以第一重工業局、市紡管局、第一輕工業局、第一商業局和普陀区为調查对象；历史組以南洋、恒丰和大隆为調查对象。現在看起来，这些对象的选擇，基本上是正确的。資料的多寡和是否系統，在历史組方面，不是选点的主要条件。有人認为恒丰、大隆的資料不及南洋充分，因而不够典型，但这兩个組通过調查，訪問座談，仍然获得了三、四十万字的資料，而这些資料，由于是从职工、資本家直接取得的，比文書資料要費更多的辛勤劳动，更加值得宝貴。

在此地，特别要談到我們从調查"資本主义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業的过程及其經驗"开始，而不是从"解放以来的改造工作"开始，有人認为这是攔腰一刀，好像割断历史似的。根据各組討論，現在看来，这样做还是有好处的：第一，因为这一方面的資料非常齐全，沒有任何散失，特别是参加工作的干部都在，容易取得活資料，可以趁热打鉄；第二，因为高潮时期这一段工作，时間不長，工作分量不大，作为試点，便于取得經驗和鍛煉干部，万一走了弯路，損失不大；第三，因为調研人員中不少人参加这一段工作，对这一段工作記忆犹新，容易下手。同时，是各方面都迫切需要这一方面的材料，早些搞出来，可以滿足人們的需要。当然搞了这一段工作以后，可以逐步轉到按行業从解放以来作系統的調查。同时还考虑到改造工作，还在繼續进行，必須有人專門調查研究当前的改造問題。过去我們把对人（資产阶級分子）的改造單独列为一項是不妥的。因为人的改造工作必須結合企業改造来进行，因而对人的改造的研究工作，也不能孤立地进行。其次，对历史的調查，今后可轉为对資本家家族集团的調查，如申新系統、刘鴻生系統等等。把各个主要家族集团的資料集中起来，是既有代表性，又有現实意义，对于研究民族資本主义的發生、發展和死亡是有很大益处的。

再其次，拟訂1957年計划：根据摸底的結果和調研人員的力量，制訂了1957年的計划。由于我們缺乏經驗，工作量估計沒有把握，因而計划不切合实际的情况是存在的。但必須有一个近于实际的計划，也是十分必要的。有了計划，就有了大家奋斗的目标。在工作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还可不断修正和补充計划。有人認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不同，不可能訂計划，这是不对的，当然調查研究这样的工作，主要是个体手工業式的脑力劳动，不能像工厂那样計算得很准。去年的計划如果不是因为整風和反右派斗爭，一定可以完成。計划偏大一些，对于推动大家拿出革命干勁，有好处。我們認为"多快好省"的方針，不但对于工农業生产是适用的，对于科学研究工作也完全是适用的。有了計划，就必須抓紧檢查，我們对改造組各分組的定期会报，出調查情况簡报，的确对推动工作，及时解决調查中的問題是有好处的。当然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如少数人就产生了任务观点，不重視質量，特别是高等学校来的教师，他們有赶好任务早回学校的思想，不能不影响到工作的質量。同时有些同志干勁很大，經常开夜車，也不能不影响到个人休息与業余学習，这都必須加以注意。

最后，是拟訂調查提綱。这一工作非常重要，因为这是調查工作的起点和依据，主要因为：（1）拟提綱的过程，就是了解調查对象、学習調研工作的过程。提綱拟好，对整个行業或企業就有了概括的認識；（2）提綱揭示出調查对象的主要問題，有了提綱就把調查的目的和要求体現出来了；（3）提綱对被調查的單位，提出了具体要求，犹如进飯店吃飯先开出菜單一样，有了提綱被調查的單位，就可以充分准备供应，甚至指定專人負責代我們搜集資料。所以提綱拟訂的工作，必須由参加調查的主要研究人員，亲自动手。在拟訂提綱时，也必須广泛搜集資料，必要时要举行座談会和个别訪問。这样，提綱才能尽可能的全面而具体地反映客观存在的問題。在提綱中，要竭力避免使用主观的結論性的詞句，因为这很容易使我們在調查中偏重吸取片面性的資料，如只搜集"好"的或"坏"的反映。每一件事，都有可能是好的或是坏的，在沒有占有大量資料以前，还不能下結論說它主要是"好"还是"坏"。提綱拟好后，必須經过大組的討論加以修正；在整个工作进程中，还要根据客观实际不断加以修正和补充。对每一个具体企業、具体問題，也还要拟訂补充提綱。在編写报告时，也要另行拟訂提綱。

（二）調查工作过程　整个調查工作过程可分为四个方面：

（1）首先要与有关業务部門（調查对象）和可供应資料的部門联系，取得他們的支持、协助和信任。在这次調查中，由于我們采取了由上而下的系統的联系，經过有关上級的介紹，事前直接訪問了有关部門的負責人，向他們說明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并把参加調查人員的政治情况与業务水平，向他們做了簡單的介紹等。因而各个被

調查的單位，都充分地支持我們，給我們安排了工作地点，充分供应資料，指定專人为我們介紹情况，有的單位甚至在行政会議上，把支持这一工作列入他們的議程。这对我們順利进行調查有决定性的作用。同时，我們根据不同的情况，与被調查部門建立了相应的組織，如在南洋，我們和公司的負責人共同成立了史料調研委員会，以我們为主做工作。这也是很好的組織形式，充分發揮了协作精神，这是南洋小組工作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在調查工作中，也必須明确阶級路綫，明确調查工作，必須依靠組織（党和行政）、依靠工人，这是取得丰富資料的重要源泉。当然我們也不应放弃或放松对高級职員和資本家的工作，从他們手上取得很多的資料。但是有人認为既然是調查資本主义工商業，資料大部在資本家手中，因而我們就要走資本家的路綫，一切資料搞好了都要給資本家审閱，这显然是錯誤的。資本家对企業情况的反映，因为与个人有利害关系，往往是只講光荣的一面，而隐藏陰暗的一面。他們所提供的資料，有很大的片面性，如申新史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我們要多找老工人談。从老工人中取得資料是比較麻煩的，但这种資料是最可靠的，也是可宝貴的。調查和搜集資料的工作，是細致而瑣碎的工作，我們必須勤恳耐心，爭取主动，千方百計想办法，使对方把資料拿出来。由于人家是为我們服务的，切忌急躁。同时，也不能有依賴思想，或者守株待兎，坐在家中等資料。調研人員在調查中最好爭取在行業企業中找到一个立脚点，以便与行業、企業中的工人、职員多接触。这不但对于我們調研工作有好处，也給予我們以深入联系群众的机会。

（2）关于資料的来源，大体上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文書資料，又可分为企業內的和企業外的。企業內的包括：文書档案、会議記录、表报帳册、报刊、資本家及有关人員的信扎和文書等；企業外的包括：往来銀行、会計师查帳报告、稅务机关的記录、征信所的資料等。第二是活資料。对企業的有关人員如工人、职員、資本家以及和企業有往来的人員如顧客、往来客戶及竞爭行業的人員，举行座談或进行个別訪問。第三是書报杂志上的文章、通訊和广告，以及前人对該企業的論著等等。

（3）关于摘录在調研工作中的作用問題是有爭論的，有人認为摘录不过是为了写报告，提供参考資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我們認为它既是手段，又是目的。說它是手段，因为摘录是我們通过閱讀、学習和思維过程的結果，又是帮助我們記忆的手段。說它是目的，因为摘录是我們資料方面的基本建設，摘录得好，对其他人做研究工作也有好处。在这里，有下列几种体会：（a）关于如何摘录問題：摘录的好坏是决定报告內容的重要因素之一，大家必須重視，研究人員要亲自动手，不要采取大体上看一看，用紅笔划一下交見習員抄写的办法，特别是重要的資料。（b）摘录应該随看、随想、随摘。根据自己的主观审定，做一番去粗取精的功夫，把認为重要的部分都摘录下来，特别是一些生动的有历史意义的事例和語言文字，必須全录下来。当然各人水平不一样，看法又不尽相同，因此在摘录某一类資料时，共同拟定几条标准是必要的。（c）寬摘紧摘与摘多摘少的問題，也有爭論。普陀区組主張寬摘多摘，他們的理由是資料既然拿不回；为了写好报告就必須多摘，重工業組主張紧摘少摘，他們的理由是只要把报告写好，摘多了浪費时間。当然摘得太多，等于全抄，失去了摘录的意义。但必要的合乎基本要求的摘录必不可少。万万不可偷工減料。（d）摘录最好能一事一卡，同时必須写明資料来源，以便必要时找原始資料。（e）根据摘录作成索引，以便随时参閱。

（4）关于座談訪問：座談訪問是取得活資料的手段。在进行座談訪問时，必須注意下列各点：（a）要有准备的进行，确定目的，选定对象，拟訂提綱，提出的問題要突出，提綱要事前送給座談和訪問的对象，以便他們充分准备，做到座談訪問有的放矢。（b）参加座談会的人，要少而精，时間要有估計，要保証到会的人都有充分發言的机会。（c）每一次座談会所談的問題必須集中、突出，不要泛泛地無所不談。（d）进行訪問要不怕麻煩，要勤恳有耐心，但也要注意不要使对方討厭。（e）进行座談訪問的时机要选擇适当，在調查开始前，除必要情况外，可不作座談訪問，一般情况可从文書档案中了解，看了文書档案發現問題以后，再根据問題分别进行座談訪問，以补充文書資料的不足，并使調查工作更加深入。

（三）編写工作　（1）在編写前，一定要把材料核实。材料太多时，可采取重点核对的办法。对于重要的数字，关鍵性人物的关鍵性語言，前后矛盾的問題以及可以引起怀疑的地方，进行核对，求得正确的結果。（2）拟訂編写提綱，提綱和报告的主要內容要經过小組討論。小組討論很重要，它是消化的过程，是打腹稿和补充腹稿的过程，也是發揮集体作用的过程。我們在这一方面做得很不够。（3）决定材料的取舍，要以科学的态度，进行“去伪存眞，去粗取精”。还要从全局来观察，看看还缺些什么材料，加以精选补充。（4）报告的形式有二：一种是拥有較大量原始性的历史資料，可分兩步走，第一步先將資料加以整理成“資料彙編”，第二步再根据“資料彙編”，加以分析，概括写成綜合报告，如南洋組所采取的形式。第二种是原始性的历史資料不多，主要是靠活資料，即根据資料加以分析概括，直接写成綜合报告。另外，像改造組的調查，因为資料具有当前的現实性，又十分龐大繁

多，一般都进行綜合整理，写成綜合性的調查报告。（5）报告的文字体裁不要刻板，讓大家"百花齐放"，不要千篇一律，要力求生动活潑，反对八股。特别是要求明确性和邏輯性。

最后，关于如何总結提高的問題，这是一个大問題，不是三言兩語講得完的。但必須肯定，要以馬克思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对待所取得的資料，要用阶級观点和历史观点去分析資料，必須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有的組提出要把資料分为兩类，一类是有关阶級斗爭的資料，如关于劳資糾紛、罢工事件等：另一类是有关企業經济活动的資料如生产經营財务管理等等。这样的提法，我們認为是不妥的，因为在阶級社会中一切活动都一定程度地反映了阶級斗爭，因而对所有資料都应当用阶級观点去分析。有人提倡搞經济史要强調客观主义，其实在阶級社会中，有关資产阶級的資料，特别是官方的資料，都充分反映了資产阶級的主观願望和对客观眞实的有意歪曲，很少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因而提倡客观主义，無异为資产阶級的罪恶掩盖与辯护，这是很反动的历史观点。我們在总結工作中必須首先掌握这一重要的原則。

二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个人与集体的正确結合問題

在我們的調查研究工作中，存在着个人与集体之間的矛盾問題，主要表現在下列几个方面：

（1）个人兴趣、專長同国家任务之間的矛盾。有人認为研究的項目要根据个人的兴趣、專長来規定，有兴趣和發揮專長才能專心致志做好研究工作。把个人兴趣、專長同国家的任务对立起来，他們不願从事"上海資本主义發生、發展和死亡"的調查研究工作。有的人認为这是一种牺牲，有的人要求按自己的兴趣搞国际經济和部門經济；有的人要求"一專定終身"，要求組織上早日替自己划定搞一輩子的研究范圍和研究方向；甚至有的人强調搞輕工業，不肯搞重工業，願搞"改造"調查，不願搞历史調查等等。总的就是个人兴趣第一，把个人的"專長"作了不正确的估价，不願服从国家計划。其实，个人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大多数人事实上还沒有眞正的專業，还有待于今后工作的努力。

（2）業余研究同業內研究之間的矛盾。有些人对業內研究不重視，不感兴趣，对業余研究則多方搜集資料，以致晚上熬夜写小册子忙于投稿，白天精神不集中，要求尽量挤業內时間来学習理論、閱讀报刊。他們認为"白天八小时是国家的，業余时間是自己的"，把对国家任务的研究工作与个人研究对立起来，業內做的是国家的，業余搞的才是自己的。很显然，这一方面是个人名利思想在作怪，另一方面，把国家任务看成是負担。事实証明，搞一件事三心二意是搞不好的，尤其是研究工作更要"心無二用"。

（3）个人学習，培养同工作之間的矛盾。有些人把个人的学習、培养同工作对立起来，要求少做工作多讀書，他們不把鑽研工作做好、工作看作是主要的学習和培养的途徑。

（4）有些人不願做抄写、摘录、調查等具体工作，而要求一下子就担任独立的研究工作，搞一个專題，不願做助手，而要做主將。

（5）除上述矛盾而外，还有兩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大家对于集体調查工作缺乏經驗而产生的。一种是很多人在研究方法上还是習慣于个人單干，不習慣于集体研究。一种是主观上很想搞集体，但还缺少經驗。如有一个組七八个人，在每次調查后，都进行集体彙报討論，事实上耽誤了很多时間，还不可能每个人都取得彙报的机会，討論也不充分。同时，有些組在分工上采取平均主义的办法，一人一个分題，沒有主次，影响到工作質量。为了解决上述問題，提出下列意見：

A. 必須从政治上提高大家的社会主义覺悟，最近柯庆施同志提出的关于高級知識分子改造的五項标准，这对于我們是完全适用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人必須从根本上解决个人同集体和国家之間的关系問題。这一个問題不解决，就永远不能过社会主义这一关，也就不能做一个又紅又專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个人的兴趣是在工作中培养起来的，我們对于每一件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事業，都应以积極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貢献自己的力量。

B. 我們現在是否已經"專"了？我看，我們这里的大多数人，都还沒有專。現在不应强調自己的專業，現在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和自己的基础逐步培养專業，以适应国家的需要。而且"專"，必須建立在"紅"的基础上，先專后紅是假的，我們必須爭取又紅又專。当然，我們在分配工作上，必須适当的照顧每个人已有的專業和原来的基础。要注意"适当"二字，不应要求国家的需要服从于个人的專業。

C. 把業余的个人研究和業內的国家研究任务，更好的結合起来。每个人都应該充分利用業余时間，应当把充沛的多余精力用在学習方面。我們在基础理論方面，在外国語方面都很不够，以及当前現实的經济問題也应当关心，应充分利用时間来补課，苦学，不要急于搞个人著作，一举成名。当然为了鍛煉自己的写作，利用業余时間写論文是好的，但应結合国家研究任务来进行选題，不要造成矛盾。应把業余学習和研究，納入于国家研究計划之內，这样，將有助于更好地完成国家的研究任务。

D. 关于集体研究的組織形式問題。研究室（組）是一个大的集体，而經常活动的集体是研究分組。研究分組如何組織，如何进行合理分工和协作等，初步体会是分組人員不宜过多，以配备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实習員各一人为宜。如題目較大任务較重时，可适当增加助理人員。分組的人員应分主次，主要研究人員应担任：提出研究提綱草案，起草分組調查研究計划，指定参考書目，确定具体进行調查的方法和搜集資料的范圍，主持研究討論，主持訪問座談，提出編写报告的中心及輔导助理人員，并做好分組的政治思想工作。我們一方面反对有些人"以助手为芻狗"的做法，另一方面强調助手必須服从主要研究人員的領导，做好分配的工作，要甘願做助手，做小学生。根据助手的水平，分任起草一部分研究报告是必要的。整个分組工作成果，应当成为以主要研究人員为首的集体創作。对于室（組）与分組之間如何有机結合，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三　理論联系实际問題

我所一开始，就是向大家提出理論联系实际的問題，并确定为我們从事研究工作的根本路綫。但是理論联系实际問題，在我所的研究人員，不是沒有問題的。首先在我所的另一个研究組——政治經济学組，表現得最为突出。他們的研究不是从当前的現实經济問題出發，而把編教科書为工作方向；不从大量占有資料出發，而是着重研究有关前人、外人的著作，在概念中兜圈子。他們受到一种錯誤思想的指导，認为調查是跑腿工作，沒有理論，認为对現实問題的經驗总結沒有規律，以至这一段时間中，他們的研究工作，除了自己讀了一些書报而外，成果不大，事实上已走了弯路。他們的錯誤路綫不能不影响到改造組和历史組。由于这一問題在他們并沒有徹底解决，一遇到适宜的土壤，自然要生長出来，他們有的說："我們剛从学校出来，理論知識本来不巩固，現在成天下厂，沒有讀書时間，長此下去，連过去所学的也要忘掉"。有的說，"我們既是科学工作者，必須提高理論水平。不仅要学理論，还要專門安排業务学習的时間，否則水平提不高，实踐脫离了理論"。就是說，（1）他們希望多讀些書，少做些調查或不做調查；（2）認为調查工作是"实际脫离理論"，是經驗主义的做法；（3）認为科学院就是讀書和学習理論的地方，不必要有什么調查任务。归根結蒂，就是对于理論联系实际的研究路綫，抱着怀疑或不能接受的态度。我們和資产阶級的学者，在科学研究路綫和方法上存在着兩条道路的斗爭。我們既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經驗主义，要求理論与实踐的正确結合。理論是从实踐而来，是从总結实踐的經驗出發，把事物的实际运动加以分析、抽象、概括，找出其規律性，这就是理論。理論又反轉来指导与充实实踐，并通过实踐，加以修正、充实，使理論更加丰富起来。这就是理論与实踐的辯証关系。只有經过实踐証明的理論，才是顚扑不破的眞理，也才是科学。古往今来的眞正科学家、理論家，都是理論联系实际的，絕不是靠死讀書和背誦古人的詞句而成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許多經典著作，就是主要依靠总結他們本身的革命实踐經驗，依靠来自群众的大量丰富資料，和批判吸收前人的文化遺产而成的。毛主席的道路，就是理論联系实际的道路。他早在大革命时期和国内革命战爭时期，就强調走群众路踐，主張从群众中来再回到群众中去；强調調查研究，并且他亲自进行农村調查；主張从实际斗爭中用馬克思主义的辯証法分析問題，总結經驗，从而制定政策、战略，領导革命。由于毛主席坚持理論联系实际的路綫，所以在他的領导下，革命和建設無往而不胜利。如他最近提出的"关于如何正确解决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提出"在优先發展重工業的基础上發展工業和發展农業同时并举"等，大大丰富和發展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正是通过理論联系实际的道路。才有这些偉大的創造。我們搞經济科学研究工作，必須首先参加經济建設的实踐，其次必須从群众的实踐中搜集和占有大量丰富的資料，第三要学好馬克思列宁主义，要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来鑒别資料，去伪存眞，去粗取精，进一步加以分析概括，找出規律性，做出正确的結論。第四，研究和利用前人、外人的研究成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有批判地加以吸收。

当然我們提倡理論联系实际，不是說不要讀書。相反地我們提倡多讀書，多学習理論。我所規定每周有一天半的时間学習基础理論（辯証唯物主义），这說明我們是重視理論学習的。但是我們要有目的地讀書，必須联系实际地讀書。列宁在1920年"青年团底任务"中教导我們，"如果說，研究共产主义只限于通曉共产主义著作、書本和小册子里的东西，那么我們也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产主义的書呆子或吹牛家，而这往往会使我們受到損害的。"又說，"……所以單从書本上来通曉論述共产主义的書籍所里說到的东西，便会是極不正确的。"

有人說，我們"实踐脫离理論"，也是不正确的。这就是不重視調查，不承認群众实踐的經驗总結中有丰富的理論。从群众实踐中所获得的理論，是經过考驗的理論，是值得我們学習的。我們所获得的文書資料，以及座談訪問从群众中来的东西，都是很宝貴的东西。我們必須加以重視。誰要是不懂得理論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他就一定脫离群众，脫离实际，他就要陷入于教条主义或科学的神秘主义的漩渦，就永远不能眞正的跨进科学之門。

本院学术动态

結合教学革新运动，我院教师將集中主力于一年內基本上編写出各种主要学科的中国化教材近四十种。中国化教材要基本上求以毛澤东同志的哲学思想为指导，充分反映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与發展；貫徹百家爭鳴方針，反映重大爭論問題并指出其主导方向；徹底批判資产阶級学术思想、修正主义及右派謬論；整个內容与文字力求达到准确性、鮮明性、生动性。

当前，結合深入教学檢查，教研組教师們大都打破了陈規与保守，大胆創新，紛紛突破原有的框框，准备在教材內容与体系上来一个根本的翻身与躍进。在这方面，政治經济学教研組已經先跑一步，一开学即抽調了專門力量，着手編写以毛澤东同志关于兩类社会矛盾的理論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部分中国化教材，提綱已經初步拟就，有过渡时期、总論、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流通过程、社会主义的分配过程、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發展及其历史趋势等六大部分，共二十四章，現即將組織討論并拟邀請复旦經济系等兄弟院校及主要業务部門的同志們参加討論，提供意見。

× × ×

原研究处編譯組同志們，1957 年以来又陆續編纂了大量經济資料，其中已經完成初稿的有“1937—1949 年国民党反动政府統治区的物价”、“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銀行的業务情况”、“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銀行的买办制度”、“經济作物生产經济概論”以及“对外貿易外幣保險責任范圍的研究”等，計約五十余万字。資料頗丰富，有一定参考价值。目前正在組織審查，不久即可油印分送各有关方面查考。

× × ×

在全国工农業生产大躍进新形势的鼓舞下，我院会計系教师决心在教学、科学研究等方面也来一个全面大躍进。为反映并推进这个躍进，他們創办了“会計教学与研究”內部刊物，并于 3 月 31 日出版了創刊号（1958 年第一期）。在其發刊詞中，說明了該刊的內容主要在于反映会計教学中存在的問題、会計研究中的心得与体会，以及会計实踐，并將通过刊物展开百家爭鳴，密切理論与实际的联系，以提高教学質量、推进科学研究。

× × ×

美国叙拉庫斯大学經济学教授提奧·苏蘭尼-翁格尔（Theo Sranyi-Unger）在“美国經济評論”1956 年 12 月第三期上發表的“苏联經济学教科書的变形”一文，不仅对苏联“政治經济学教科書”进行了惡毒汚蔑与攻击，而且無耻的披着“学术”外衣惡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陣营。为了从政治上、同时也从学术上予翁格尔以致命的反击与批駁，粉碎其無耻陰謀，捍衛社会主义制度，捍衛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經济学，上海經济学会、本刊編輯部和本院政治經济学教研組共同举行了一次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学术批判会，到会者达四十人，中共市委宣傳部、市委党校、学术月刊編輯部以及上海有关兄弟院校都有代表参加。会議由政治經济学教研組主任雍文远同志主持，發言者其黃逸峰等十余位同志，大家憤懣地分別就翁格尔一文政治上、学术观点上以及方法論等方面的反动性进行了無情的批駁，并一致指出当前对其展开斗爭的重大意义。本刊本期已部分發表了該次討論会的發言，下期將繼續刊完其余發言稿。

× × ×

为了徹底澄清与粉碎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对社会經济統計与数理統計关系問題所进行的惡毒混淆，統計系部分教师于 3 月 13 日上午集会討論了“数理統計在社会經济統計科学中的地位与作用”，發言者有鄒依仁、郑德如、楊惠、謝嘉、蔣士駒、張維銘、王思立、褚鳳仪、金国宝等同志，他們分別从数理統計与社会經济統計学的区別与关系、数理統計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內容、資本主义国家統計学者如何对待数理統計、目前苏联統計学者对数理統計研究的基本情况、数理統計在社会經济統計中的应用范圍和作用、社会經济統計学者对数理統計的应有态度、大数定律在社会經济統計科学中的作用与地位、統計系师生应当掌握数理統計的那些部分等等方面充分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在这次会議中，不仅有力地反击了資产阶級右派分子的进攻，也使到会者对数理統計的某些方法在社会經济統計科学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了初步的認識。为了进一步引起全国統計学界及統計工作者的共同注意并深入討論研究，本刊下期將全面發表此次討論会的發言內容，欢迎讀者参加討論。

× × ×

为活躍学术空气，丰富师生科学与实际知識，并結合教学革新，我院本学期將广泛地举办各个方面的專題报告会和講座，主要是邀請各有关業务部門的負責同志主講，这些报告今后將尽量选擇在本刊陆續發表。

由研究处（現与教务处合并，成立教学与科学研究处）举办的第一次專題报告会于3月19日晚由上海市計划委員会副主任高景平同志主講，題目是“关于在优先發展重工業的基础上發展工業与發展农業同时并举的方針”。报告内容分为三大部分：①当前工农業生产大躍进的情况；②工农業發展相互的关系；③在工农業生产大躍进的情况下，目前經济工作中产生的主要問題。报告生动而具体，受到热烈欢迎。

× × ×

由該处举办的第二次專題报告会于4月2日晚由上海市紡織工業局計划处副处長顏次青同志主講，題目是“在十五年内，一定赶上英国！”材料充实，并大大鼓舞了到会者。报告内容已在本刊本期發表。

× × ×

工業經济系企業組織与計划教研組本学期为师生举办了專題講座，主要内容是关于机器制造厂的机構調整、長短期計划的結合、車間作業計划的編制等問題，全部委請業务部門的同志主講。至今已分别由上海电机厂厂長办公室主任蔣家鑅及上海自行車厂經济科科長宗国梁同志主講第一及第二、三講，題目是“关于企業机構調整問題”及“关于長短期計划結合問題”。第二、三講的主要内容有关于部局控制指标的下达、企業生产技术財务計划的編制、季度生产技术財务計划与月度生产技术財务計划的結合、企業車間总产值的計算方法以及企業經济指标等問題。报告具体生动、内容丰富，并反映了当前企業單位所存在的一些問題，提供了科学研究的选題，深受师生同志們所欢迎。

× × ×

貿易經济系举办的第一次專題报告会將于4月8日下午由上海市服务局局長裴先白同志主講，題目是“副食品商業的几个問題”。

× × ×

我院应第一机械工業部的邀請，委派代表参加了該部在北京召开的科学研究协調会議，初步認定了十余个有关的研究專題，目前，各系、教研組正在全面研究任务与安排人力，不久即可明确分工投入行动。

× × ×

为进一步貫徹理論联系实际的方針，我院各有关系、教研組在院長亲自領导下，正积極采取行动，爭取在上海市重要工厂中建立一些固定的研究基地，与它們拟訂协作合同，以便利全院师生深入实际，并为工厂提供服务与帮助。目前，暫决定以上海自行車厂、新中动力厂、上海机床厂、矿山机电厂、上海工具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原来已經有协作关系的單位为对象。

× × ×

3月27日下午，上海經济研究所、复旦經济系以及我院有关負責同志举行了初次科学协作小組会，討論了“上海市各單位协作进行經济科学研究工作五年規划綱要（初稿）”，一致表示贊同，并初步商討了到会單位今后进一步协作的原則与方向。

（实）1958年4月2日

“財經研究”双月刊为了适应各方面的需要，决定自今年七月份起改为月刊，每逢十五日出版，每期定价改为三角四分。凡原照双月刊訂閱至本年年底为止（或第三季度底为止）的訂戶，一律以月刊照原訂期数發足为限，每期多收的訂費六分，届时由邮局办理退款（如原訂至九月底为止者，自七月至九月底应發一期，現在改为月刊后，發七月号一期，退还訂費六分。原訂至十二月底为止者，自七月至十二月底应發三期，現在改为月刊后，發7月号至9月号三期，退还訂費一角八分。为便于說明，列表如下）。請各地訂戶諒鑒，期滿請向附近邮局办理續訂为荷。

“財經研究”双月刊自本年七月份起改为月刊后对訂戶發刊情况	
原訂至本年第三季度为止的訂戶	發刊至本年第四期（卽七月号）为止退还訂費六分
原訂至本年年底为止的訂戶	發刊至本年第六期（卽九月号）为止退还訂費一角八分

“財經研究”編輯部
同啓
上海財政經济出版社

欢 迎 訂 閱

工業管理的刊物——中國工業月刊

中国工业月刊是一本面向地方工业以工业管理为主的刊物，它为广大厂矿企业服务。其内容是及时介紹厂矿企業的計划管理、生产組織、劳动組織、財务成本管理、材料供应工作、技术經济定額的制訂与核算、經济活动分析等实用的先进經驗，以及对管理工作或規章制度上具体問題的討論；并选登苏联工業管理工作的先进經驗。讀者对象为厂矿企業管理干部，工業管理机关干部，和財經院校有关师生及一般財經干部。

每月25日出版　　每册定价0.38元

上海財政經济出版社編輯、出版

邮电部上海市邮局总發行

各 地 邮 局 均 可 訂 閱

财经研究

（双月刊）

1958年　第2期

（总第8期）

1958年4月15日出版

編 輯 者　上海财政經济学院財經研究編輯委員会

出 版 者　上海財政經济出版社（上海南京西路2004號）

印 刷 者　商务印書館上海厂

总發行者　邮电部上海市邮局

訂 閱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代訂代售处　全国各地新华書店

預定价目

每双月一期　定价(5)0.40元

国内平信邮費免收

定費一律預收

印張：4　字数：118,000　印数：3,670册

（代号4—37）